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出版

● 第28期 ●

余尊榮退榮授教峯雲蘇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蘇雲峰先生（左）榮退茶會（1999年8月12日）

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史學者費維愷 (Albert Feuerwerker) 教授（左二）
(攝於1987年10月，伊利諾大學的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China Statistic Archives)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二十八期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出版

學術會議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1600迄今）」	
	系列活動報導.....	張哲嘉、黃克武 3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	
	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歐陽哲生、金安平 13
	「五四」如何面臨未來？—兩岸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	
	學術研討會參觀記	白永瑞 31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民國時期在二十世紀	
	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反思與再考量）國際會議報導	
	羅久蓉 36
學術演講	退休感言：研究院成全了我	蘇雲峰 45
學人簡介	從圖書館走向歷史研究：	
	蘇雲峰先生的學術生涯與成就	沈懷玉 51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 The Scholarship of Albert	
	Feuerwerker	Thomas Buoye 63
研究概況	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	
	金觀濤、劉青峰、章清 77
檔案研究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歷史檔案簡介	史梅定 100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日偽政權檔案概況	
	及初步評價、開發	陳正卿 110
	海峽兩岸檔案利用比較	張力 119
	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朝（1736-1795）	
	司法類	賴惠敏 124
	王世杰個人檔案整理概述	巫金燕 128

史料介紹	新發現的一篇陳熾重要遺稿	孔祥吉、潘光哲	133
	黨史會藏《中行廬經世資料》介紹	劉維開	150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六種羅字特藏資料介紹	區志堅、曾漢棠	156
新書評介	外交史研究的新成就——讀王爾敏著《晚清商約外交》	張憲文	161
來函照登	勘誤表	唐澤靖彥	164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9.3-1999.9)	劉農華	167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黃克武 陶英惠 熊秉真 楊翠華

羅久蓉 張壽安 葉其忠 余敏玲

張哲嘉 呂妙芬 沈松喬 萬麗鶯

趙潤海

執行編輯 張壽安

助理編輯 呂妙芬 劉農華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_{半年刊} 第28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日創社文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學術會議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 (1600迄今)」系列活動報導

張哲嘉、黃克武*

活動緣起

「公與私」為傳統語彙，自古即存在於中國社會與思想界，從先秦諸子對封建郡縣的討論、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去私存公」與「大公無私」之理想，到明清之際的顧黃王所關懷的君主專制所導致私天下的問題，以及清儒對家族問題與「官、公、私」範疇之爭議，甚至清末的革命志士對民主的探索、中國共產運動等，都與此議題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公與私，無論是作為一種抽象的哲學範疇、道德理念，或具體的社會政治實踐，都有錯綜複雜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從明代中葉到二十世紀的四百餘年之間，公私領域之疆域界線，以及與此一劃分所相對應的政治、社會生活，曾經歷激烈之挑戰與調整，值得深入探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在民國 86 年、87 年先後以「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及「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為題，進行了二年多的研討活動，¹其中曾觸及此長期演變過

* 張哲嘉為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黃克武為同所副研究員兼文化思想史組主任。本文草成之後承蒙熊秉真教授斧正、補充，謹致謝忱。

¹ 有關這兩次會議的報導請見黃克武，〈「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系列活動報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4（民國 86 年），頁 3-13；呂妙芬，〈「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系列活動報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6（民國 87 年），頁 1-7。這兩次研討會都出版了論文集，請參考黃克武、熊秉真編，「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清末民初的國族建構」專號，《思與言》，卷 36 期 1（民國 87 年）。熊秉真、呂妙芬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8 年）。

程中的若干面向。國族想像之議題偏向「公領域」之範疇，禮教與情慾的討論則與「私領域」有較密切之關係。然而國族想像促成了「近代國家」之形成，近代國家之中心旨趣則是對於個體（國民）生活之安排，這樣一來，國族像是從公領域出發進而觸及公私之劃分及其相互之關係。再者，情慾解放之主旨為發抒個性以達到私領域之拓展，然而此一拓展所挑戰之限制，則是出於群體生活之考量的禮教。因此禮教與情慾的角力也正是公私領域交互滲透、彼此界定的一個例子。

此一思路讓我們開始思索中國近代史上公私領域及其變化的課題。在本組幾位同仁，特別是熊秉真、黃克武、沈松僑、羅久蓉與余敏玲等人的腦力激盪之下我們決定以「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1600迄今）」作為民國 87 年下半年至 88 年上半年學術活動之主題。剛開始之時本組同仁對於此一議題之展開並無一完整的構想，基本上僅企圖延續前兩年的努力，從一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來觀察思想史與社會史之中公領域與私領域之嬗變。我們初步的想法是將兩者視為不斷互動、相互界定，而非僵化對執的範疇，尤其以個人與群體方面之重建，為探測數百年變動之初步觸角。長時段的視野以及以傳統語彙作為活動主題也意味著我們企圖從中國內部歷史肌理來審視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系列演講與讀書會

為了協助同仁對此一議題的思索，本組首先舉辦了一系列的演講活動，這些演講的主題基本上環繞著不同學門對於公私議題之研究，以及其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對於我們處理中國近代歷史之素材所可能有的啟發。

在這方面共舉辦了五場專題演講，學者們分別從思想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族群理論等角度來探討公與私的相關問題。第一場專題演講於民國 87 年七月十四日舉行，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主講。講題為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Group and Its Evolution in Modern Times: An Attempt to Define Some Key Issues”。他綜合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在近代中國史上無論是集體主義者或是個人主義者都強調公共利益的優先性，這點與西方的公、私論述顯著不同。為了要了解中國與其他文化觀念差異的根源，必須要研究個體所從屬的家、國、天下等種種不同層次的群體，以及人己之

間的關係，尤其是其背後所涉及的宇宙論、歷史觀與知識論等課題。

第二場專題演講於民國 87 年十月十二日舉辦，由中研院社會所籌備處瞿海源教授主講「關於公共的兩點初步觀察——公民與台灣宗教的公與私」。瞿教授的觀察點在於台灣的中學公民教科書的內容以及宗教信仰活動中的公性與私性。從其中他發現了台灣在形式化的民主程序接近完成、權利的爭取告一段落之際，公民的素養卻搭配不上民主進步的腳步。公民教科書裡所強調的社團參與或家庭價值，不一定是合乎民主精神的，也因此和公民素養的孕成未必有正面關係。以此為基礎他進一步討論台灣的宗教信仰行為。他認為台灣的宗教活動在信仰上是以私為核心，祈求個人或家庭的福報；不過在神壇「問事」等活動卻顯示這種對私的強調並不包括重視個人的隱私。另一方面，台灣的宗教組織主要是靠聚落或社區來運作，所以雖然在地區社會凝聚上有一定力量，不過同時也限制了其更普遍的公共性。因此，瞿教授的結論是台灣社會有關公共性的教育與觀念仍有待加強。應朝向調控私性，尊重隱私；走出聚落，參與公共這兩個方向發展。

第三場專題演講在民國 87 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由台灣大學心理系黃光國教授主講「儒家倫理與專業倫理：矛盾與出路」。黃教授認為，一般華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必然會習以為常地實踐儒家的「庶人倫理」。這個較重私德的模式與攸關社會公益的各個職業倫理常難免互相衝突。若要想在華人社會中推行「專業倫理」，必須要建立各種社會系統，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呼籲各專業團體訂定自己的倫理規範，才有可能在儒家倫理與專業倫理之間的矛盾中找到出路。

第四場是邀請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張旺山教授在民國 87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專題演講，講題是「家庭與個人：近代西方世界中公私領域之遞嬗」。張教授由政治哲學的角度切入，指出對亞里士多德與希臘人來說「家」是私領域，「國家」則屬公領域。亞氏的政治學是以家為基礎，將國家界定為以主權權利對許多的家及其共同事務遂行正當支配。

相對於亞氏的政治理論，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在探討「國家起源」的問題時，則採「個人觀點」。由霍布斯開始多數的思想家是以「自然狀態」下「自由、平等而獨立的個人」作為理論建構的出發點，而且他們都企圖透過「契約」的概念進行說明。其原因是資產階級要以他們自己的形象創造一個可以與每個自主個體「簽訂契約自由」的世界。如此一來，在近代的主流的政治哲學中，為求自保「自然權利」，彼此自由平等的個人，就成為思考「國

家權利與國民義務」的出發點了。

第五場由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王明珂教授於民國 88 年四月二十三日主講「由族群認同角度談公與私」。他指出族群認同常常被認為是爭奪利益的工具，但是也有例子顯示有許多個人為了族群發展願意犧牲自己應得的私利。從人類學的角度看，社會之有公與私，與其說是許多個人總和的結果，毋寧解釋作社會下還有許多較小社會共同組成、相互作用的產物。族群認同固然有其根基性的、情感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族群認同的產生與維持都在某種資源競爭與分配的背景之下進行。在資源環境產生重大變遷時，人們常集體遺忘、修正或重塑歷史記憶，以調整對自己族群的認定範圍。此等調整又影響了個人情感與態度。因為個人在經歷鉅大社會變遷下所產生的挫折與徯徨，常是在族群認同的情感下找到歸依。所以，現今許多人不會因為追求實利而拋棄自己是中國人的堅持；另一方面，台灣人否定華夏認同，堅持台灣為本體的想法，也並不完全出自情感或血緣上的理由。

上述從不同學科出發對於公與私議題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近代公私問題的思索。除了系列演講之外本組擬舉辦的第二類型的活動為讀書會，原定舉辦三場，分別研讀：Craig Calhoun, “Natio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eds.,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75-102；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hilippe Ariès & Georges Duby ed.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後來因故只由黃克武主持了熊月之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的書評討論會。²此外也由沈松橋先生提供了一份有關西方學界中相關研究的參考書目。³

² 有關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可參考呂寶強先生的書評，收入國史館編，《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輯 20 (台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頁 1-34。

³ 相關參考書目如下：

- (1)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 (2)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9).
- (3) Craig Calhoun,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作品發表會

在擬定活動主題之後，我們一方面主辦演講，另一方面也邀約組內外的學界同好就此議題撰寫文章。我們將邀約到的文章組織為三場作品發表會，分別在民國 88 年四月 22、23 日、五月 21 日與六月 25 日舉行。各文作者與篇名以及評論人如下：

John Fitzgerald 教授演講 “Who Said China Will Wake Up and Shake the World: A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87-1901”

Frank Dikötter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Individual Bodies and Collective Destinies: Human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Discipline in Modern China.” 評論 張哲嘉 (本院近史所)

徐光台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從「格致」到「科學」：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學中國化的演變〉評論 楊翠華 (本院近史所)

黃克武 (本院近史所) 〈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評論 李朝津 (文化大學史學系)

翟志成 (本院近史所) 〈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辯及其現代意涵〉評論 張壽安 (本院近史所)

熊秉真 (本院近史所) 〈父子之情與家國之恨：明清至民國的一些反思〉評論 林維紅 (台灣大學歷史系)

Dorothy Ko 高彥頤 (美國紐澤西大學羅格斯分校歷史系) “Painful Histories and the History of Pain” 評論 林麗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楊瑞松 (本院文哲所) 〈修身與平天下：顏元/朱邦良對儒家身體之學的重構與其歷史意涵〉評論 呂妙芬 (本院近史所)

林郁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 〈公德或私仇：1930 年代中國「情」的國族政治〉評論 沈松喬 (本院近史所)

李玉珍 (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系) 〈公／私／男／女：中國佛教現代化運動中的新蓮社（1930-1970）〉評論 盧蕙馨 (本院民族所)

(3)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 pp. 304-335.

(4) Craig Calhou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5).

(5) Craig Calhoun, *Nation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Chapter II,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Realm,” pp.22-78.

此外為了方便讓不克參加某次或全部研討會的人士參考，主辦單位也將相關的資料以及各篇論文的摘要，上網以供大眾閱覽。該網址為 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pub_pri/pub_pri.html，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以下本文作者根據各文章之內容及討論時所觸及的一些重要議題，對這三場作品發表會作一綜述。

一、近世中國公私觀念的常與變

會中有兩篇文章試圖就公私的觀念及其演變作基礎性的澄清。翟志成指出，要能真切了解現代中國的公、私觀念，必須追溯至宋明理學的傳統，而不能以西方的“public”、“private”勉強訓解。理學流派雖多，卻均以為公私之分乃由當事者的主觀動機決定。此外，他們一致視私為萬惡之源，以無私為絕對的善，並強調只有「破私」才能「立公」。這種看似粗糙卻無比堅韌的價值觀，自成形後即屹立不搖。縱使是企圖根絕中國文化的毛澤東，也無能將其一併革除，只能反過來加以利用，作為推動無數災難性群眾運動的工具。

黃克武則從另一角度闡析了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概念範疇發展及其對後日的影響。他指出這段時期的知識份子開始肯定個人之私的意義，以為合私可以為公；換言之，結合個體之私即是社會正義。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反對個人自私自利與君主專制的私天下，也反對宋明理學將公私絕對化，他們肯定的「私」包括人民的私有財產與個體慾望；至清末隨著西方觀念的引進，「私」轉而成為國民所具有的自由與權利，公則除了意指社會正義之外，更具有現代國民對國家之認同的意涵。此一轉變固然讓個人之私得到更多的尊重，然而因為私的合法性來自「合私以為公」的邏輯，使公私、群己之間有密切的關聯與互動，也因而使「私」在概念上未能建立起根本的獨立性，故與西方個人主義之自我的概念有所不同。由此一發展過程可見近代中國國人普遍地接受西方的「民主」卻放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實有其思想上的根源。

二、個體和群體的統合與獨立

當學者的討論由純粹的觀念面兼顧至實踐面時，大多數是從和「公與私」平行的另一個主題、亦即「個體與群體」入手。如楊瑞松指出：極力攻擊朱子學的清初儒者顏元雖然掲橥以「平天下」為終極目標的儒家「身體之學」，

實際上還是從朱子學中的「以禮修身」出發。彼此在主觀上立場相反的兩造卻毫無異議地，承認應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層層相疊的架構來理解傳統社會中個體與群體關係。

同樣以修齊治平的討論架構，熊秉真演繹了從明末至民國間父子之情的變與不變，並藉此檢討這個架構下個體與群體間環環相扣的實質關係。根據大量的微觀史料，她指出現代對於明末清初「移孝作忠」志節之士的印象，其實是在近現代全球「國家」文化衝擊下，由晚清民初少數政治覺醒的士人所建構出來的。實際上不管是承平或是易代之世，對於明清的士大夫而言，家或國之間均無必然之直接聯繫。而且不論就概念面或經驗實務之處置面，兩者若有牽繫，內情也極其複雜多樣，非如一般忠孝一體，公私互訓之假設可以擬想。儘管志士的形象在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主流的簇擁下，似乎具有較大的說服力，到底並非本來面目。其間「慈」之可能為「孝」之前提，士族對夾在公私之間「官府」態度之曖昧保留，都是值得重視之因素。熊秉真進而提出在界定「公私領域」或「個體與群體」時，不應一味依違主流追求清晰對立，而宜從更流動、連續、及互動的角度出發。

徐光台是另一位由修齊治平的架構出發的學者。以科學史的例子，他說明了西學自明末初入中國起，始終只被視為帝王御用的歷算數術或個人修養的「格致」之學，僅僅在宮廷及士大夫之間流傳。一直到了清末西方列強的挑戰，中國對西學的態度才突然搖身一變，由修身轉型為救國以圖存於天下所必備之公器的「科學」，其間訊息值得玩味。

英國倫敦大學的馮克博士（Dr. Frank Dikötter）和徐光台一樣強調西方知識在推動中國近代化的角色。他以優生學在中國推行的情形，指出中國以國家或種族為名強調宣揚個體對群體的責任完全是個「現代現象」，在甲午戰爭之後才發生，與之前的傳統價值無甚關連。至少以他所討論的範疇而言，他認為中國的近代化與個體與群體的命運開始相結合，純屬全世界西方化科學知識影響的結果。

來自澳大利亞 La Trobe 大學的 John Fitzgerald 教授對全球普遍學術思潮隨政治勢力西方化的概念持較保守的態度。他提出即使在西方，每個國家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亦均有所不同。所以他舉近世基督教會藉由感化許多個人開始，企圖逐漸馴化「龍的傳人」的中國成為基督教國家的文章之中，就以新興的政治人類學角度，希望提醒大家公私領域中「情緒」（emotion）、「忌恨」（resentment）等力量的重要影響，同時他也藉圖片、建築與其他影像資

料，展現傳統政治思想史中較少注意，卻十分真實逼人的牽動力。

三、情感、性別與公私

公私議題的討論從抽象概念轉移到社會實踐之時不僅觸及知識的層面，也涉及感情與性別的向度，熊秉真對父子之情的歷史分析是一個例子。高彥頤（Dorothy Ko）所研究的纏足則是另外的一個例子。她從知識論的角度出發來探究疼痛的歷史。她所問的問題是疼痛既難形諸文字，那麼後人如何透過文本來理解歷史上的痛？當清末民初由男性主導的天足運動者大聲疾呼，用《鏡花緣》中洗練的文字與怵目驚心的腳骨透視圖，來傳達全國婦女的纏足之痛時，儘管逼真生動，到底無法呈現出女人個別的主體性。

性別與公私如何彼此滲透、交相定義也是李玉珍所關懷的議題。她以中國佛教現代化運動的新蓮社的經驗來考察女性如何透過宗教活動與組織來走出家庭，參與公眾事務。她的結論是宗教活動雖然使女性走向一開放的公共範圍，但是「其組織力量並無法滲透到重要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的決策過程」，只能在此公共領域內從事「靜默的社會改革」。

論文發表會中另一篇觸及情感、性別與公私之議題的是林郁沁（Eugenia Lean）有關女俠施劍翹的研究。她分析民國廿四年女子施劍翹為報父仇刺殺孫傳芳一事，在社會上所引起的爭論。此舉究竟是出自逞一己之快的「私仇」、還是孝義足式的「公德」？知識分子間雖爭論不休，卻始終得不到共識。在暴露了判定公私之難的同時，林郁沁並進一步提出，從當時知識分子的討論內容來看，將中國二十年代的「公」與「私」和西方觀念中的“public”、“private”之間直接連接是一個歷史的錯誤。這與翟志成認為中英文間不能完全互訓的意見不謀而合；她以為當時「公」、「私」兩個概念的意涵會隨著時間不斷變化，也與熊秉真的看法可互為呼應。

結語

事實上，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之逐漸成形，與隱私之權（privacy）之得到尊重，在西方思想與學術史中，被視為與「現代性」（modernity）展現密不可分的關鍵性指標。而中國上古以來公私、群己卻自有一番概念與經驗上的衍生脈絡。在當前歷史與文化的相關研究中，如何領悟西方例證（包括其傳統及其當代學術論述兩個層次）的精義所在，同時又能深探中國自身

在「公」與「私」論軸上的反覆論爭，數千年之輾轉，其間所代表之概念上意涵，與歷史經驗對比下之同異，從而進行下一步自主而不附會，交換而相互受益的學術對話，應是類此研討嘗試的真正意趣所指。

由此可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所舉辦的這次系列活動並非一成熟的學術成果之展示，而是具有議題開創的性質。對於這樣一個正處於開發摸索階段的新議題，我們並無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鏡，因此活動上採取較長期的醞釀。從去年的七月開始，籌辦單位陸續安排了來自不同學門的專家，就其領域與歷史學者討論公與私的問題；此外在四月間也搭配了一次綜合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及讀書會的活動，然後才在五、六月各舉辦一次為期一天的作品發表會。這樣的設計主要是希望讓長期持續與會者能夠有從容沈澱思考的機會。此一做法與目前多數會期十分集中的學術會議有所不同。

然而因為此次活動屬於議題開創的性質，使得我們在主題範疇的界定與研究方法等方面遭遇到許多困難。首先曾如許多與會者所指出的本次活動的主題「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其主標題「公與私」與副標題「個體與群體」並不是對等的概念。問題在於公與私為義蘊複雜的傳統語彙（emic terms），此一概念至少有三個層面的意涵，一是哲學範疇（如宋明理學之理欲公私之辨），一是政治理想（如封建郡縣之中公天下與私天下的討論），一是社會單位（此分野往往是區別公、官、私各領域之不同，例如有時私領域並不指個人生活，而是指家族活動）。而個體與群體則為現代語彙（etic terms），主要是觸及上述第三個社會單位的層次，而個體所指涉的基本上是個人（individual）。由於此一基本概念的歧異，使論文發表會中有些學者是從公與私的概念出發，有些學者則是從個體與群體的概念著眼，來撰寫文章，其所關注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在相同的層面。這是以後要繼續探討此一課題時所應注意的。

除了「公與私」以及「個體與群體」兩對概念之外，會中引起熱烈討論的另一個主題是這兩對概念與西方的 public 、 private 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中西兩對概念之間到底可否「互訓」？當然這也涉及近年來中西學界對中國近代史上是否有 public sphere 或 civil society 的爭論，如中國有無產生「公共領域」，以及中國的「公共領域」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等。⁴對於此一問題

⁴ 請參考 William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 3 (July 1990), pp. 309-329; William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多數與會者的觀點都是否定的，認為兩者之間有高度的差異，也有各自的變化，不宜直接連結而相提並論。當然西方有關 public、private 的歷史經驗對我們處理中國歷史的問題也絕非全無助益，仍可作為異文化比較之基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歷史經驗之中不具有西方意義下的「公共領域」或「隱私之權」，也不必然顯示中國缺乏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性，反而可以視為對人類生活的另類安排，其所蘊含的創造性與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力，值得思索沉吟。

從會議論文所討論的歷史經驗看來，中國公與私議題的複雜性不足以一語概括。許多與會學者也同意，對中國近代史之演變過程持一長期眼光之考慮，將公領域與私領域之活動內容，視為不斷互動、相互界定，永遠流動而非僵化對執的範疇，對於了解數百年來個體與群體之重建，頗有助益。期盼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日後能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19:2 (April 1993), pp.139-157 以及 *Modern China* 卷 19 期 2 中的各篇文章。中文方面請見陳永明，〈「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北美中國社會史的辯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0（民國 84 年），頁 90-97。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 五四運動 8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歐陽哲生*、金安平**

1999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北京大學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 80 周年「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一次規模盛大的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美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共 120 多人，內中來自海外的有 27 人，收到論文近百篇。海內外學者本著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精神，暢所欲言，相互切磋，會議取得了豐實的學術成果。大會 5 月 1 日開幕，北大校長陳佳洱致歡迎詞，季羨林、丁石孫、金沖及、基達連科代表嘉賓致詞，費孝通、羅豪才等近百人應邀出席了開幕式。開幕式後，有彭明、周策縱、蕭超然、金耀基、丁守和、張磊、沙健孫、耿雲志、丁偉志、費路、石仲泉、陳萬雄、孫玉石等十三位知名學者作大會演講。5 月 2 日至 5 月 3 日上午，分四組（總論、人物、文化學術、其它）進行了熱烈的討論。5 月 3 日下午，先由王元化、林毓生、唐德剛和張豈之作大會演講，接著舉行閉幕式，郭德宏、周昌龍、葉文心、陳平原作小組綜述，郝斌作大會總結。

此次會議提交的論文和討論的問題主要有：

一、五四精神、五四傳統的內涵及其歷史意義

會議對五四精神和傳統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討論和闡釋，豐富了這一精神財富的具體內容。

（一）五四運動的性質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五四運動是影響 20 世紀中國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有的學者提出，對五四性質的研究有兩種角度，即五四「是什麼」，五四「不是什麼」。五四實際上由啟蒙的文化運動和救亡的政治運動兩部分組成。而過去在對五四民族救亡性質的研究中常常過於籠統。段培君提出了兩種意義的民族救亡的概念。一種是古代意義上的民族救亡，這種民族救亡在發生背景上與文化危機沒有直接的關聯；另一種民族救亡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救亡。這是民族關係危機與文化危機同時發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試圖通過選擇新的文化、實現文化轉型和中國的近現代化而進行的民族救亡。這是一種新的民族救亡的概念，這也是五四所具有的民族救亡。因此籠統地用救亡和啟蒙這兩個範疇構成的分析框架來概括說明這一階段的歷史是不夠的。閔斗基提出，五四的性質實際是革命，是為了實現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共和革命，與辛亥革命一起稱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它們共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五四的恒在地位在於它的文化啟蒙和文化批判。

（二）五四精神和傳統

五四運動是一場意義深刻、內容廣泛的偉大運動，對其精神特徵和傳統的理解與闡釋也呈多樣性。比較多的意見認為，五四時提出的「民主」與「科學」是五四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使得她與歷史上的一切愛國運動區分開來，成為中國愛國救亡運動的新精神旗幟。鄒兆辰在〈五四運動與 20 世紀中國知識青年愛國精神的形成〉的論文中，對形成五四時期愛國精神的社會心理機制進行了分析，提出五四青年的愛國精神不是簡單的政治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義。許全興認為：「廣義五四精神可概括為愛國精神、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創造精神和奮鬥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本質的東西就在於一個『新』字。創造構成了整個五四精神的靈魂」。彭明提出，「民主、科學是常新的歷史話題。20 世紀的舊中國有兩大問題：一是社會制度的落後，一是社會技術的欠缺。這兩大問題互為因果，制約著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想家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並且為之奮鬥，切中時弊。」郭德宏認為，「五四精神的內涵非常豐富，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概括，如愛國主義、民主與科學、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勇於探索、敢於變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等，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因此，發揚五四

精神，應該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鬥」。金耀基教授認為，五四的愛國政治運動代表了民族、國家「集體」求解放、求自由、求獨立的一種需要與精神；五四新文化則反映了「個體」求自由、解放的需求和精神。也有學者認為，五四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是批判。但王元化、周策縱等學者提醒人們注意，「封建」一詞不能濫用，秦始皇以後的中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體和西方社會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樣的。對如何理解五四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內涵及變化，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五四提出「科學」與「民主」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法國啟蒙運動，並成為了以後中國現代化的主要資源與方向。

（三）關於五四時期的民主和科學

朱志敏考察了五四前後 Democracy 譯語的演變。認為當時在民主的譯語上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和多樣化的現象，它與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聯繫。馮天瑜以《新青年》為例，說明五四的民主訴求是外鏽的、激進的、批判的、觀念突進的和精英式的。這種特徵對此後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歷史過程發生重大影響。其優長與缺陷至今仍或隱或顯地呈現。楊國榮認為五四前後，在各種主義的引入和論爭中，經過不斷泛化的科學開始進一步被提升為一種主義，並多方面地滲向知識學術、生活世界、社會政治各個領域，它在相當程度上已超越了實證研究之域而規定為一種普遍的價值—信仰體系。緒形康則探討了五四科學主義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五四前的科學主義表現為化約主義和一元化的現代性理論，五四科學主義的特色則為解構主義，「以美育代替宗教」和多元化的現代性理論。

（四）關於五四的歷史地位

與會者對五四給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帶來的影響作了客觀地評價。蕭超然認為，「五四新文化」的基本內涵作用於中國近現代社會政治，不僅將中國現代化由器物、制度推進到文化層面，而且使新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從中不斷增長和提升，進而引起了政治的近現代變革，開啓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換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與發展。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或一樁政治事件，五四運動有其一定的時限，而它所蘊含或孕育以生的思想認識、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則沒有因之消失。相反，

它融入到中國近現代政治發展進程中，為政治發展提供思想資料、認識根據，並參與了對相應政治主體的塑造。石仲泉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解放歷程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經歷了包括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和 1978 年真理標準討論這三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學者們也客觀地指出五四的局限性。由於民族危機的逼壓，五四新文化的先驅們沒能冷靜、細緻地對中西兩種文化進行辨析，存在著思維的單向化，從而導致了價值的單向度。如以非科學的態度地推崇科學而排斥宗教、美學、民俗的作用等。王元化提出，五四未完成的任務應當繼承，但是五四的思想需要深化，而不是重複。

（五）關於如何研究五四和繼承五四的精神和傳統

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認為經世致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歷史學者應該關懷現實，把求真與應用很好地結合起來。一是認為應該把五四當作歷史事件來研究。表面化、功利化的研究會損害學術研究。但與會者比較一致地認為，五四精神應該而且已經成了我們新的傳統。五四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仍是中國人長期為之奮鬥的歷史任務，因此，五四的研究既具有永久的學術魅力，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二、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係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係，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的關係是此次會議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王元化提出，為什麼五四時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是反法。實際上儒家還有著民本主義思想和誅獨夫的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卻站在君主本位立場上，實行徹底的專制主義。五四時期反對舊道德舊倫理，而作為封建倫理觀念集中表現的三綱，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來的。五四時期反儒，認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來統治人民，所以竭力攻擊儒家。可是他們沒有看到歷代統治者所行的雜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內法，儒不過是用來掩蓋實際所行的法家殘酷之術。但五四時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對法家加以謳歌，這是令人奇怪的。陳萬雄提出，新儒學的興起與發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關係，是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史應補上的一環。他認為第一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具有相同共性即（1）他們都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

不同程度鑽研過外國的文化思想；（2）他們對傳統學問都各有造詣；（3）雖程度不同，他們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不僅「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有一脈相承的條理」，作為五四時期新儒學的倡導者和奠定者，同樣與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有著同樣的背景。湯一介認為，百年來，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古今中西」之爭，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界一直都關注著中國社會如何走向現代、如何使中國文化重振輝煌。從這段歷史能得到有益的經驗？可以歸為以下三點：

（一）在文化轉型時期，在學術文化領域，學術文化的發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於有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並存，在這三種力量的張力與搏擊的推動下，學術文化才得以發展。（二）百年來中國文化所存在的「古今中西」之爭，很可能都是由於沒有正確解決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共性與個性引起的。（三）中國百年來的文化發展史說明，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啟蒙」，而且必須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同時也應允許「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耿雲志認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陣營對傳統批判最集中的領域是舊的家族倫理制度，因其最能體現封建專制主義的基本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人的解放運動，其目的是要造就獨立的個人，這就必須從解除舊的傳統家族倫理對人的束縛入手。孫玉石以《新青年》為個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對「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個思考的角度即：（一）《新青年》的反「孔教」和孔子之道，是在怎樣的社會政治背景與文化背景之下展開的？（二）在《新青年》反對「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論中是否是輿論一律？（三）怎樣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進一步開闊了研究的視角。歐陽哲生從分析儒家的淵源流變入手，區別了儒家、儒學、儒教三個概念，並從政治文化、倫理、學術三個層面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健將與儒家、儒學、儒教（孔教）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反對強化儒學意識形態，是其對歷史的一大貢獻。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倫理的排拒，對「禮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對儒家倫理蘊含的超時代性、超階級性的合理內核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分析。他在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的基礎上，對現代性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也作了嘗試性的解釋。馮崇義反思了五四以來的新儒家，認為他們表面看來比五四啟蒙戰士更深刻地把握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超越五四。

三、五四時期的人物、社團與刊物

儘管五四時期的人物、社團與刊物，是五四研究的老話題，幾十年來學界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此次研討會上，許多論文仍顯示了對這一領域研究的新進展。

（一）五四時期的人物

在人物方面，此次提交會議的論文論述人物的有二十餘篇，涉及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王希天、朱光潛、顧頡剛、馮友蘭、殷海光、張聞天等人物。研討會上關於陳獨秀有三篇論文，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對陳獨秀的思想及品德的研究。呂明灼從陳獨秀與儒學的關係來說明其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變化；認為陳獨秀對孔子儒學的批判基本是應該肯定的。陳獨秀批孔的特點是終生批孔，沒有隨著政治立場的變化而變化。但他並不是全盤否定儒家學說。沈寂則探討了為什麼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會與陳獨秀聯在一起，為什麼是陳獨秀別具隻眼發動了新文化運動。唐寶林從陳獨秀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來說明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關係，並對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表現與其後來政治活動中表現的關係進行了對比研究。小野信爾通過李大釗對日本報刊的關注和日本報刊對李大釗政治選擇影響的實證研究，認為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釗認知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胡適是頗富爭議性而又構成近年研究熱點的一位人物。林毓生的〈平心靜氣論胡適〉，表達了如何理解胡適的新思考。林毓生認為，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之所以能夠持久不變，主要是因為他領會到了西方自由主義主流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思想在應付政治與文化問題時，確有智慧。但是，胡適對他的立場的說明，基本上是在常識層次上進行的。當胡適為了理論的需要提出論式的時候，由於他在思想上沒有深切探索、窮究不捨的興趣或能力，他的常識性了解的不足之處，便顯露出來了。這樣的不足，使得他的論式，變得尷尬與混淆。所以，他在常識層次上談論自由、民主的時候，是頗為正確的。但當他倡導科學的時候，在倡導自由、民主的時候，基本上是在談「是什麼」與「應該實行什麼？」，很少顧及「如何去實現」的問題。因此，他遺留下來的啟蒙思想，在今天看來，可以繼承的相當有限。張曉唯通過胡適與蔡元培兩個重要人物在個人交往中的遠近親疏來分析

不同思想的交疊起伏。周質平通過胡適與羅素對東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表現出的不同態度得出他們對待文化的相同立場，即都不以文化民族主義為主導而敢於批判自己的文化。周昌龍認為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領導人之一，在孔教倫理、家族制度、婚姻問題、兩性關係等禮教問題所涵蓋的各個論題中，他都是一位重量級的發言人。

這次研討會在人物研究上的一大特點是對過去五四研究中較少論及的人物，如錢玄同、高一涵、王希天、顧頡剛、朱光潛、周劍雲、張聞天、馮友蘭等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和活動進行了探討。陳鐵健根據周恩來旅日日記，發掘了「塵封半個世紀的五四先驅王希天」，披露了其在五四時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信仰社會主義的大量史料，並提出五四運動具有廣泛性和包容性，說明在一定條件下，信仰社會主義與宗教是不衝突的。楊天石根據錢玄同 95 本未刊日記立體地再現了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反傳統思想、歐化思想、自由主義思想、文學革命思想、整理國故思想的複雜性。顧潮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如日記、書信、劄記的情況下，令人信服地再現五四時期顧頡剛的人格特徵和思想特徵。蔡建國論述了五四運動與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的關係。張春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高一涵啟蒙思想初探〉一文則對「一校一刊」的核心人物之一高一涵在五四時期的思想活動第一次作了比較系統的評介。張培森的〈張聞天與五四精神〉一文在編輯整理張聞天早期資料的基礎上，對張聞天的早年思想活動和投身中共的過程作了深入的交待。

（二）五四時期的重要社團、派別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出現的一個重要社團，此次會議有三篇論文涉及。它們均認為，過去對它的研究和重視不夠，應加強對這一重要團體的研究。這些文章集中對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追求和最終分裂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周淑真認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本科學的精神」是高揚了五四的科學精神，它的成立本身是反帝愛國運動的產物，同時也直接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爆發。它最終走向分化，是由於內部成員在「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馬克思主義和國家主義」上有重大分歧。吳小龍認為，少年中國學會一開始，就是自覺作為一個廣泛的、自由的群體而形成的，全靠會員的理想熱忱和自律獻身精神凝聚在一起。它所能成就的，肯定不是在政治活動、組建政黨和制訂改造社會方案上，而是形成一種思想、學術氛圍

和知識分子傳統。少年中國學會最後經歷了雙重的分化：一、選擇政治改造和堅持文化改造理想的會員間的分化；二、投身政治活動的會員中信仰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兩者間的分裂。前者的文化含義更值得深入地思考和探討。王元周則通過王光祈個人命運的變化來分析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張德旺對五四運動中研究系的表現做了分析，認為研究系在五四運動中使操縱北京政府的一小撮親日派皖系軍閥及其走卒的極端孤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五四時期的刊物

《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這三家刊物仍是此次會議討論的重點。劉一皋認為《新青年》對中國社會的描述和認識經歷了從模糊到逐漸清晰的四種變化。（1）從自救到救人。（2）從對社會的寬泛理解到注意進行專業化分工的分析。（3）從自由到集中。（4）從一般的理想到具體的行動。從中可以看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吳銘能對僅出了 12 期的《新潮》做了分析，認為《新潮》的特點是所發表的文章，批判色彩極為濃烈鮮明；對西學引進傳播極為重視。但在反傳統上不免矯枉過正，將中國古典文學批判得一無是處，甚至有主張白話作文宜充分直接運用西洋語法，使白話文充分歐化；同時也有以為中國漢字妨害知識的普及，阻止文化的進取，故需改用拼音文字。其中得失利害，值得再思。胡明對《每週評論》與五四思想文化的關係做了新的研究。他不同意長期以來流行的對《每週評論》的一種評價即：《每週評論》在 1919 年 6 月 25 號之前方向是正確的、進步的，胡適接辦之後的第 26 號起就變質了。認為《每週評論》在五四新文化中的思想啟蒙作用是完整的。

《每週評論》時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三人毫無疑義地都是當時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驅，偉大的啟蒙主義者，都是向封建守舊營壘發動猛攻的勇士。這也正是他們都被反動的軍閥政府和封建文化餘孽視為過激黨與洪水猛獸的原因，也正是《每週評論》最終被判犯刑的原因。

四、五四時期的文化、思潮

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思潮湧入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這一時期成了新文化誕生的生長點。與會者討論了這

一時期的各種思潮與學說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民本主義、科學主義、社會主義等的傳播、演變，做了各種角度的分析；劉志光對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中國化的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做了比較清楚的闡述，從而進一步論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關係。會議圍繞五四時期是否存在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問題會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袁偉時認為近年來頗多論著指摘新文化運動應對本世紀激進主義氾濫負責是與歷史實際不符的。政治激進主義不是來源於新文化運動，而是這個運動進行不徹底的惡果。它有兩個思想淵源：1、蘇俄；2、國民黨自身的反自由主義傳統。20世紀中國政治激進主義氾濫的原因何在？一是世界範圍的否定現代西方主流文化浪潮的衝擊。二是中國傳統的兩極化思維方式加民族主義和大一統情結。三是極端思想與國民黨編練的「黨軍」結合，取代了現代思想文化制度和相應的化解極端思想的功能。四是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知識缺陷和個性弱點。蔡仲德認為五四的恒久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它的人本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五四」價值的歷史命運瀕臨危機，幾乎面臨滅絕之境。但其內含的人本主義具有普遍意義。丁偉志分析了二十年代初社會主義的討論，認為顯然是梁啟超、張東蓀的意見，而不是反對者的意見，更符合二十年代中國的國情。但梁、張等人提不出切實發展資本主義的辦法，故其主張沒有取得任何實效。

五四時期的宗教是過去極少觸及的一個層面。孫尚揚的〈論新文化運動時期宗教討論所關注的問題及其運思路向〉一文以 1916 年至 1922 年初知識分子在對宗教問題的討論中所形成的文字為材料，討論了當時知識分子對政教關係問題、尋求宗教替代品等問題。法國巴斯蒂的〈中國天主教與新文化運動〉一文認為，中國天主教社群在 1919 年前卻是站在新文化運動最前線的，在新文化運動爭論的許多問題上它都扮演了先驅者的角色。1919 年以後，各級地方神職人員對這種新趨勢的保留與抗拒越來越強，中國天主教社群的反帝的社會進步思潮在一般輿論方面的影響力就陷入了一種脆弱無力的境地。

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引起了中國學術向現代的轉型。朱漢國在〈建立新範式：五四時期學術轉型的特徵及意義〉的論文中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範式，其特徵為「學術旨趣的多元化、學術分類的專門化、學術方法的科學化，以及學術形式的通俗化」，而這一新的學術範式的建立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檢秋探討了

「整理國故」與五四新文化的關係，他認為「整理國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發展了晚清以來存疑、平等的學術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題。「整理國故」的爭論發生於新文化陣營內部，實際上涉及如何理解「新文化」的本質問題，即它應包括學術領域的批判、創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楊義探討了「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的人文建設，認為「五四」之時的民主與科學不是社會制度和生產力意義上的，而是意識形態史和精神文化史意義上的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一方面使得白話文學迅即崛起，文學在全部文化領域率先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由於把傳統文化當作絕對的異己加以排斥，在促成中國文化向世界高度開放的同時，又難以建立傳統與現代之間深刻的、內在的良性循環、轉化、融會與重構。唐德剛的〈論五四後文學轉型中新詩的嘗試、流變、僵化和再出發〉一文認為中國新詩由於只注意橫的移植，即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而不注意縱的繼承，即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出現了種種流弊，甚至於走向僵化。中央音樂學院梁茂春的〈五四精神與中國新音樂〉一文認為，以「北大音樂傳習所」為現代中國專業音樂教育的開端，五四精神孕育了蕭友梅、趙元任、黎錦暉、劉天華等一代作曲家，五四時期以王光祈為代表的音樂學研究，開創了中國現代音樂研究的先河。

五、五四時期的社會與經濟研究

在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中，有的論文涉及對五四時期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研究，這是五四研究過去比較薄弱的一環。它拓展了五四研究的領域和視野，展現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運動賴以發生的社會基礎，體現了五四運動與整個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朱英認為五四運動對上海總商會產生了雙重的影響。一方面上海總商會的諸多缺陷在五四期間暴露無遺，一方面五四運動又給上海總商會提供了一個改革趨新的極好機遇，促使其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改組。江沛則對五四時期沿海城市社會文化觀念的變化進行了評析，通過個案分析進一步說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使民主、科學的精神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使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推動了社會文化觀念的轉變，促進了人們思想的進步」。王續添對五四時期地方議會的作用做了分析，認為五四運動的發生為一向

很難發揮作用的省議會發揮出較大的政治作用，提供了一種客觀條件。省議會對於學生愛國義舉普遍持同情和支持態度，大體上表現為道義上和實際行動上的支持兩個方面。省議會作為五四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對於五四運動在各地的開展和深入，以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愛國政治運動具有積極作用。陳平原以五四運動中的學生罷課為例說明，學潮的再三崛起並大獲好評，既是學生的光榮，也是國家的悲哀，除了證明國家的民主制度大有缺陷，更令人擔心現代大學「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的重任能否真正落實。

五四運動地方史的研究亦引起與會者的注意，葉文心以五四運動在杭州為例，論證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運動對全國都具有強大的輻射力，而不僅僅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區域。小野信爾則以周劍雲等人為例，說明上海知識分子當時不僅支持了學生運動，而且積極參加了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等各種市民組織的建立和維持。

六、五四運動與世界的關係

五四運動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一方面，它受到了世界潮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國際的反響。此次研討會對五四運動與世界的關係展開了較多的研究，涉及俄國、德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國。桑兵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東亞乃至歐美國家激起程度不同的反響做了分析。他提出這種反響的具體層面有二：一是國外大眾傳播媒介的即時報導，一是國外漢學家的綜合述評。比較重要的有如日本的青木正兒、瑞士的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法國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荷蘭的戴聞達（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蘇俄的阿列克（V. Alekseev）等。但他們的反映明顯比媒體滯後，原因在於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持不同看法。于子橋認為外部影響對五四運動特別關鍵，五四時期的變革歷程、五四時期的外來思潮傳播、五四時期的對外交涉都與外部影響密切相關。陳方正比較五四運動與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發現與傳統文化決裂雖然是現代化過程所必經的一環，但其模式有多種變化，而不一定與五四運動相似。費路提出 1918 年是德國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的一個分界線。1918 年所謂不可戰勝的軍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德國的戰敗使中國知識分子改變了對德國角色估計和看法，導致了一度期望西方民主

的相當一部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轉向蘇維埃俄國。

狹間直樹探討了親日派官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被「罷免」與李純密電的關係，他認為徐世昌作此決定與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有關，也與直系派勢力的上升有關，具體來說，江蘇督軍李純密電徐「罷斥曹、陸、章諸人」以為「搪塞」之計的建議促使徐下了決心。王曉秋詳細考證了過去很少論及的五四運動的領袖李大釗與日本大正民主運動的領袖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倡導和組織了五四時期中日青年學生的交流並取得極大社會反響的情況。韓國的朴宰雨論及五四運動與韓國的關係，介紹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韓國三一運動後的介紹與影響，以及三一運動對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影響。

基達連科討論了五四反帝運動與俄國影響的關係。潘佐夫則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五四時期只在部分知識份子中有影響。林精華則認為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思潮使五四不是在學理上認真分析後接受更有恒久價值的俄國人本主義文化，而是熱衷於吸收有嚴重激進主義傾向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並以俄國革命為中介，在尚未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下，選擇馬列主義中以階級鬥爭學說為主的歷史唯物論。

任貴祥以大量的史實說明東南亞的華僑對五四運動的支持，有力地支持了國內的反帝愛國運動，是介於辛亥革命與抗日戰爭之間的一次承前啟後的愛國運動。

七、關於五四運動的反省與研究

張利民提出，以「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來概括五四知識分子思想特徵有一定合理性，但不應絕對化。五四後期，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唯物史觀理論指導下，已關注經濟、政治改革，而自由主義陣營內的知識份子也面臨動搖；對五四知識份子「借思想文化以解決總是的途徑」的思維模式，既要從歷史的角度給予恰當評價，同時又要看到它的局限。郭齊勇認為「五四」的侷限是在主流思想家大多以單線進化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進和功利的心態面對複雜多樣文化問題，把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絕對對立起來，對本土資源取拒斥的立場，因而難達到其「文藝復興」的目的。徐宗勉回顧了五四研究的歷程，認為過去在解釋「五四」的

意義上，革命轉變超過了民主啓蒙。「舊民主」被否定，「新民主」突出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其實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五四」反封建專制主義被等同於全面反傳統，充滿生氣的自由精神也就一變而為乖謬的民族虛無主義。用絕對化階級論套裁「五四」，不承認民主含有的超階級的共通性和傳承性，只講愛國反帝，不講、少講民主自由，貶低「五四」的民主精神。

這次研討會反映出目前五四研究的幾個特點：第一，五四研究仍是學術界的熱點。在較短的時間內大會收到如此多的有一定質量的學術論文，說明五四研究在 90 年代的學術界並不沉寂。特別是一批國外知名學者將五四研究納入其學術視野，給予極大的關注，說明五四研究已成為國際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問題。第二，五四研究正在逐步深化、細化。此次大會收到的論文，對許多過去很少涉及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如對過去很少注意的一些人物像王希天、周劍雲、高一涵、朱光潛、馮友蘭等在五四時期的活動的研究；對五四時期音樂領域的變化、天主教會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華僑對五四運動的支持等的討論，都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五四研究的空白。第三，五四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五四研究正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文學等諸多領域研究的對象。研究方法也呈多樣化。學者們在一些問題上仍然有不同意見，如對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的理解，對一元文化與多元文化關係的把握，對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民族主義的評價，都存在不同看法，這反映了學術界的新格局。可以說，這次研討會集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五四研究之大成，把五四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附表 大會議程

五月一日（星期六）			
	主持人	演講人	講題
10：20-12：00	何芳川 王賡武	彭 明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
		周策縱	我所見五四運動的重要性
		蕭超然	淺談五四文化與中國政治
13：30-15：20	龔育之 閔斗基	金耀基	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
		丁守和	五四精神及其價值

		張 磊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沙健孫	五四運動前後民主與科學內涵的歷史演進
		耿雲志	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一個不該為問題的問題
15：40-17：35	戴 逸 巴斯蒂	丁偉志	辨析國情，選擇出路之爭
		費 路	德國在一戰之失敗與中國的思想界對民主的期望
		石仲泉	五四運動和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解放歷程
		陳萬雄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儒家勃興
		孫玉石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反孔問題

五月二日（星期日）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08：30-10：00 第一組	郭德宏 陳方正	姜義華	彷徨中的啓蒙——德賽二先生析論
		馮天瑜	《新青年》民主訴求特色芻議
		閔斗基	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試論共和革命
		朱志敏	五四運動前後 Democracy 譯語演變之考察
第二組	陳鐵鍵 周昌龍	沈 寂	別具雙眼：論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
		唐寶林	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呂明灼	評五四前後陳獨秀的“非孔”

		蔡建國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第三組	葉文心 朱漢國	湯一介	五四運動與中西古今之爭
		胡志德	餘波：1910-1920年間的中國文化論戰
		譚雙泉	五四時期的東西方文化論戰
		王中江	“新舊之辨”的推演與文化選擇形態
第四組	林載爵 蔡仲德	陳平原	設議院與開學堂
		張德旺	重評五四運動中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
		周淑真	五四運動與少年中國學會
		王元周	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
10：20-12：00 第一組	許全興 劉桂生	于子橋	外部影響和政治變革與中國五四運動
		郭德宏	五四精神與民族振興
		陳方正	五四運動與其他現代化歷程的比較
第二組	楊天石 丸山松幸	周質平	胡適與羅素
		周昌龍	胡適對傳統禮教的觀察與態度
		張曉唯	論胡適與蔡元培
第三組	趙令揚 譚雙泉	巴斯蒂	中國天主教會與新文化運動
		孫尚揚	論新文化運動時期宗教討論所關注的問題
		王守常	熊十力、梁漱溟佛教觀合論
第四組	基達連科 陳平原	袁偉時	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
		林載爵	五四時期對自由的理解

		蔡仲德	人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論五四價值及其恒久意義
13：30-15：00 第一組		徐宗勉	五四研究回顧
		劉桂生	從“新思潮”與“新文化”二詞之歧異說起
		吳效馬	二十年來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研究概述
第二組	周質平 唐寶林	楊天石	論錢玄同思想
		舒衡哲	精神悲劇：在歷史潮流中抗爭的朱光
		頤潮	五四時期的顧頡剛
第三組	歐陽哲生 緒形康	葉文心	史學研究與五四運動在杭州
		朱漢國	五四時期學術轉型的特徵及意義
		羅檢秋	“整理國故”與五四新文化
		小野信爾	五四運動與上海的知識分子
第四組	張一弓 朱英	陳國慶	五四時期倫理思想評說
		江沛	五四時期沿海城市社會文化觀念轉變評析
		劉一皋	《新青年》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描述
15：20-16：20 第一組	徐宗勉 馮天瑜	李鵬程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世紀反思
		郭齊勇	五四的反省與超越
第二組	沈寂 胡明	李中華	五四時期的馮友蘭
		張斌峰	作為“後五四”時代的殷海光
第三組	王守常 胡志德	歐陽哲生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的關係為中心
		馮崇義	反思五四以來的新儒家

第四組	桑 兵 張德旺	朱 英	五四運動與上海總商會的改組
		王續添	五四運動中的省議會
		張樹楓	五四運動與青島

五月三日（星期一）			
	主持人	報告人	論文題目
08：30-10：00 第一組	張靜如 朱成甲	許全興	弘揚五四創造精神
		段培君	論兩種意義的民族救亡
		劉志光	五四新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礎
		曹世鉉	新文化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文化思潮
		陳鐵健	封半個世紀的五四先驅－王希天簡論
第二組	舒衡哲 李中華	丸山松幸	李大釗與日本報刊
		張培森	論張聞天與五四精神
		張春麗	高一涵啓蒙思想初探
		楊 義	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人文建設
第三組	小野信爾 楊國榮	趙令揚	五四小說與人道主義
		朴宰雨	中國五四文學革命與韓國三一運動時期文學比較研究
		梁茂春	五四精神和中國新音樂
		基達連科	五四反帝運動與俄國
第四組	王曉秋 陳國慶	桑 兵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國際反響
		白永瑞	“自大”與“自悲”雙重變奏：五四期青年的身份認同危機
		林精華	五四新青年視野中的俄國文化

10：20-12：00 第一組	朱志敏 郭齊勇	張利民	五四時期啓蒙思想家的化約傾向及突破
		鄒兆辰	五四運動與中國知識青年愛國精神的形成
		徐 勇	五四時期軍閥概念的提出及其政治文化作用
第二組	張培森 呂明灼	胡 明	《每周評論》與五四思想文化
		吳小龍	“少年中國”的理想追求及其分化
		吳銘能	《新潮》月刊之研究
第三組	梁茂春 朴宰雨	緒形康	五四科學主義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楊國榮	五四時期的科學思潮
		朱效民	賽先生依舊任重道遠
		岳明君	從賽先生到科教興國
第四組	袁偉時 白永瑞	王曉秋	五四時期中日青年的交流
		潘佐夫	布爾什維主義與五四運動
		狹間直樹	親日派官僚的“罷免”與李純密電問題
		任貴祥	華僑對五四運動的聲援
13：30-14：30	主持人 于子橋 龔書鐸	演講人	講 題
		王元化	對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
		林毓生	平心靜氣說胡適
		唐德剛	論五四後文學轉型中新詩的嘗試、流變、僵化和再認識
		張豈之	“五四”與中國人文學術研究(關於中西文化融合述評)

「五四」如何面臨未來？

—兩岸五四運動 80 周年學術研討會參觀記—

白永瑞*

作為符號的五四

今年春天，筆者先後赴臺北和北京兩地，出席該地分別舉辦的五四運動 80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過程中思及若再過 20 年，即五四運動 100 周年時，我們將會如何評估五四的意義？筆者之所以沉思，是因為親身觀察了圍繞五四的現實意義所呈顯出的分歧與衝突的現場，所以，很自然地聯想到頗令人省思的五四如何面臨未來的問題。筆者先至臺北，參加由中央研究院於 4 月 24-25 日舉辦的「五四 8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的討論中，最受人注目的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芳上先生於綜合討論時發言的內容。他認為現今臺灣已經超越五四所提出的課題「科學」與「民主」，雖然在大陸這可能還是具有現實上的意義，但是對已經實現「科學」與「民主」的臺灣，五四已成為歷史事件。這樣的看法使我瞭解到，臺灣和大陸學者對五四運動的現今意義，在基本立場上有顯著的差異性。呂所長的發言顯示他對台灣的現實所懷抱的信心，不過五四所提出的課題是否已無現實上的意義，仍有可議之處。對此筆者曾與與會的大陸學者交換意見，有人回應說這全視如何定義「科學」與「民主」。同時，在臺北筆者所認識的一位激進的鄉土文學作家則斷然拒絕呂所長的看法，認為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所扮演政治和現實生活改革工作上的積極意義，縱使在現在臺灣的民主運動與民眾力量的提高和結合上，仍具有現實意義的。

* 韓國延世大學教授，專研中國近現代史

在 5 月 1-3 日由北京大學主辦的學術研討會中，筆者親身感受到五四運動的研究，在中國知識分子間具有相當的活力和爆發力，因為在研討會中所出現的熱烈討論與激烈辯爭之情況，與筆者以往參加大陸其他議題的學術會議相較，極為不同。大陸學者對「五四」一向的正統詮釋是：五四運動是共產黨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鬥爭的發端，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而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則是其歷史命題的完成。雖然在這次研討會中也有重申這些觀點的學者，不過也出現了正面批判的聲音。尤其是從海外赴會的華裔學者，似乎力圖衝破這早已成為權力道具的五四神話，故時而尋機突出與強調五四的批判精神與自由主義。

在臺北與北京兩地，分別觀察到中國知識分子圍繞五四的當前意義所呈顯出的意見分歧，讓筆者再一次地確認了既往的想法，即是「五四」已經成為一個被不同勢力所圍繞且彼此互相利害衝突的符號。也就是說，對「五四」的評價問題，他們為了從紮根於中國人民集體記憶中，尋找各方所需要的適當意義，而展開了相互競爭的漫長路程。

從神話進入歷史？

在兩地研討會中，臺北約有三十餘位、北京約有一百三十餘位學者共同參與論文的發表與討論（包括部分學者在兩地發表的同一篇論文）。僅列出論文的目錄也占很多版面。因此筆者以韓國學者的立場，將個人認為與會中較重要的研究成果，簡略地整理如下。

記得，80 年代初，在日本即發生過針對五四運動性質等相關議題的討論。筆者從今年兩地舉辦的研討會裡，首次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間，也正進行一場五四神話解構的學術工作。由陳平原在臺北發表的論文〈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似乎正是這種新學風的最佳代言。他為了擺脫現今只剩「口號與旗幟」的五四神話論，而改採進入歷史的方法，倡言直接「回到現場」，以生動逼真的筆觸呈現出五月四日當天，由北京學生所發動的示威場面。他選擇這種研究方法，不言而喻地，目的並不僅僅是在於史實的考證，其用意正如同他在北京發表的另一篇論文〈設議院與開學堂〉所顯示的，無疑是在於從中尋繹出中國近代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殊現象，

即因為議會民主制度尙未成形，導致發生議會原應擔負的民意代辯功能，轉依附於學園的現象。五四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或許從某種意義上，與其一邊倒地讚揚學生運動，不如明白指出其雙重性質，一面是純粹為牽制權力而發起的群眾運動，另一面則可能轉化為錯綜複雜的政客政治。

以上陳平原的觀點，似乎可與筆者的論文相應，筆者在臺北發表〈從慶典到反抗：五四時期天安門集會的由來〉一文指出，天門之所以成為集會儀式場所，是起源於五四。五四時期，天安門廣場的規模比現在小，它因座落在北京政府所在的新華門旁邊而自然成為請願的場所，從 1919 年的五四事件以來，以學生為中心的各界民眾示威遊行均在此舉行，此地因而具有新的歷史意義，形成了在中國現代史上人民參與政治的獨特方式。然而結合民間儀禮與政府慶典形式的天安門集會，在 20 年代如何成為民意代言之慣例(practice 不是制度)、獲得合法性，則往往是當時政治勢力間彼此競爭與妥協的結果。五四運動當時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天安門廣場具有作為慶祝場所與抵抗場所的雙重精神象徵。

另一種對五四傳統說法的批判聲音，就是對傳統文化的再評價。歐陽哲生在兩地發表的同一篇論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辨析〉，可視為此研究潮流的代表。他大力主張，必須擺脫 50 年代以來一直抱持的「上升到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反對僅僅把新文化運動理解為反儒學態度的表現，認為這是被反傳統文化者的「一種宣傳道具」所束縛的看法。他主張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意義應該在於對中國現代文化建立起多元化的思路，從中西古今的參考材料中全方位地尋求解決中國文化危機之有效方法。

其實對傳統文化再評價的研究動向並不是新興的潮流，80 年代在大陸流行的「文化熱」即是一例，回顧並評論與五四議論相關的反傳統論述，已是明顯的研究趨勢。不過，其間似乎也有一種只為追求流行研究風潮的危險。孫玉石精讀《新青年》雜誌上的反孔思潮後，指出其間存在著複雜多元的「孔學觀」。他指出在進行再評價工作時，應當注意在反思中丟掉了些什麼？又得到了什麼？也就是說，不應該片面地傾向激進主義而忽略穩健的文化保守主義；相同地，對激進主義的再評價，也絕對不應變質到對文化保守主義的完全肯定。從這些論述裡，筆者能感受到他的苦悶。筆者在北京發表的論文中，分析 20 年代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崇洋風

潮，與爲了駁抗而出現的東洋文明優越論，也屬於對此主題的一種回應。

五四研究的主要焦點之一，即是五四的時間的劃分問題，對此課題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解釋。閔斗基在發表的論文中，主張把辛亥革命視爲第1次共和革命，把五四運動視爲第2次共和革命。他所提出的新的現代史時期的劃分，屬於此研究的代表例子。

另外，透過統計《新青年》雜誌上被使用的「科學」與「常識」兩個關鍵詞之用法，分析其如何成爲意識型態的象徵或符號過程(金觀濤、劉青峰)；分析對俄國文學的誤讀及其中國文壇之影響的實證研究(林精華)，都是特殊的研究方向。值得重視的是，作爲新研究方向之一的，即復原「作爲史實的五四」，以求更接近其整體性質的呈現，研究對象在人物、群體、地區等方面都呈顯出多樣性。張聞天、錢玄同、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高一涵、殷海光、朱光潛、王希天等，以往較少受五四研究者關注的人物，都獲得進一步的研究與新的評價。除近來較受關注的論題，有關商人與女性等群體的研究動向外，在這次研討會上所發表的天主教、穆斯林與五四之間的關係，也引起了與會學者的注意。另外，從杭州、山東、臺灣等地區的角度，重估五四的必要性也被提出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論述臺灣與五四運動之關係的兩篇論文，明確指出在當時仍處於日本支配下的臺灣，雖然有新文化運動的流入，但在臺灣所發展的新文化運動卻與大陸不相同。也就是說，白話文運動與民眾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的距離，但卻從這樣的刺激與反省下，興起「臺灣語文運動」，進而促進臺灣本土化運動。

如此，擺脫五四神話的論說，將隨研究方向的多面性而逐漸呈顯原貌，這可以說是五四研究的大進展。不過，在歡迎這些成就的同時，心中有著某種遺憾。五四不像是破裂的玻璃弄在一起可以復原的東西，此問題可以成爲歷史學事實與解釋間的論爭，然而此短文裏筆者僅強調自己對五四研究的看法，即五四不但是歷史的敘述，而且參與了現實的實踐，在此看法上筆者爲五四研究進展而提出幾點意見。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從地理範圍、社會範圍都無疑是一場普遍性的運動，這是被人廣泛接受的事實。不過，最近出現的部分五四研究中，有意突出五四的某些側面，同時也有意地隱蔽五四另一些側面的傾向。從兩地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來看，明顯看出對參與五四運動的民眾的關心相對地減少。如此傾向不單純是參

加研討會的研究者性格，也反映目前主要的研究動向。這可以理解為今日對無產階級特權化(尤其在大陸的正統學說)的一種反動。不過，若考慮到五四是由學生與民眾攜手獲得勝利的第一次政治參與經驗，且「到民間去」的口號在當時具有相當強烈號召力的事實，對這個新主體之形成，進行多方面的研究，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因此，除了目前受到注目的五四時期商人、知識階層的女性外，應該對學生、都市貧民、工人、下層女性、農民等，都給予應有的關注。當然對這方面的關心不應只將他(她)們的行為解析為浪漫或美化，而應該從歷史脈絡中把握到各階層群體間的結構性位置。

同時，五四研究應採取新的研究視界。雖然表面上五四運動是一個中日之間的紛爭，但從宏觀角度上看，應視為東亞地區的重要歷史事件(以東亞地區作為媒介爆發的歷史性事件)，進而分析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與作用關係。儘管桑兵在兩地分別依據日本與韓國的資料，以實證方法闡釋新文化運動的國際反響，但他只尋找五四對日本與朝鮮的影響，卻未注意到基本的核心問題，即處於不同狀態的兩國，為何開始關注中國新文化運動？因此東亞地區的新文化運動所具有的共性無法明顯地呈現出。

因此，同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韓國的「三一運動」以及日本的「米騷動」，不應該簡單地被認定為個別國家的事件或是誰影響了誰，而應該通過宏觀的東亞區域研究，解析彼此相互關聯的歷史發展。從這觀點重估五四才能顯示五四的課題不僅僅是近代的適應，而是既有體驗近代的壓抑，同時力圖克服的深刻性內涵。

五四對中國人，甚至對志向純粹的學術研究工作者，是一個參與現實的符號而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對過去 100 多年來為了達成現代化，而著急「與時間相競爭」的中國人來說，儘管五四的運動時間如此的短暫，具體成果如此的不堪，卻還承載著人民期待完成的眾多理想。五四所提出的「科學」和「民主」，是在現實世界裡無法實現的痛苦經驗的累積，因此人們對五四的記憶不但越來越珍希，而且，每當對這些課題的解決有更積極的要求時，五四的符號更強烈的現實意義而復活。從某種意義上，對中國人而言，五四是一個歷史的巨大負荷，因著對五四的看法不同--如同在兩地研討會呈現出一對此負擔的感受也不一樣。五四的未來，就決定於圍繞在所謂五四符號的不同競爭勢力間的對抗與選擇。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民國時期在二十世紀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反思與再考量）」

國際會議報導

羅久蓉*

The Role of the Repbu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民國時期在二十世紀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反思與再考量）國際會議是由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 (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義大利 Università Ca' Foscari di Venezia 東亞系、馬可孛羅中心、與 Giorgio Cini Foundation 威尼斯東方學院合辦，於 1999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在威尼斯舉行，來自東亞、澳洲、歐美各地約五十位民國史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45 篇，從不同角度對民國史研究交換意見，除了利用過去未曾使用過的檔案資料，提出新觀點，發掘新議題之外，也對民國史研究做了回顧與展望。會議採單軌制，由於論文篇數不少，議程安排相當緊湊，論文作者及篇名表列如下：

Thursday, July 1, 1999		
09 : 00-09 : 30	Opening ceremony and official addresses	
09 : 30-10 : 15	Keynote speech William C. Kirby (Harvard Univ.)	
SESSION 1: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10 : 30-11 : 45	Zhang Xianwen (Nanjing Univ.)	<i>Fifty Year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i>
	Tatsuo Yamada (Keio Univ.)	<i>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i>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Axel Schneider (Univ. of Heidelberg)	<i>Conservat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i>
11 : 45-13 : 15	Hsueh Chun-tu (Huang Hsing Foundation, USA)	<i>A Commentary on the 1911 Revolution : The Dual Leadership of Sun Yat-sen and Huang Hsing.</i>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Univ. of Heidelberg)	<i>Xinhai Geming Revisited.</i>
	Stephen Averill (Michigan State Univ.)	<i>The Transition from Urban to Rural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i>
	Antonia Finnane (Univ. of Melbourne)	<i>Vestimentary Regimes and the Rupture between the Republic and People's Republic.</i>
SESSION 2: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IMENSION		
14 : 30-16 : 30	Vitaly Kozyrev (Moscow State Univ.)	<i>New Trends in Polarization of Power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1927-37).</i>
	John Fitzgerald (La Trobe Univ.)	<i>Demilitariz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Civil Author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1911-1937.</i>
	Chen Hongmin (Nanjing Univ.)	<i>In Power or Not in Power: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Hu Hanmin(1931-36).</i>
	Margherita Zanasi (Univ. of Texas at Austin)	<i>Resizing Chiang Kai-shek: the GMD Lef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Nation in the 1930s.</i>
	Roger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	<i>Zhang Junmai(Carson Chang)and the Chinese Third Force, 1949-1954.</i>
16 : 45-18 : 15	Thomas Kampen (Univ. of Leeds)	<i>Zhou Enlai and the CCP's Special Branch in the 1930s.</i>
	Zeng Yeying	<i>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War against the Gui Clique in 1929.</i>
	Diana Lary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i>Two Republican Generals: Bai Chongxi and Cai Tingkai.</i>
	Shen Yu (Indiana Univ. Southeast)	<i>Two Tales of One City: Peiping/Beijing 1945-48 and 1948-50.</i>

Friday, July 2, 1999
SESSION 3: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09 : 00-10 : 30	Peter Zarrow (Univ. New South Wales)	<i>Contesting the Republican Citizen under Yuan Shikai, 1912-1916.</i>
	Marilyn Levine (Lewis-Clarke State College)	<i>Polemics, Politics and Purity: Wang Guangqi and the Modern Chinese Identity.</i>
	R. Keith Schoppa (Loyola College in Maryland)	<i>Cultural Identities among Republican Period Shaoxing Elites: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Context.</i>
	James Gao (Univ.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i>The Origins of Mao's Cultural De-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unan, 1919-1949.</i>
10 : 45-12 : 15	Chiara Betta (Univ. of Indianapolis, Athens)	<i>Silas Aaron Hardoon: Business, Politics and Philanthropy in Republican Shanghai, 1911-1931.</i>
	Marcia Ristaino (Library of Congress)	<i>Russian Girls in Shanghai Pleasure Quarters, 1920-1949.</i>
	Kam Louie	<i>Chinese Masculinity on the World Stage: Lao She in London, 1924-30.</i>
	Louise Edwards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	<i>Women and Citizenship: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Republican China</i>
SESSION 4: CULTURE, MEDIA AND PROPAGANDA		
14 : 00-15 : 30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CNRS, Paris)	<i>The Use of Propaganda in Republican China.</i>
	Stafutti Stefania (Univ. of Turin)	<i>Not Only Literature: Magazines and Reviews in Republican Shanghai.</i>
	Larua De Giorgi (Ca' Foscari Univ., Venice)	<i>The Fourth Front: Radio Broadcasting under GMD Rule, 1928-1945.</i>
	Liang Kang (Seattle Univ.)	<i>Rethinking May Fourth: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Wartime Chongqing.</i>
SESSION 5: THE SINO-JAPANESE WAR: RESISTANCE, COLLABORATION AND ECONOMIC IMPACT		
15 : 30-17 : 00	Huang Meizhen (Fudan Univ.)	<i>The Evolution of China's Japan Policy, 1931-37: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i>
	Brian Marti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i>Shield of Collaboration: the Wang Jingwei Regime's Security Service, 1939-1945</i>

17 : 00-18 : 30	David Barrett (McMaster Univ.)	<i>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under the Wang Jingwei Government, 1940-45: How Authoritarian a Regime was It?</i>
	Wang Ke-wen (St. Michael's College)	<i>Portrait of a Puppet: the Final Years of Wang Jingwei, 1940-44.</i>
	Parks Coble (Univ. of Nebraska)	<i>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 1937-45.</i>
	Christian Henriot (Univ. Lumière Lyon II-CNRS)	<i>War and Economics: the Control of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Lower Yangzi and Shanghai Area between 1937 and 1945.</i>
	Richard Yungdeh Chu (Rochester Inst. of Tech.)	<i>Forced Chinese Laborer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i>
	Toshiro Matsumoto (Okayama Univ.)	<i>The Legacy of Quick Reconstruction by the Nationalis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Manchukuo.</i>

Saturday, July 3, 1999**SESSION 6: STATE AND NATION-BULDING**

09 : 00-10 : 45	Piero Corradini (Univ. of Rome "La Sapienza")	<i>Fiscal Policy and Foreign Loans in the Years of the Republic.</i>
	Alexander Pisarev (Univ. of Moscow-Tamkang Univ.)	<i>State and Peasant in Republican China: Dilemmas of GMD Agrarian Politics.</i>
	Ka-che Yip (Univ.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i>Building a Strong China: Perspectives on Health,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i>
	Larry N. Shyu (Univ. of New Brunswick)	<i>Nationalist China's "Minority Policies": the Case of Han-Hui Relations.</i>
	Michael Meyer (Univ. of Heidelberg)	<i>Continuity and Conflict: Chen Yi's Economic Thinking and his Economic Policy in Taiwan.</i>

SESSION 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PUBLICAN CHINA		
11 : 00-12 : 45	Thomas Grunfeld (SUNY-Empire State College)	<i>The CCP and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the Case of Rayna Prohme, 1925-27.</i>
	Ch'i Hsi-sheng (HK Univ. of Science & Tech.)	<i>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i>
	Lo Jiu-Jung (Inst.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Law in the Forties: Roscoe Pound in China.</i>
	Florentino Rodao	<i>Franco's Spain at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i>
	Guido Samarani (Ca' Foscari Univ., Venice)	<i>Tianxia da luan (Great Confusion under Heaven). Italy's Policy towards China, 1943-1947.</i>
13 : 00	CONCLUSIONS BY LARRY SHYU CLOSING THE CONFERENCE	

第一天開幕式之後的主題演講，由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William C. Kirby 擔任，題目是 "China's Republican Century"，他推崇民國時期各項建設的成就，為日後發展奠定基礎。他特別強調歷史的延續性，認為民國史在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佔重要地位。

張憲文接著對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做了一番評估，經過數十年“坎坷的道路”，他期許今後中國史學勇敢地迎接新時代的挑戰。山田辰雄 (Tatsuo Yamada) 則針對歷史的延續性，提出看法。他指出，20 世紀中國政治有三大特徵，從民初一直接續至今，是研究民國史不可不注意的，它們分別是：一、國家民族的認同危機；二、黨的一元化領導；三、從上而下的領導方式。他並從歷史上說明為什麼直到今天中國仍未發展出一套合理的權力運作制度。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與 Axel Schneider 分別從史學史的角度，對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中國保守主義兩個歷史概念提出質疑。Weigelin-Schwiedrzik 重新檢討辛亥革命的性質，她指出，1911 年的武昌起義之所以被認為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主要是人們創造與建構出來的產物，不像法國大革命或美國獨立革命，是社會內部動力凝聚而成，因此只能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動，社會結構並未因此而起根本的變化。

Schneider 指出，Guy Alitto 把中國保守主義看作是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反應，雖然因此避免了刻意凸顯中國非西方特質的所謂東方主義式的疏漏，卻也抹煞了中國保守主義的特殊性。他同時質疑 Charlotte Furth 採用文化、政治二分法來分析中國的保守主義。

以中國近代國家形成為主題的論文觸及國民政府的各個面相：Alexander Pisarev 研究國民黨農民政策；Piero Corradini 討論國民政府的財政政策與外債；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論民國時期對宣傳的運用；Laura De Giorgi 處理 1928 至 1945 年國民黨對廣播的控制；Larry Shyu 討論國民政府的回民政策；John Fitzgerald 以 1911 年至 1937 年廣東地方政府收編民團與地方武裝勢力的經過，探討社會軍事化與民間力量消長的問題；Vitaly Kozyre 探討南京政府時期權力結構的變化與國家形成的關係；羅久蓉以美國法理學家龐德與中國法學思想發展為例，探討中國選擇性接受西方法學思想的歷史背景；Michael Meyer 從歷史延續的角度，研究戰後台灣第一任行政長官陳儀的經濟思想及其推動的經濟政策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葉家熾的論文主要看國家如何透過醫療保健，及社會醫療菁英資格的鑑定，強化國家的角色，然而，他同時也發現，與軍事、經濟、財政、外交方面的建設相比，衛生保健在國家建設中所佔的比重並不大，這種情形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尤為明顯。

集體記憶與認同是錯綜複雜的民國史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Peter Zarrow 的文章討論袁世凱統治時期對於公民觀念的詮釋；R.Keith Schoppa 的 *Cultural identities among Republican Shaoxing elites: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context* 探討民初以來人們如何紀念秋瑾、徐錫麟、陶成章三位紹興人，以及這些集體記憶的建構如何反映現實政治的劇烈變動，他把中國近代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二階段從 1927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末中共改革開放，他認為毛澤東時代應視為南京國民政府時代與 1979 年以後當代中國之間的過渡期，民國時期的歷史，在他看來延續性大於斷裂性。

然而，歷史的斷裂也在許多人們不經意的地方流露出來。人如果真如張愛玲所說，是活在他們所穿的衣服裡，那麼 Antonia Finnane 從服裝看出的 1949 年政權轉移所造成的斷裂應屬無可置疑；1955 年，中共在推行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藉性別區分與服裝多元為名，發起一項服裝改革運動，結果是將旗袍與長袍徹底逐出人們的生活。Stefania Stafutti 以民國初年上海地區流行雜誌的圖片與內容，觀察通俗文化趨向，提供了另一種角度的社會觀察。

人物史仍是民國史研究一個重要的著力點，究其原因，或許透過對歷史人物的解析與描繪，能使我們更為貼近一個時代的氛圍與精神。此外，歷史無非人事，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人物解讀以及因此產生的敘事效果，永遠有它引人入勝之處。隨著學術多元化的發展，人物研究的取材角度亦愈加寬廣，不過，此次大會論文仍以民國時期的政治領導人為大宗，包括薛君度的孫中山與黃興、Thomas Kampen 的 30 年代周恩來與中共特務組織。其中與蔣介石相關的論文就至少有三篇：Margherita Zanasi 從汪精衛、陳公博國民黨左派的觀點，指出 30 年代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建立現代國家，軍事謀略之不可恃；曾業英則根據台灣國史館新近開放的大溪檔案，分析蔣介石 1929 年在對桂系戰爭中的軍事謀略，作者對其戰略運用予以肯定，認為除了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戰略成功也是致勝要素；陳紅民利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把蔣胡二人的政治分合放在抗日、反共等歷史背景下來看，充分凸顯政治恩怨的複雜性。對蔣介石重新評價，是近幾年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一個新趨勢，曾、陳與 Zanasi 的出發點與關懷顯然不盡相同。

研究政治人物，外表與內心世界的差距最難把握，然而，對歷史學者而言，探討主觀與客觀、現實與理想、行為與動機之間的緊張關係，卻又是最具挑戰性的工作。王克文從汪精衛“最後的心情”這個角度剖析汪政權的自主性與日汪關係，正是汪記和平運動成敗的關鍵。Roger B. Jeans（金若杰）的文章處理 50 年代張君勸與第三勢力組織“中國民主自由戰鬥同盟”之間的關係，雖未觸及張的內心世界，卻顯示動盪時局下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無奈與飄泊。Diana Lary 則惋惜白崇禧、蔡廷楷兩位非嫡系將領未能在抗日戰爭中受到重用，她認為將才是物資、戰略、戰術之外打勝仗的另一要件。

Marilyn Levine 的王光祈研究，顯然是在嘗試一種另類的歷史書寫方式；她跳出政治人物的框框，把觸角伸向其他學科領域，試圖捕捉王光祈生命的神髓。文章採用 *chronotopic framework*（根據作者的解釋：*chronos* 代表時間；*topos* 代表地點），把王光祈的一生分三階段重點呈現，從他參與新文化運動、少年中國到後來赴德國研究音樂理論，每一時期都包括歷史敘事與作者所謂的“*imaginary diocene*”兩部份，展現藝術與人生的關係，多了一點創意，也添加了幾分想像。

討論婦女相關議題的論文總共有六篇，但只有 Louis Edwards 一篇是關於政治，她把焦點放在民國時期的婦女參政活動，駁斥中國大陸學者有關中國婦女是在 1949 年之後始取得投票權的說法。除了從意識形態、思考方式、

以及婦權與國權的關係等角度探討為什麼婦女參政問題在中國大陸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外，她也指出，從清末到民初，婦女爭取參政權，並非只是伸張國權的手段，相反的，她們運用各種策略，來因應不同的政治環境，為婦女投票權奮鬥。同樣的，她們對國民黨的支持也應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看：她們支持國民黨，不僅因為擁護國民黨，也因為她們認為國民黨能夠帶來穩定和繁榮，而國家安定富強有助於婦女政治地位的提昇。

相對於民國婦女積極爭取男女平等，現代中國男性氣質轉變過程中，婦女卻是缺席的一方。雷金慶(Kam Louie)分析老舍的小說〈二馬記〉發現，一旦婦女開始識字受教育，中國男士就再也無法以文弱書生形相在兩性關係中取勝，因為具有犧牲奉獻傳統婦德的女性已經走入歷史。當二馬父子二人在倫敦面對西歐強勢文化，受到西方男性陽剛氣質的挑戰，卻無力招架時，事實上也就意味著傳統中國男性美的破產。

民國時期外國婦女在華活動也引起廣泛興趣。Thomas Grunfeld 筆下的 Rayna Prohme 是一位具有冒險精神的美國女子，因緣際會來到中國，為中國共產黨搖旗吶喊，曾經擔任宋慶齡的秘書，陪她一道赴俄，最後死在俄國。作者指出，當年類似 Prohme 這樣的美國左派人士不在少數，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後中共與美國的關係，1972 年中美關係解凍，也不能說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Chiata Betta 的文章處理猶裔商人哈同如何透過商業與慈善活動廣交中國政經、文藝界名人，她也談到歐亞混血的哈同夫人羅迦陵對丈夫的影響力，以及他們夫婦如何在中國、猶太、佛教、回教文化之中找尋精神上的寄託與認同。Marcia R. Ristaino 討論 30 年代白俄婦女淪落上海聲色場合的遭遇。同樣是背井離鄉，但身無長技的女難民面對的卻是十里洋場的殘酷現實，文化認同對這些失去國家保護的女性而言，可能是太奢侈了一點；作者特別提醒讀者，這些白俄婦女不但未如其他在華外人一般受到治外法權保障，反屢遭各國人士排擠打壓，理由是她們丟盡上海租借外國人的臉。

有關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政權與日本合作的文章共有五篇，顯示學者對這個領域的興趣正方興未艾。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克文關於汪精衛晚年心境的論文之外，Parks M. Coble 以三位實業家面對抗戰變局的選擇與因應過程為例，指出中共“愛國資本家”的論述不足以概括這段時期政商關係的複雜面貌；Christian Henriot 從物資統制的角度，考察日本與汪政權在長江下游與上海地區奪取資源的政策及執行成效；David Barrett 處理的是汪精衛政權是否為一極權政權的問題，亦即，它對淪陷區的掌控到達何種地步？他指出，從

宣傳與新聞檢查兩方面來觀察，汪政權既無法從日本侵略者手中爭取到實質上的獨立自主，又提不出足以說服國人的愛國、救國理論，凡此種種，皆顯示汪政權內憂外患，欲振乏力，這種情形愈到後期愈嚴重；Brian Martin 繼青紅幫之後研究汪政權的特工組織，他主要把這段血腥歷史放在汪精衛和平運動從醞釀、成立到結束一個整體架構下來看，探討特工組織及重要領導人在汪日關係互動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代表的意義。

研究汪精衛政權，不能脫離中日戰爭的歷史脈絡。這次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論文有：黃美真討論 1931 年到 1937 年抗戰爆發前的中日關係；朱永德介紹日本佔領下強徵華工的研究成果，是一篇血淚的控訴；松本俊郎 (Matsumoto Toshiro) 則對 1949 年後鞍山鋼鐵廠的重建成效進行評估，並比較國民政府與中共的戰後重建工作。

梁侃 (Liang Kang) 的論文也是環繞著抗戰主題；他對戰時重慶白話文運動的研究顯示，基於宣傳需要，五四白話文運動在抗戰時期第一次有可能走入民間，但由於國民黨不表支持，而左翼文藝界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上這個問題上，又因內鬨無法取得共識，終於導致運動失敗；高錚 (James Z. Gao) 強調對中國共產黨而言，不僅是城市影響鄉村，也是鄉村影響城市，他以魯南為例，說明中共在發展過程中，如何受地方文化與農民傳統影響，因而改變了它城市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性格。與此相關的是 Stephen C. Averill 的論文，他認為 20 年代末期中共從城市走入農村的發展，與 19 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變遷及地方權力結構的轉變有關，而非如過去學者所認為的只是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之間“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果。從 1945 到 1949 年，文化古城北平二度面臨政權轉換的命運，沈于的論文比較了 1945-48, 1948-50 年間國民黨與共產黨接收北平／北京的異同。

就中國對外關係而言，抗戰是一個轉捩點，不但於 1943 年先後解除了百年桎梏～列強在華領事裁判權，且戰後躍居五強之一。過去受限於史料及其他因素，有關戰時外交的研究一向不多，這次齊錫生利用大溪檔案，探討抗戰時期國府的對美外交；東道主 Guido Samarani 利用義大利檔案，研究 1943 年到 1947 年義國對華關係，分別提出新的觀點。唯一遺憾的是西班牙教授 Florentino Rodao 因故未克出席，他預定宣讀的論文題目為 *Franco's Spain at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最後一場討論會於 7 月 3 日中午時分結束，大會在榮譽主席徐乃力總結之後，圓滿閉幕。



學術演講

退休感言：研究院成全了我

蘇雲峰*

首先我要感謝呂所長的安排與鼓勵。他希望我講個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所以我用了這個題目。除交待我成長的背景外，主要強調個人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如果我在另外一個環境工作，不論成功或失敗，絕對不會是今天的我。

我自一九六一年七月到本所當臨時人員起到現在退休為止，計有三十八年，其間在圖書館服務十年，出國進修二年，專職研究約二十六年。共出版專刊五本，發表論文五十篇。另一本專刊稿《抗戰前夕的清華大學，1928-1937》，已審查通過，將修改後出版。不論是專刊或論文，都獲得不錯的評價。這些成績在學術史上不過是一個點滴，但從我個人的立場看，則有重大意義，因為沒有人對我有過這樣的期待，我自己當初作夢亦沒有想到。李國祁教授說寫傳記要注意關鍵時代，我是穿越許多關卡才有今天的。

我們這一代人多數在戰亂、貧窮落後和流亡的環境中長大。我早年接受的教育水平很差，既不連貫，亦非學術導向。我在日本佔據海南時期，受了四年日本小學教育，抗戰勝利後續讀高小二年，初中二年半，以同等學力更名(雲峰)跳升同校高中春季班，讀不到兩個月就和家兄蘇謀及另一位同學王永誠冒名頂替三個三等兵，¹隨海南補給司令部撤退來台灣高雄，改編入陸軍第六十四醫院當看護兵。當時整天與情緒煩躁不安的傷兵為伍，心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乃準備投考軍校，為家叔勸阻，改向醫院請准長假投考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小學服務三年，讀台灣師大學國文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¹ 我們三人都上新竹師範，蘇謀後任台灣通用公司半導體生產帶經理，麗正電子公司總經理、廠長，是半導體專家。王永誠為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屏東師範學院教授。

修科二年，轉社會教育系圖書館組再讀三年，這是一個關鍵。師大畢業後，蔣復璁老師要我去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工作，但史語所圖書館館長藍乾章老師已先介紹我到近史所來，這是改變我一生的關鍵時刻。

我曾於陽明山實習一個暑假，知道那邊的建築設備和自然環境，比中央研究院好，圖書館亦已有規模。我選擇南港的原因有二：一是覺得近史所圖書館像一塊荒地，有我開拓的空間；二是覺得這裡是讀書的好地方，研究人員有如「天之驕子」，心中非常羨慕。當了半年臨時人員後，郭所長要給我補缺。我希望當助理員，因行政人員有意見，郭所長報請總辦事處補事務員缺。我從旁知道後，當晚去師大宿舍求見，表示我已考取某大學研究所，如果無法補助理員缺，我就去念書。他說事務員待遇比較好呀！我說我還年輕，有理想和希望，不在乎金錢。他說可以考慮。第二天一早，張朋園先生為圖書館替我說項。於是郭所長找我去，說：「不必去念書，其實，那裡也沒有什麼好念的，你留下來罷。」當天即派人到總辦事處收回那份公文，改聘我為助理員，負責圖書館工作。

我闖過這一關後，一面努力工作，一面讀書，參加研討會，與同事們一起學習英、日語，並著手研究。由於圖書館工作表現良好，又負責興建了現在B棟第二、三期工程(經費少問題多，我現存有〈近史所五六工程紀事〉)，同時亦寫了《張之洞與晚清教育改革》一稿(未刊)，一九六八年升為助理研究員。一九七〇年，郭所長在福特補助款項下派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去進修兩年，並對我說，回來後由我自己決定作研究或回到圖書館去。於是我想去修歷史。一位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同事，建議我讀圖書館學。他說「歷史有什麼好念的，沈剛伯的西洋史，聽數周後就沒有什麼可聽的。」我知道研究院重視圖書資料搜集，卻非常忽視圖書館經營管理，各所各自為政，老死不相往來，很難改變。如果我學圖書館，就非得離開近史所向外發展不可。於是決定到哥大師範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主修歷史與教育，得碩士學位。回來時，適新所長梁敬鋒已指派他的親信去負責圖書館了。我別無選擇，只好從事研究工作，這是另一個關鍵時刻。

我是一個普通智商的人，基礎脆弱，又非科班出身，要擠入歷史領域，非虛心學習，努力以赴不可。一九七二年底發表〈康有為主持下的萬木草堂〉一文，是獲得張朋園先生指導的。二年後，《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一稿，蒙李國祁和亓冰峰兩位先生指正修改後，通過審查，順利地升為副研究員。在這段期間，適逢李國祁和張朋園兩位先生籌劃第一期中國現代

化的區域研究計劃。我原先不在被邀名單，後來負責湖北省的鮑家麟女士出國，邀我遞補，這是另一個關鍵點。這個計劃後來改由張玉法先生主持，延續了近七年之久。大家都知道，本所從一九六五年起，人事就動盪不安，七十年代初餘波盪漾，我除了參與所裡和院內的一些改革活動外，大致是兢兢業業，認真研究工作，收穫亦相當豐碩。

憑這幾年區域研究成績，一九七九年升為研究員。院方要求我的升等代表作必須在一年內出版。我正準備修改時，突然患了鼻咽癌，接受痛苦的電療，使我的人生又進入另一個階段。幸好得到亦是癌症患者的台大醫院病理科李豐醫師的鼓勵，勇敢地面對現實，繼續修改工作。《中國現代化之區域研究：湖北省》一書，是在這種天人交戰的情況下被逼出來的。當時難免滿腹委屈，後來也覺得不錯，因此書為本區域研究計劃的第一本，且深受湖北人士歡迎。

此書出版後不久，一位可敬的學長對我說：「雲峰啊，你已達到最高頂，再上不去了。」我問此話何指？他說：「作官沒有你的份，我是指學術而言。因為你沒有歷史系的基礎訓練，很難再升上去。」我回答現在很難說你對錯，須待時間來證明。於是更加努力研究，發表論文。數年後他又對我說：「雲峰啊，你現在已跑到我們的前面去了」。我說：「那裡！我還在你們後面追隨著呢。」他的話證明我已作到超越自己。在這裡，我非常感謝他坦誠相告。

關於作學問的途徑，或由博而專，或先專後博，各有主張。我因基礎脆弱，起步太晚，只好從工作中學習，邊學邊用，瑣碎淺薄，系統不夠深入，其結果當然是不專亦不博。

我的研究領域大致是環繞著張之洞、近代教育史、湖北和海南區域史。這與最初的選題有關。有本事的人可以去選熱門題目，而我開始時是茫然不知如何選擇的。我研究張之洞與近代教育是胡秋原先生建議的。張之洞於當時並不是熱門題目。教育史直到今天仍舊少人問津。不過由於研究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而被邀請參加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擴大了我的視野，學到新的研究方法，對後來的其他專題研究都有幫助。至於清華和海南是我自己的選擇。最初研究清華校史是出於好奇和對清華人的羨慕心情，完全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和困難度。前年何炳棣院士告訴我說那是第一等題目啊！令我大吃一驚。的確不錯，我的《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一書，獲得兩篇佳評，亦受清華校友歡迎，北

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向我要了六本。大陸上近年來出版許多清華校友的回憶、日記和有關清華的論著，也許和我這本書有點關係。至於研究海南是出於鄉情。我覺得海南自然資源比台灣豐富，內地化亦比台灣早，過去一直被冷落，我應該為它寫點東西，做起來也得心應手，非常痛快。累計已寫了一本專書和九篇論文，準備退休後出《海南史論文集》。

選定題目後，我都有點鍥而不捨的精神，不因人言而輕易放棄。例如我根據一件新發現的張之洞電牘，認為張之洞亦心儀民主制度，二位老同事說那件電牘不可靠。我不服氣，繼續探索，結果寫出〈張之洞的中國官僚民主化構思〉一文，文章雖短，頗受稱許。再者，我原本只想寫一篇有關海南大學的短文，有位同事說，他一九五〇年初曾帶兵住在海南大學裡，什麼設備都沒有，肯定我寫不出來。後來我在教育部檔案室發現一大宗私立海南大學的檔案，如獲至寶，再訪問一位海南大學的董事和若干在台師生，出版《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一書，震撼海南學界。很幸運，到目前為止，未曾發生過選題後寫不出來的事情。也許如同張朋園先生所說，此與參加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有關。

對資料之處理，我因學過圖書分類編目學，比較順手。六十年代我用分片盤處理卡片資料，七十年代用中央卡系(打孔)卡片，自編標題碼，抓資料更快。八十年代後期起用中文電腦，不過，當時中文視窗尚未出現，內人曾替我寫一個建立資料卡及檢索程式。東吳大學林聰武教授為我設計作論文附註的程式，二者對撰修文稿都大有幫助。

關於歷史研究方法，我不會比其他人高明。不過，除歷史敘述法外，我比較喜歡用辯證法(包括心和物)和統計法這兩個工具。我每本書和論文幾乎都有統計分析。曾經一度請教統計學家使用回歸分析法，繪製民初學生成長曲線，因數據與文字資料不足而罷。至於辯證法只採用其分析問題的模式。雖然曾用過現代化理論、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和政治系統論，但覺得這些理論都可以包涵在辯證矛盾統一法則的模式以內。辯證法許多人都在使用，過去因為政治禁忌，大家不肯講，歷史系的老師亦不敢教。其實，從學術立場，它是觀察和分析事物發展與變化的好工具。譬如很多人緊抓《勸學篇》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思想，保守、固定不變。其實，清末已有人說他思想變動不拘：「有時是保守中的前進者，有時是前進中的保守者」。不過沒有說出變動的原因罷了。我用矛盾統一律分析，發現體和用這個矛盾統一體，因國內外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主輔易位，產生時左時右

的思想曲線。據此而寫〈張之洞的教育思想〉一文，得到張灝教授的青睞。

至於科際整合，八十年代，我運用社會科學的粗淺知識，寫了清季和民初社會階層等多篇文章。其中我要談談〈民初知識份子〉(1982)一文。大家知道周策縱和許多學者都肯定五四運動的正面影響，而原諒甚至否定它的負面作用。我承認五四的正面影響，但指出它亦有嚴重的副作用。我的這篇文章就利用社會物質基礎和社會價值的互動關係理論，繪製成理想的二者對應平衡線(見下圖)，並標示出民初知識份子的價值趨向(民主、自由和共產主義)，由農業社會跳躍到後工業社會階段去，以致拉高社會的張力，才使社會不安，尤其是破壞了大中小學校園的倫理和秩序。有位香港大學高級講師請我譯成英文，由他主辦的港大刊物發表。我將譯稿寄去時，適他出勤，代理主編為周策縱的學生，認為我批評他的老師和五四運動，退稿還我。後來改登在李又寧主編的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上，還有一位法國研究生來信要去參考。值得一提的是，我有一位學生在大學任教。他每年都印發數篇同類的論文，要學生閱讀比較，結果是我這篇論文較受歡迎。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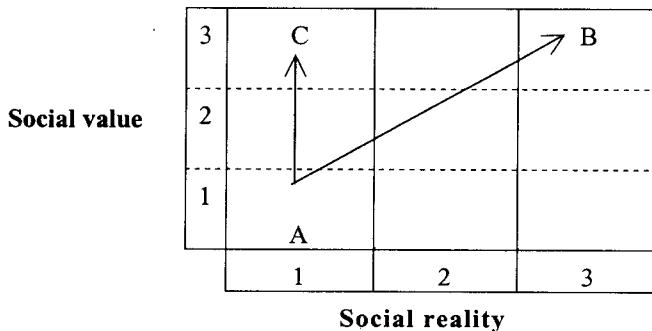


Figure.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Values and Reality

Notes: (1)The arabic numerals represent corresponding stages of social reality and social value; Any point on the equilibrium line AB is the balance point between social reality and social value that will cause less social tension; (3)The line AC indicates that the response of social value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intellectuals overshoots its related equilibrium point above the line AB from stage 1 to stage 3. The farther the C point extends beyond the equilibrium line AB, the more serious the social tension it produces. This wa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sponse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我覺得本院活動中心前廣場那塊「學人頌」，頗能表達本院的精神。上面除提到力求新知、堅持真理、關懷和回饋社會外，還說到「在這裡，激盪智慧，超越自我，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此語讓我產生共鳴。我可以說，「就在這裡，我超越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歷史」。研究院成全的人很多，不過像我這樣例子的很少。因此，我非常感謝中央研究院和近代史研究所，尤其感謝故所長郭廷以先生的栽培，和許多同仁在學術上對我的批判、指正，在感情上對我的關懷、鼓勵。

在關懷和回饋社會方面，過去由於白色恐怖，大家都有所約束，不過，七十年代初，我也會熱心參與本所和本院的改革活動。本所十五位同仁提出的十項改革建議，梁所長拿去告訴錢院長，說我們是「紅衛兵」呢！後來覺得改革亦不容易，專心研究罷！也許是籌劃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劃的原因之一。一九八五年我訪問哈佛大學回來後，覺得應該回饋研究院。在圖書館自動化問題上，院方和各所主管當時都甚冷漠。我主動和前計算中心主任謝清俊先生聯繫，推動本院圖書館之自動化，目的在經由自動化而整合全院的圖書館，使資源流通共享。費數年之効，突破重重難關，為今日之自動化奠立基礎。²當時我對本院圖書館整合化的構想，今天差不多都實現了。本所的電腦室亦在我建議下才籌設起來的。

今天的研究院，不論在軟硬體和人才品質方面，都非昔時可比，且院、所都有好的領導。本所行政人員素質、服務熱忱和工作效率亦比以前高強。諸位年輕朋友個個比我聰明，學術基礎堅固，起點比我高出很多，若能專心一志，未來成就不可限量，而本所之前景亦將更為光明。

最後，我要借這個機會感謝內人王逸如女士，她犧牲奉獻，同甘共苦，疾病相扶持。我的兒女都知上進，不須我操心。感謝家兄嫂對我健康的關懷和付出。沒有他們，我亦難活到今天。敬祝大家健康快樂，謝謝蒞臨指教！

² 吳院長和我在本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啓用典禮上的致詞，《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通訊》卷 9，期 3（民國 82 年 2 月 8 日）；和小記者周傳久對我的特寫，同上通訊，卷 5，期 25（民國 78 年 12 月 18 日）。



學人簡介

從圖書館走向歷史研究： 蘇雲峰先生的學術生涯與成就

沈懷玉*

一、由圖書館領域跨向研究之路

蘇先生雲峰於 1933 年出生於海南島崖縣，1961 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圖書館組，隨即到近代史研究所服務，最初擔任臨時人員，由於工作表現，深獲所長郭廷以先生賞識，1962 年元月，郭先生將他補為事務員，負責圖書館業務。由於先生的興趣已趨向於研究，在他的堅持下，郭先生將報到院方總辦事處的公文追回，改聘為研究系統的助理員。先生乃得以研究人員的身分兼管圖書館業務，這是先生生命中的一大轉折，也因此，先生對郭廷以先生常懷感恩之心。

先生深受譚嗣同著作的影響，思想急進，不安現狀，遇事時鬥志昂揚，不怕困難，故對圖書館業務的整頓及負責規劃興建本所的 B 棟大樓（其中包括圖書館、書庫）期間，均抱持不畏猜忌、克服行政陋規的態度處理之。

先生除負責圖書館業務外，還參加所中的學術討論會，聆聽所長及同仁的專題報告，勤學英文、日文，並著手進行近代史專題研究。1968 年升任助理研究員，1970 年，在郭廷以先生大力支持下，獲福特基金補助款資助，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1972 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本應繼續兼任圖書館業務，因新任所長梁敬𬭚已另有安排，乃專心致力研究工作，而於 1974 年升任副研究員，1979 年升為研究員。

先生不再兼圖書館業務，張朋園先生很惋惜的說是近史所與研究院的損失。另方面，張先生又肯定先生走到研究之路是走對了，因而成就了他自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先生自謙不是科班出身，要擠入歷史領域，非努力不可。事實上，先生因有圖書館學訓練背景，由此跨向研究領域，於資料之收集有如魚得水，有助於史學研究之開展。先生研究的領域涵蓋教育史、社會史、區域史、南洋瓊僑史，所發表的專書有六種和論文五十餘篇，尤其對中國近代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可說無出其右者。至於有關他的本行圖書館學方面的論著，僅有〈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圖書館現代化的先驅〉一篇而已，但先生對如何有效掌握與取得研究之圖書資料，永著先鞭，因此對推動圖書館的自動化，不遺餘力，雖忙於研究工作，仍一直關心如何提升研究院圖書館之管理和服务品質，並積極發起推動全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自動化工作。1986年，擔任本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小組召集人，翌年成立委員會，與前計算中心主任謝清俊先生共同推動自動化。如今全院已進入「互通有無」的所際化、院際化和國際化時代，只要透過網路，國內外學者都可以互相查詢書目資料。而先生謙不居功，說這是中央研究院對國內學術研究的貢獻，也是本院的光榮，其實先生倡導之功實不可沒，如果沒有先生之堅持，爭取經費支援，突破非技術層面的困難，本院圖書館之自動化恐難有今天的成績。

二、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

先生長於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其研究教育史最大的特色是：區域性的教育發展研究與大學校史的一系列個案研究。出版有《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出版中）等五本專書及論文十幾篇。

先生研究近代教育史，從張之洞對教育的改革開始，之所以對張之洞感興趣，是得自胡秋原先生的啟發。張之洞是清季督撫中少數有見識、有擔當、能不斷求變者之一，也是最重視教育者。但一般對張之洞的研究，多偏重「中體西用」的思想層面，甚少注意張氏「坐言起行」的另一面。先生乃根據張之洞各種遺著、傳記、年譜、相關資料及教育部檔案等，深入探討張之洞的教育改革。其中《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1976年出版，1983年再版）是先生對教育史作系列研究的第一本專書。本書的主要特色有三：一是不僅將張之洞個人思想的形成及轉變的脈絡作系統的介紹，同時兼顧他的「中體西用」於實際層面的分析。二是以詳實的資料說明湖北的傳統教育已面臨式微

局面，張之洞在山西時雖曾對傳統教育作全面性的檢討和改革，但實對傳統教育已失去信心，因此，在湖北的教育改革是改造傳統書院，使之過渡轉型，同時重視新式教育。三是肯定張之洞對湖北教育改革的貢獻與影響。甲午戰敗，康梁等人都歸咎於李鴻章等人的自強運動只重視兵工文化，而忽略制度層面。本書特別強調，諸人中唯獨張之洞認為敗於不知教育，這也是其重視教育的主因。張氏說教育才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因此，主張由教育改革，推及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革新。他在湖北主政期間，將他的主張先落實到教育的革新，使湖北的教育朝向世俗化、普及化與技藝化方向發展。清季戊戌以後的全國性教育革新，也在張之洞領導下完成的，如改書院為學堂、廢科舉、頒佈奏定學堂章程等，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均發生相當大的作用。

先生第二本有關張之洞的研究，同時也是大學校史系列的專書之一，是《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於 1998 年出版。該書的特色亦是環扣張之洞的思想所作的系列研究。甲午戰後，張之洞倡導留日政策，對清季十餘年來的教育改革發生重大的影響。1903 年清政府仿日本學制，頒佈奏定學堂章程，廣設學堂，因師資需求孔急，乃普設師範學堂。張之洞認為師範是教育之母，乃在兩江總督任內，於南京創設三江師範學堂（旋改為兩江師範學堂）。張之洞的思想對兩江師範學堂的實際運作亦發生關鍵性的影響。兩江師範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新教育現代化的縮影，既有濃厚的傳統，也有逐漸蛻變的現代性，這與張之洞尊重傳統，講究實際，主張進化，反對固執不變有密切關係。

就大學校史的研究而言，本書開闢了師範教育史研究的新領域。要談中國的師範教育，非談清末的中日關係不可。因此，本書不僅從教育史、校史方面著眼，更從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進行個案研究，乃先生治大學校史的特識。

從中日教育交流過程中，先生就日本總教習的課程設計、管理、灌輸學生現代知識，以及引進制度及硬體設備等等，肯定中日關係黃金十年對中國新教育改革的影響力，是不爭的事實。

從社會學角度，觀察校園生活，這是一向被編寫校史者所忽略的，卻是先生研究方法上的重要特色。先生把學堂視為有機體，從學堂經營之實質內容著墨，探討有機體的各部門結構及互動關係，既注意到校園內部的活動，亦注意到中日文化交流和國內政治環境的變遷。1911 年，辛亥革命，兩江師範學堂受波及而關閉。先生發現這一年也是美日兩國在華教育勢力消長的交替點。清華創設於 1911 年，至 1929 年改制為清華大學。先生自 1970 年開始

研究清華校史，比較美日兩國對中國教育影響的差別和消長，認為這兩所學堂的主權在中國，不是美日「殖民主義教育」的試驗場，但因美日兩國的立國精神和對華政策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這樣的立論是先生一系列研究大學校史的貢獻。

先生有關清華大學校史的著作是 1996 年出版的《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和即將出版的《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兩書。前者創獲之多，可說是先生校史研究的代表作。何柄棣院士在本書的序言中稱讚本書是「近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傑出專刊之一」，「全書對早期清華理性平衡的總評價，應該是經得起今後史家的考驗的」，「從較狹的專業觀點看，此書行將被舉世公認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部標準著作是可以預卜的」。呂文浩先生對先生的評論，認為他的究研特色是把「整個學校當作是各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一個特定的社會組織，將各種足以影響到這個組織的風貌因素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因此，這是先生研究教育史最大的貢獻。先生的研究，創獲之多，是因對清華創校以來的中美外交檔案、台灣、大陸及美國「有關清華經費、體制、領導、政策、師資、圖書、學生素質和生活片面」等資料廣羅收集，並悉心排比史料，從史學觀點觀察問題，澄清不少事實真相。如肯定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爭取以美國超收的庚款令其創設清華的貢獻。揭示少為人注意的早期清華人事網絡上聖約翰、外交部和清華的三角關係，指出關鍵人物係顏惠慶而非周詒春。並肯定校長曹雲祥、美國教員的貢獻。指出清華學校學生大都出身於中等以上家庭而非外傳的富家子弟；校園生活部分，耐心細緻的觀察向為研究者所忽視的學生醫療衛生和疾病死亡問題；對圖書館獨到的分析及提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若干研究見解等等。均修正了流行中的不少偏見，並且有極多創見，這是本書成功的主因。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是先生繼《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的又一力作。先生匠心獨運，從教育史的角度闡述清華如何由留美預備學校一步步發展成為研究設施完備、教授陣容整齊的一流文法理工大學。培養眾多人才，對大陸之基礎工業、國防科技，台灣之民生工業及對美國學術和科技研究之貢獻，均甚顯著。先生廣搜清華畢業生學經歷資料，作深入生涯追蹤，從而評估清華的成就，別創大學校史研究的新頁。相對於北京的校史稿，豐富了學界對清華及中國近代教育史的認識。

此外，先生對大學校史系列研究的另一專書是 1990 年出版的《私立海南大學，1949-1950》。海南大學創設於 1946 年，正是國內局勢動盪不安之際，

雖校史有如曇花一現，僅三年半即走入歷史，但對海南島確曾發生重大影響。先生指出海南大學對海南的歷史意義，遠比在中國教育史上的意義來得重要，此書出版之後，對海南學界曾造成震撼。撰寫時先生以教育部庋藏的私立海南大學檔案、董事珍藏的資料及相關著作為主，不足部分則對原校的教授、校友進行問卷調查及口述訪問，同時輔以學校建築、課堂活動、學生生活等照片，充分組織史料，並作詮釋，使得本書「既有骨架，也有血肉」。

三、區域史研究：湖北省與海南島

1970 年代，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受美國學界興起現代化研究熱潮的影響，在李國祁、張朋園、張玉法先生先後共同主持下，應用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架構，以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y)方法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此一「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1916」係一集體研究計畫，先生因研究張之洞與湖北的教育改革有成，1973 年受邀擔任湖北省區的研究。這個大型研究計劃改變以往傳統歷史學的研究方式，大量應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科際整合方式進行研究。先生追求新知一向不落人後，參與此一計劃後，學到新的研究方法，也拓展了研究領域，這是先生在研究生命史中的另一轉折。

先生的研究成果，見於 1981 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本書在共同的理論架構下，廣泛應用現代化理論、政治系統理論、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的知識，及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辯證法解釋歷史現象。在傳統背景中，以詳實的資料，分析湖北省的自然條件，及傳統政治、軍事、經濟、財政、教育、人口與社會結構，是否具有「現代性」(modernity)因子的存在，結果發現均具有現代化的助力與阻力。在面對外力衝擊方面，根據挑戰與反應的理論，利用比較方法，探討湖北政治、經濟、社會面對西方入侵後，所發生的變遷，認為「1861 年尚非湖北社會發生現代性變遷的起點」，而是 1890 年張之洞抵達湖北之後，該省的政治經濟社會才發生全面性的變革，湖北才有現代化的建設。

因此，本書的論點是：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是由於西方衝擊後，提供比較機會，才推動政治經濟之變革，間接牽動社會結構內部變遷。在全國性的變動中，湖北的現代化比較顯著。檢視該省在清末二十年間，政治、經濟與社會進步的原因，是因為張之洞等政治領導階層的決心與努力。張之洞對西

方國家有相當的了解與認識，他的現代化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他主張經由教育、留學、游歷、譯書、學會與報紙等媒介，吸收西方國家的新知識，然後加以傳播給官紳及一般國民，推動輕重工業及工商業。他在湖北推動的一系列現代化工作，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先生對張之洞的深入研究認為其中以教育與新軍最為成功，但不料成功的一面竟然為辛亥革命提供了條件，也為剛起步的現代化帶來負面的影響。

民國成立以後，政局動盪不安，軍人當政，黨爭與戰亂頻仍，社會不寧，這些都是現代化的阻力。因此，先生認為辛亥革命的意義固必須肯定，但對湖北社會的短暫震撼與破壞也是事實。

先生是海南島人，由於愛鄉情切，乃於 1982 年以後，陸續發表有關海南區域史研究論文十二篇和《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專書一種。這一系列文章，仍緊扣區域發展與現代化的關係來論述。海南未建省之前（1987 年正式建省），隸屬廣東省，屬邊疆地區，魏晉以後，漢移民人口始進入該區，大都是中原世家大族、流寓家庭及落難官、商，先生認為他們為海南帶來精緻文化，根據比較研究，海南的「內地化」比台灣更高、更早，而且「內地化」與「土著化」同時進行，並不發生衝突，這是與台灣不同的地方。

海南同時也是中國邊疆資源豐富、人口稀少、甚有發展前途的地區，但也是最不受中央政府重視的地區。在清代，僅曾紀澤、張之洞兩人重視海南的重要性。據先生在〈張之洞與海南，1884-1889〉一文中的論述，發現因張氏重視海南的國防地位，在中法越南戰爭中，以「制法救台」的戰略，於諒山一役擊敗法軍，令其撤出基隆與澎湖，解除法軍對台灣的封鎖。此一深具歷史意義的發現，是近代史與台灣史學者所忽視的。

此外，該文並從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建設與民族關係改善論述張之洞對海南的建設，認為張氏具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拓殖精神與魄力。可惜該島終未建省，民國以後，不論中央或廣東政局有任何異動，海南均受影響，對該區的現代化而言，是一大阻力。這樣的結論，與他研究湖北省區的結果是類似的。

四、面對挑戰退而不休

先生的生命特質，具有無比的韌性與堅強的毅力，1980 年 4 月，發現患了鼻咽癌，面對殘酷的事實，夫人及長兄幾乎嚇得昏倒，唯獨先生面對人生

嚴峻的考驗，樂觀勇敢的接受極為痛苦的治療，為了照鉆六十，他拔掉牙齒，進用流質食品，又聲帶受損，他裝助聽器，並持之以恆，每天自己燒水熱敷蒸鼻，終於克服病魔。二十年來仍是信心十足，無畏無懼，努力不懈地致力於研究，而有傲人及貢獻於學術界的研究成果。

先生克服困難的毅力，也表現在球場上，他的乒乓球技可圈可點，雖然早已進入院隊之列，仍不斷與人切磋球藝，力求突破，充分表露運動家的精神。同時，還不忘指導後進，受教於他的年輕人中，也出了不少院隊球員。

先生昂揚的鬥志又表現在對院務與所務的改革活動上。張玉法院士在先生的退休演講會中曾說，先生也想改革他，但知識分子很難被改造，因此，改來改去總不成功，先生只好專心研究。如今銳氣被磨平了，稜角也不見了，而對新鮮事追求的熱度永不冷卻，更不落人後，讓人不得不佩服，如推動辦公室自動化，不論是圖書館業務或個人研究，先生總是不斷自我進修，積極推動。而把革命之事置於腦後，從區域史與教育史的研究，也悟出了革命的負面作用，而成爲反革命論者。

先生退休之後，兼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可說退而不休，仍孜孜矻矻的繼續工作，未來數年內，除計劃出版《海南史論文集》及史料叢刊《清華大學師生名錄，1927-1949》外，也希望完成《中國現代化之區域研究：湖北省的政治社會，1916-1937》，以及專題計劃《中國教育的現代化》等專書。先生對人生抱持的態度，是與時間賽跑，我們期待先生更精彩的研究成果，貢獻於學術界。

附錄：蘇雲峰先生論著目錄

專書

1. 《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5)，民國65年初版，72年再版，376頁。
2.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1)，民國70年初版，76年修訂版，595頁。
3. 《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1)，民國79年，200頁。
4.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9)，民國85年，約440頁。
5. 《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2)，民國87年3月，236頁。

論 文

- 1.〈康有為主持下的萬木草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下）（民國61年12月），35頁。
- 2.〈清季武昌學界的革命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上）（民國62年5月），29頁；《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輯》（冊2）。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3年，52頁。
- 3.〈張之洞的教育思想〉，《新知雜誌》，第3年期4（民國62年8月），21頁；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69年6月，23頁。
- 4.〈湖北農務學堂——近代中國農業教育的先驅〉，《新知雜誌》，第4年期6（民國63年12月），11頁。
- 5.〈外國專家學者在湖北，1890-1911——從顧問角色看張之洞近代化努力之成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8期4（民國64年4月），14頁；另轉載於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武漢春秋》，第2-3期（1993年）。
- 6.〈湖北新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4（民國65年4月），36頁。
- 7.〈湖北省諮詢局與省議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民國67年6月），54頁。
8.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Emergence of Heavy Industry in China, 1862-19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peh and Kiangsu Provi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Nov.3-5, 1978, Columbus, Ohio.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8（民國68年10月），34頁。
- 9.〈清末湖北士紳階層之蛻變〉，《思與言》，卷17期4（民國68年11月），16頁。
- 10.〈湖北傳統經濟〉，《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12（民國69年6月），46頁。
- 11.〈湖北近代工礦業之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9（民國69年7月），42頁。
- 12.〈從漢口市的發展看湖北都市現代化的癥結〉，《史學評論》，期3（民國70年3月），33頁。

- 13.〈湖北與辛亥革命〉，《傳記文學》，卷39期1（民國70年7月），5頁；另收於林能士、胡平生主編，《中國現代史論文選輯》。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71年9月，12頁。
- 14.〈近代中國教育思想之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0（民國70年8月），31頁。
- 15.〈民初之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1（民國71年7月），36頁。
- 16.〈民初之知識份子(1912-1928)〉，《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8)，民國71年8月，23頁。
- 17.〈丘濬(1421-1495)：一位遙從海外數中原的布衣卿相〉，《丘海季刊》，期5、6合刊（民國71年9月），12頁。
- 18.〈民初之農村社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3年4月，19頁。
- 19.〈張之洞的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3年4月，23頁。
- 20.〈廣雅書院，1888-190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3（民國73年6月），65頁。
- 21.〈論清季中國社會階層之變遷〉，《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16（民國73年6月），20頁。
- 22.〈抗戰前之湖北政治與社會〉，《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3年12月，31頁。
- 23.〈宋代的海南教育〉，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編，《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民國74年4月，31頁。
- 24.〈丁文江，1887-1936〉，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冊4），民國74年6月，20頁。
- 25.〈星洲瓊僑與中國革命，1906-1927〉，《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編輯委員會，民國75年，46頁。
- 26.〈東南亞瓊僑移民史〉（與符駿合著），《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國75年12月，40頁。
- 27.〈海南在中國邊疆發展史中所呈現的特色：以臺灣為比較對象〉，《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5年12月，23頁。
- 28.〈民初社會階層〉，《中華民國建國史》，第2篇《民初時期》，民國76年3

月，72頁。

- 29.〈羅家倫與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6（民國76年6月），16頁。
- 30.〈星馬華人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與奉獻，1937-1945〉，《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中文大學，1989年，21頁。（本文經《歷史月刊》及《世界日報》轉載）
- 31.〈張之洞與海南，1884-1889〉，《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7年6月，40頁。
- 32.〈明末清初的湖北動亂與社會經濟創傷，1634-1664〉，《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8年4月，31頁。
- 33.〈從南洋經驗到臺灣經驗——1945年以前的海南農業改良〉，《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8年，22頁。
- 34.〈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8（民國78年9月），4頁。
- 35.“The Disequilibrium Between Social Value and Realit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Republic, 1912-1928,” i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23, no. 3(Spring 1990), pp. 3-21.
- 36.〈從理論到實際：清季現代化運動的面面觀〉，《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3月，12頁。
- 37.〈清華的人文教育傳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0（民國80年6月），21頁。
- 38.〈從丘濬〈南溟奇甸賦〉看十五世紀之海南自然生態與人文經濟社會〉，丘海學會，《丘海季刊》，期32、33合刊（民國81年3月1日），8頁；《歷史月刊》，民國81年1月，6頁。
- 39.〈清華學校：美國早期「和平演變」中國的重要孔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1（民國81年6月），22頁。
- 40.〈清華校長人選和繼承風波，一九一八～一九三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2（下）（民國82年6月），28頁。
- 41.〈曹雲祥：清華改制升大和教授治校的奠基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民國82年6月，18頁。
- 42.〈張之洞與三江師範學堂的籌建〉，《教育哲史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民國82年，15頁。
- 43.〈戰前清華大學之學生及其校園生活，1928-1938〉，《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 灣分館建館七十八週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民國82年10月，17頁。
- 44.〈聯省自治聲浪中的「鄂人治鄂」運動：兼論省籍意識的形成及其作用，1920-1926〉，《「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83年6月，34頁。
- 45.〈教會與德日二國政府在華教育事業之比較研究〉，《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83年6月，34頁。
- 46.〈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圖書館現代化的先驅〉，《慶祝王振鵠先生七十大壽論文集》。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6月，10頁。
- 47.〈從海南與南海的史地關係論南海主權之歸屬〉，《兩岸及海外華人南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國際法學會，民國83年7月，11頁。
- 48.〈清華國學研究院〉，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輯2（1997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289-337。
- 49.〈抗戰前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1929-193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0（民國87年12月），59頁。

書評

- 1.〈評吳劍杰著《辛亥革命在湖北》〉，《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台北：國史館，民國76年4月，10頁。
- 2.〈評介《清華大學校史稿》〉，《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三）。台北：國史館，民國77年6月，22頁。
- 3.〈評張國輝著《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四）。台北：國史館，民國78年，6頁。
- 4.〈評蕭超然著《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五）。台北：國史館，民國79年，6頁。
- 5.〈評徐泰來著《洋務運動新論》——兼論鄧小平開放政策〉，《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七）。台北：國史館，民國80年，18頁。
- 6.〈評倪忠文著《北洋軍閥統治湖北史》〉，《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九）。台北：國史館，民國81年，19頁。
- 7.〈評胡偉希等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5（民國82年3月），8頁。

其 他

- 1.〈研究海南開發史的幾點意見與有關文獻〉，《中國丘海學會會刊》，期2（民國69年2月），2頁。
- 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簡介〉，《漢學研究通訊》，卷1期2（民國71年4月），6頁。
- 3.〈劉廣京院士訪問紀錄〉，《漢學研究通訊》，卷1期4（民國71年10月），7頁。
- 4.〈《海南之內地化》代序〉，王會均編著，《海南文獻資料簡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2年，7頁。
- 5.〈辛亥革命研討會記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2（民國72年6月），3頁。
- 6.〈花蓮縣和臺東縣收藏有關臺灣史料初步調查報告〉（與朱泓源合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3（民國73年6月），7頁。
- 7.〈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摘要與評論〉，《近代中國》，期42（民國73年8月），9頁。
- 8.〈評Kathleen L. Lodwick,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ainan, 1885-1919*〉，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79年，3頁。
- 9.〈如何鞏固及開發南海四沙資源：一個區域歷史的觀點〉，《聯合報》，民國80年1月30日；大陸《參考消息》，1991年2月28日；泰國海南會館編，《第二屆(1991)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特刊》，3頁。
- 10.〈從西方現代化動因看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困境與出路〉，南風學會，《南風》，創刊號（民國82年1月），7頁。
- 11.〈從世界核心轉移展望海南前景〉，南風學會，《南風會刊》，期2（民國83年3月29日），6頁。
- 12.〈撰寫《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一書的若干心得〉，《近代中國研究通訊》，期21（民國85年3月），13頁。
- 13.〈日軍在南海之暴行，1939-1945〉，吳天威主編，《日本侵華研究：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專輯》。美國：南伊利諾大學，1995年12月，4頁。

史料介紹

- 1.〈「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公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7（民國83年3月），15頁。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Scholarship of Albert Feuerwerker

Thomas Buoye*

The distinguished career of Albert Feuerwerker has spanned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lthough Feuerwerker is best known as an economic historian, his scholarly writing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extend well beyond his specialty of economic history. Before beginning a discussion of his written works a few of his many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Studies should be noted. Albert Feuerwerker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architects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ere he served as director for eighteen years.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aculty specialized in Chinese Studies grew from a handful to 25 spread across 12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Feuerwerker was also instrumen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Michigan, which has become the equal to 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his tenure a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Feuerwerker also helped found the Michigan Monographs on Chinese Studies (originally called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which has published over 80 volumes (eight of which Feuerwerker himself authored) on topics that range from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o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 a member and later chairman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d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member and later vic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the National

* Thomas Buoy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Tulsa.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he has also been a key figure in the promotion and expan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China and scholar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euerwerker was appointed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1980, and he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87) and as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1991-92).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Professor Feuerwerker has also been a generous mentor to his many graduate students and an exemplar of intellectual integrity.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Albert Feuerwerker has been among the most eminent and productive scholars of the post-war generation of American Sinologists. Combining meticulous research in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with modern economic theory, Feuerwerker pioneered the opening of the 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While he is best known as an economic historian, his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has been far ranging. Feuerwerker has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the 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noteworthy was his early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historia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g before direct scholarly contact was possible. Few American historians have been as well-acquainted with the works of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as Feuerwerker has been. His works on the imperial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rebell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lso demonstrated Feuerwerker's versatility and breadth as a scholar.

The hallmark of Feuerwerker's scholarship, to invoke a Chinese maxim, has been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In Feuerwerker's scholarship one will invariably find an exhaustive examination and judicious utilization of Chinese

sources, a transparent presentation of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his argument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s, economic and otherwise, and an authoritative and persuasive marshalling of evidence in support of balanced conclusions. Time and again, Feuerwerker's evenhanded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and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heoretical models have consistently allowed him to rise above the polemics that sometimes have surrounded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or example, his pivo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ov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imperialism on handicraft textiles in rural China were so persuasive that both sides found it necessary to adjust their arguments to his conclusions.

In his first major work,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Feuerwerker examined the China's early efforts to industrialize using the "official supervision and merchant management" model as exemplified by the career of Sheng Hsuan-huai. In a field that had been dominated by studies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diplomatic history this broke new ground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In a style that would distinguish his subsequent work, Feuerwerker precisely delineated the parameters of his study and thoroughly identified the available source material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this way, he provided the reader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ant source materials and a basis from which to intelligently assess his arguments and conclusions. Methodology aside, Feuerwerker provided a concrete case study through which the failure of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understood in all its complexity. Although the major focus is on Sheng Xuanhuai and the enterprises he managed, Feuerwerker also assessed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early efforts at industrialization in light of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obstacles as well as the impediments of foreign competition, governmental weakness, inadequate capital, and technical backwardness. Feuerwerker followed up this study with shorter pieces on the Hanyehping Coal and Iron Company and the Chee Hsin Cement Co. providing additional case studi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at contributed to a realistic assessment of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American Sinologists hotly debated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euerwerker published one of his most influential articles, "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d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 1871-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2 (June 1970), pp. 338-378. Assembling the scant statistical data on foreign imports and domestic factory production of cotton cloth and yarn, supplemented his own estimates regarding domestic output and consumption, Feuerwerker produced the only in-depth study of the multifarious impact of foreign manufactured good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most important household handicraft industry in rural China. Feuerwerker's use of the available data was thorough and ingenious and reveals an amazing depth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ails of 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d textiles production. More importantly, his carefully documented estim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ere manifest to the reader. When contemporary estimates or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isagreed, Feuerwerker provided three alternative estimates each of which was carefully explained.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supplied a rare empirical yardstick with which to measure the fate of handicraft textile production. Ultimately, Feuerwerk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impac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manufactured textiles was significant but variable and complex: handicraft production of yarn declin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production of cloth declined only slightly. In conclusion, Feuerwerker provided one of the few balanced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s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ism on Chinese rural handicrafts. In typical Feuerwerkerian style he acknowledged the continued dominance of handicraft production while noting th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the decline in handicraft spinning on individual peasant households in areas where cotton spinning had been important. The result was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imperialism on Chinese handicrafts, which was so persuasive that both sides in the debate found it necessary to adjust their arguments to his conclusions.

Several of Feuerwerker's most impressive works were published as short books i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ichigan Monographs on Chinese Studies. His two volumes o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and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3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7) remain the definitive works on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His publications in this series also include treatments of the imperial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ineteenth century rebellions, and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se works testify to Feuerwerker's scholarly range and depth. For example,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h'ing Empire in Its Glory*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Feuerwerker addressed the central role of Confucian ideology in the longevity and resiliency of Chines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euerwerker deftly demarcates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 state, "Confucian *rasion d'etat*," and the complex institutions of local political power, the "Confucian general will,"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to Confucian ideology. According to Feuerwerker, the imperial state placed its emphasis on those elements of the Confucian ideology that were "primarily political" and that correspond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 Confucian "general will" of loc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ended to resist the "detailed prescriptive regul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tate" in favor of the "old ideal of rule by moral example." As Feuerwerker noted "the mutual interplay, the changing equilibria.....between the imperial state and gentry society" was a "permanent fea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is juxtaposition of the dual function of Confucian ideology illustrates both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imperial political order.

In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Feuerwerker examined the full dimensions of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from adventurers and advisers to missionaries and the maritime customs filling a large gap in literature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 in his work on economic history, Feuerwerker began by piecing together a broad range of sources to depict the broad panorama of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This work concisely puts a face on what had often been “a looming but ill-defined nemesis christened ‘imperialism.’” According to Feuerwerker, “the foreigner and his world occupied only a secondary place.....the design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and that “the specific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perialism” were at worst ambiguous on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was ”an invasion of China’s sovereignty which derogated the autonomy not only of an abstract polity but also, more critically, the autonomy of particular and individual Chinese who apprehended and reacted to the intruding foreign presence.” Once again we find the strengths which typify Feuerwerker’s scholarship: reasoned judgments based on a careful assembly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extant sources. Interestingly, like his article on handicraft textiles, oppon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imperialism debate have frequently cited this work.

Since the 1980s much of Feuerwerker’s scholarship has focused on the broader 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employed to understand these trends. Conveniently, many of these writings have been reprinted in a recent publicatio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o. 7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5) which also contains a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ssay on

"Handicraft Industry in Ming and Ch'ing China: 'Proto-Industrialization' ca. 1550-1850." In these more recent works Feuerwerker has often take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has addressed broader theoretical issues of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3 [May 1984], pp. 297-326), Feuerwerker examined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ese administrators in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tervened in the economy and compare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o early modern Europe. Most importantly, he concluded that the failure to begin modern economic growth, whether the explanation i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structural, or demographic, is "over-determined." As Feuerwerker notes, even in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no one can state for certain how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egins. This article marks a trenchant reexa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at has become a consistent theme in much of Feuerwerker's more recent writings.

In an essay entitled "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hi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in 1992) Feuerwerker offered a cogent critique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underlying the debate ove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euerwerker at once clarified and reoriented the debate by drawing important distinctions among three typ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economic growth was premodern or extensive growth, "characterized by constant returns to additional inputs and by the absence of sustained, large and steady increases in per capita output and incomes." 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 arising from increased specialization and "exchange-enhanc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within a given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where both total output and per capita product may increase, but slowly, with large fluctuations and with uncertain sustentation." Feuerwerker dubs this [Adam] "Smithian-type" growth. Sustained growth of output per capita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at Simon Kuznets has termed modern economic, “identified by sharp structural changes, sustained, large, and steady per capita output increase.” As Feuerwerker notes, economic historians who study China have often misconstrued imperial China’s impressive periods of Smithian-type economic growth as a potential precursor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 la Kuznets leading to flawed comparisons to Western economic history and fundamental errors i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past. As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suggests, despite decades of research,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remain that neither Feuerwerker, nor any other scholar can answer at this time. Nevertheless, by clarifying the terms of debate and by exposing fallaciou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Feuerwerker has made an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Handicraft Industry in Ming and Ch’ing China: ‘Proto-Industrialization’ ca. 1550-1850,” i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o. 7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5) Feuerwerker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proto-industrialization model from an informe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bining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proto-industrialization model as it has been elaborated in Western economic history with a systematic pres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variables for the Chinese case, Feuerwerker once more demonstrates his skillfulness as a historian and his ability to grapple with economic theory. Rather than force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to a procrustean bed of proto-industrialization, he wisely perceive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s “a series of frequently useful insights.....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which is to remind us that historical change is usually incremental, always complex, and generally contingent.” In his conclusion Feuerwerker returns to themes that he has consistently and cogently presented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These include: the need to carefully scrutinize Western economic models and assess their applicability to China; the tenuous connection between premodern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la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est); recognition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mainland Chinese historian coupled with unwavering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 sprouts” formulation.

Attempting to summarize the writings of a scholar as accomplished as Albert Feuerwerker in such a brief article is a daunting task. By any measure hi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impressive, but they are even more impressive given the time and effort, and energy he spent as an administrator, institution builder, developer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eacher. His systematic studies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ese handicrafts based on solid empirical research have stood the test time and remain as model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His historiographical essays and theoretical critiques have elevated, enhanced, and enlightened the 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 Most importantly, Albert Feuerwerker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a tireless seeker of truth from facts.

Selected Writings of Albert Feuerwerker

“A Draft Biography of Sheng Hsuan-huai, Official and Industrialist,” *Paper on China*, 8 (1954), pp. 1-37.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 (1958), pp. 107-116.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inese edition: *Zhongguo zaoqi gongyehua--Sheng Xuanhuai yu guandushangpan qiyé*, tr. by Yu Hesheng,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preface by Wang Qingcheng.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0.]

“Sheng Hsuan-huai.” In *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H. L. Boorman. New York, 1960, pp.109-114.

“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2 (January, 1961), pp. 323-353.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61), pp. 41-60.
- “Rewriting Chinese History: Interpreting the Pa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April 1961), pp. 273-285.
- 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ith S. Che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La Storia della Cina in abito Marxista,” *Mercurio* (Rome), 5:3 (March 1962), pp.
11-20.
- Editor and contributor, *Modern China*, Prentice-Hall, 1964.
- “China’s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Hanyehping Coal and
Iron Company, Limit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edited by C. S. Cowa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4.
- “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 with H. L. Kahn, *The
China Quarterly*, 22 (April-June 1965), pp. 31-61.
- Editor,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ith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hee Hsin Cement Co.”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ited above, pp.304-341.
- Editor and contributor,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 “Comment (on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China in Crisis*,
vol.1, edited by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6, 1968, pp. 535-545.
-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 “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d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 1871-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2 (June 1970), pp. 338-378.
- “Modern China?,”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1: 1 (Winter 1972), pp.1-5.
-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nnals of*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uly 1972), pp.1-14.
-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dited by Michel Oksenberg. New York: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3, pp. 42-54.
- Rebell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5.
- Stat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h’ing Empire in Its Glory*.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 “Economic Aspects of Reform.” In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dited by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5-40
-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3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7.
- “Discussion.” In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1978, pp.45-46, 497-499.
- “A White Horse May or May Not be a Horse, But Megahistory Is Not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4:3 (July 1978), pp.331-339.
- Chung-kuo chin pai-nien ching-chi shih (1870-1949)*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aipei: Hua-shih Publishers, 1978.
-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Modernization,” *China Today*, Maxwell Summer Lecture Series, Syracuse University, 1979.
- “History.” In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Leo Orle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07-513.
- “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 1870-191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 Modern China, vol. 11*, edited by J.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69, 603-605. [Chinese translations: "Wan-Ch'ing ti ching-chi ch'u-shih (1870-1911)," *Chien-ch'ao Chung-kuo shih, wan-Ch'ing pien*.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6, 1-75; and "1870-1911 nian wan Qing diguo di jingji quxiang," *Jianqiao Zhongguo wan Qing shi*.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5, 2.8-84)].
- "China's Reaction to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Commerce, 1839-1949," Xv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Bucharest, 1980, Rapports, 2.479-487.
-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In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the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Robert Dernberg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61-305.
- "Wan Qing shiqide jingji zhuangkuang" [Late Qing economic conditions] *Jingji xueshu ziliao* [Economic research material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0.12 (2 December 1980), pp. 40-46.
- "Ershi shiji chuqide haiguan, youju, yanzheng" [The customs, post office, and salt gabell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Jingji xueshu ziliao* [Economic Research Material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1.7 (July 1981), pp. 45-50.
- "Ouzhou 'zhunggongyehua' he Zhongguo zibenzhuyi mengya jinxing bijiao de lun shu" [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sprouts of capitalism] *Jingji xueshu ziliao* (Economic Research Material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1.11 (November 1981), pp. 36-42.
- "Songdai yilai Zhongguo zhengfu yu Zhongguo jingji"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Zhongguo shi yanjiu*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Beijing, 1981.4 (December, 1981), pp. 60-73.
- "Some Problems in Study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h'ing Archives Symposium*, ed. Ch'en Chieh-hsie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82, pp. 81-109.
- Editor and contributor,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or the Song to 1900.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2.
- “Lun ershi shiji chunian Zhongguo shehui weiji” [On the social crisi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Qingmo Minchu Zhongguo shehu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1-135.
- “Economic Trends, 1912-194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edited by J. K. Fairba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8-207. [Chinese translation: “Jingji qushi (1912-1949),” *Jianqiao Zhonghua minguo shi*. Shanghai: Renmin, 1991, pp. 32-141.]
-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edited by J. K. Fairba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8-127. [Chinese translation: “Waiguo shili zai Hua cunzai,” *Jianqiao Zhonghua minguo shi*. Shanghai: Renmin, 1991, pp. 142-219.]
- “Academ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2.4 (Fall 1983), pp. 579-593.
- “‘Proto-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Capitalist Sprouts’: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In *Studies in Sinology*, Seoul: Korea University, Asiatic Research Institute, 1983, pp. 395-414.
-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3 (May, 1984), pp. 297-326.
- “Chuka minkoku no keizaiteki choryu”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ns. by Uchida Tomoyuki, *Ajia keizai jumpo* [Asian economic report] nos. 1306-1310, September-October 1984, pp. 1-19, 1-24, 1-29, 1-29, 9-20.
- “Aspect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Qing to Republican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0.2 (April 1985), pp. 1-21.

-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 on Modern China’s History,” with Mary B. Rankin and John K. Fairbank.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Editor, with John K. Fairbank,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Qingdai jingjishi yu shijie jingjishi” [Qing economic history (1644-1911) in a world context], in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ed., *Ming Qing dang'an yu lishi yanjiu* [Studies on the archives and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2 vols. Beijing: Zhonghua Press, 1988 1.390-408.
-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China: A commentary.” In P. Duus, R. H. Myers, M.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13.
-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aul S. Ropp, ed., *The Heritage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24-241.
- “An Old Question Revisited: Was the Glass Half-full or Half-empty for China’s Agriculture Before 1949?,” *Peasant Studies*, Vol. 17, No. 3 (Spring 1990), pp. 207-216.
- “State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entennial Review*, 36.2 (Spring, 1992), pp. 373-386.
- “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4 (November 1992), pp. 757-769.
-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o. 7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5.
- Albert Feuerwerker’s papers, including correspondence, reports, and memoranda relating to his involvement with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with China and Chinese studies, are held in the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研究概況

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

金觀濤、劉青峰、章清*

一、計量方法與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

將計量方法引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學術界努力的目標。早在 70 年代，劉廣京先生就注意並考察了「自強」一詞在奏摺、諭旨和士大夫議政文章頻頻出現，以探討清季自強運動的展開。¹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則更進一步，他統計了《清季外交史料》中「主權」一詞出現的頻度，作為認識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參數。他發現，在每一百頁文獻中，1875 年至 1894 年這 20 年，「主權」只出現一次，1895-1899 年為 2.5 次，1900 年至 1901 年增至 8.8 次，而到 1902 年至 1910 年已高達 22 次。²毫無疑問，這一計量分析，較之片言隻語摘錄個別思想人物的見解，更能有效地說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

然而，雖然不斷有人從各個方面引入統計分析，但總的說來，計量方法似乎很難真正進入思想史研究領域。特別是比之於這一方法在經濟史、社會史，乃至政治史方面所達到的成就，更顯出巨大的差距來。原因似乎

* 金觀濤、劉青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章清，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¹ 參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531。

²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53-54.

也很簡單，思想史與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不同，後者處理的是事實，而思想史的核心是普遍觀念。思想史必須注重研究觀念變遷的內在邏輯，而這一定要涉及意義層面的剖析。用詞和事件頻度統計，固然可以展示某種思想變遷的趨向，但卻無法完整地揭示社會觀念的意義演變。

在思想史研究中，觀念的意義通常經由哲學和語言學的分析得到，或使用韋伯提出的理念型(Ideal Type)分析方法來把握。研究者往往是從分析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的言論入手，抽取出代表那個時代的普遍觀念。大致說來，觀念史雖早在 19 世紀末已為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所重視，經艾克頓(Lord Acton)和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提倡，在 20 世紀上半葉盛極一時，但它始終沒有脫離以個別思想家或某一集團為案例的觀念探索，仍舊是一門介於哲學和歷史之間的學科。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情況也大致如此。儘管學術界普遍感到，由少數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來揭示社會普遍觀念的變化，存在顯著的局限性，然而思想史中，至今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以個別思想人物為中心。³20 世紀中國思想的變遷如急風暴雨，如果說在 1915 年前，還勉強可以用若干有代表性的先驅人物的思想來刻畫社會的普遍觀念，那麼，新文化運動展開後，隨著各種集團力量的崛起，通過個別思想人物的研究來把握思想觀念的演化，已愈來愈不可能；而到 30 年代以後，在思想界甚至連公認的代表人物都難以找到。

為了考察非個人化的社會普遍觀念的演變，群體思想研究在「代際理論」、「集團理論」以及社會心理學的影響下日益活躍。特別是以某一時段為單位的報刊言論分析，在 80 年代後普遍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視。⁴報

³ 自毛澤東思想受到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的重視以來，中國近代史上稍有影響力的人物的思想，都有專人研究，或者是個人的思想傳記，或者是以一組人物為中心考察某種觀念的變遷。具代表性的包括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Yu-sheng Lin , *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⁴ 實際上舒衡哲從中國知識份子的代來審視五四記憶的延續，就自然由代--《新青年》所代表的老師輩和《新潮》所代表的學生輩--轉向對群的分析，該書即以《新青年》和《新潮》兩個雜誌為分析對象。參見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刊言論分析與以個別人物為中心的研究不同，其對象是在某一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作者群及其所表述的觀念。由於對報刊的分析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對刊物文章性質以及觀點傾向的分類，因此，簡單的統計方法也引入到觀念變遷的領域。然而，無論就其外延還是內涵來說，這種報刊雜誌的統計分析，一開始就遇到了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所謂外延的限制，是指統計研究必須處理的資料數量明顯不足。一般來說，一本具有代表性且較為完整的雜誌，字數總有數百萬字的規模，儘管如此，充其量它也只是能代表某一時期一部分人的觀念。為了反映該時期不同流派的觀念，就必須同時選幾種或十幾種雜誌，這樣就面臨著要分析數千萬字資料的難題。而內涵的限制，是指這些報刊言論的意義分析往往只能做到以篇為基本單位的統計，即對文章按論題性質分類；而基於對每篇文章的意義定位，是不可能得出太多統計結果的。舉例來說，陳儀深對《獨立評論》雜誌的研究，在統計方面已做得較為深入。作者將每篇文章的作者、篇名錄入電腦，並按照「與民主直接有關」、「與民主間接有關」和「與民主無關」，將各篇文章歸入三大類，每一類又區分出若干小類。由此，作者不僅很容易就計算出雜誌總共刊發了 1,317 篇文章，作者人數 356 位；而且每位作者對民主問題的關注程度，以及關注的焦點，都清晰可辨。⁵必須承認，上述統計，較之於其他的同類型研究，雖然進了一步，但要展示一個時代的觀念面貌，顯然是不夠的。與《獨立評論》同時期存在的《東方雜誌》、《國聞週報》等報刊，不僅同樣具有影響力，而且這幾個雜誌的言論本身，還存在著互動關係，只分析一個雜誌，不單有礙於對問題的把握，還由於統計缺乏參照而減低說服力。更大的問題還是在統計本身，像這種以每篇文章為基本單位進行分類的方法，無法更細微更深入地揭示觀念的演變。何況每篇文章都是觀念的複合體，硬將其歸為某一類，是十分勉強的。

進入 90 年代，電腦的普遍使用，特別是大量歷史文獻的全文錄入並建立起較完備的檢索系統，克服上述種種困難成為可能。今天的研究者，借助於電腦處理數千萬字的原始資料，逐字檢索文獻，統計原始文獻中某些

⁵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而中國近代史上稍具影響力的報刊雜誌，差不多都已有了博士、碩士論文。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圖書公司，1989)。

關鍵詞的出現頻度都變得輕而易舉。研究者可以全文檢索數千萬字的原始文獻，把研究所需要的人物、事件及關鍵詞等一一提取出來，進行分析。只是，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對於思想史研究來說，原始文獻的全文錄入，並做到逐字檢索，仍然有很大不足，那就是電腦無法處理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取向，無法判斷檢索對象在名字的翻譯或不同時期的使用上的種種差異。例如，近代中國政治觀念中一些重要術語，像「權利」、「無政府主義」、「進化」、「競爭」、「群」、「社會」等觀念，它們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思想文化流派那裏，其所要表達的意義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時期，不同的人在使用這些觀念時，潛含的價值取向也各不相同。電腦檢索系統無法判斷該術語在每一篇文章中表達的究竟是甚麼含義。電腦也無法判定作者在使用這些觀念時，是肯定還是否定。

那麼，是否可以找到某種辦法，克服上述困難呢？我們知道，對於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該文獻的意義。我們發現，只要對處理的原始文獻，提出一個規範性意義分析架構，並將它同原始文獻的全文檢索系統結合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就有可能實現對觀念變遷的計量分析。

所謂規範性意義分析，是指研究者在閱讀某一原始資料時，儘可能將其中可以客觀化的信息提取出來，以建立數據庫。無庸諱言，不同的研究者在閱讀同一文本時，對文本意義的理解是有差異的，這往往與閱讀者的主觀詮釋有關，這使得文本中很多複雜的意義是無法客觀化的。這也正是思想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儘管如此，我們還應該看到，文本中很多內容，乃至意義，是可以客觀化的。例如作者在文中使用某個詞匯，闡述某個觀念或介紹某一學說，談及某一事件時，其基本立場是肯定還是否定，或有無明顯價值取向，不同的閱讀者應該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判定。又譬如，某一觀念或詞匯在某一時代有著多種意義，通過理念型分析，我們可以首先確定其意義類型，然後再判定某一觀念或詞匯在文章中使用時是屬於哪一種意義類型。

如何在思想史研究中拓展統計與計量的研究方法，我們已進行了多年的嘗試。1997 年我們的課題《中國現代政治文化形成的計量研究》(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得到香港政府(RGC)的資助。兩年來，這一研究已有了初步結

果，可以使我們粗略地討論統計和計量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問題。本文旨在簡略介紹我們研究的方法以及初步可見的研究取向，希望得到學界同仁的批評，更希望有興趣的研究者與我們合作。

二、統計樣本的選取：時段及文本

按照學術界較為一致的意見，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關鍵性時期，約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張灝將 1895 年至 1920 年前後大約 25 年的時間稱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期」，認為在這段時間中國思想文化發生著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化。⁶而在轉型期中，新文化運動(1915-1924 年)，則被學界公認是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關鍵時期。周策縱把 1924 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下限，理由是這一年開始國共正式合作，黨派活動與知識份子活動性質已完全不同。⁷而本課題的時段，則是由 1914 年至 1930 年。主要是考慮政黨意識形態的普及，因為國民黨改組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成熟主要發生在 1924-1930 年間。綜合以上因素，我們把選取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統計資料時段限定在 1914-1930 年，重點是 1915-1924 年的新文化運動。

近代思想史資料浩如煙海，研究者難以全面掌握。鑑於此，史學界已整理了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文獻資料選編。譬如中國大陸自 50 年代起就陸續選編過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各種文獻資料匯編。⁸儘管這些資料匯編給研究者極大方便，但基本不能用來作為統計分析的樣本。因為這些資料匯編大多是根據某一特定史觀，甚至是以選編者所處時期的主流價值為標準來選擇的(如文革時批林批孔的文獻匯編)，基於這類選本的統計結果，很可能只是證實了選擇這些資料時所具有的價值傾向，很難避免鏡像效應。我們

⁶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總第 52 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 年 4 月)。

⁷ 周策縱：〈以五四超越五四〉，《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2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⁸ 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先後出版的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回民起義》、《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共計十一種，二千多萬字。

決定選擇若干雜誌為文本，雖然 1914-1930 年間雜誌種類很多，但仍可以選擇在當時影響較大、又被後來歷史發展印證的十幾個不同流派的雜誌，來概括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潮。如何判斷該時段哪些雜誌在社會上最有影響力？這種評估雖有主觀成份，但相比之下卻最有客觀標準。例如單單 1920 年能夠找到的刊物就有 400 多種，而歷史研究者可以很快從中選出最有影響力的幾種。另外，每種雜誌是一個整體，展現了某一作者群觀念變化的連續過程。在本課題中，我們以數千萬字作為數據庫的限度，可以選十幾種雜誌作為樣本。新文化運動期間，最有影響且辦刊時間貫穿整個過程的當數《新青年》，在 1915 到 1926 年長達 11 年的時間中，它總共出版了 11 卷 63 號，字數達五百多萬。但是《新青年》在 1919 年 5 月到 1919 年 11 月間停刊半年；1922 年第 9 卷第 6 號出版後，又停刊了一年。兩次停刊期間，中國政治、社會乃至思想文化各方面均有許多重要事件，兩次間斷有損於統計分析觀念變遷所必須的連續性。另外，《新青年》像當時大多數刊物那樣，是一個同人刊物，撰稿者大多為有大致相同理念和追求的學者、教授，並不能充分反映出新文化運動中各種不同的觀念。

《新青年》之外，我們還選擇了《少年中國》、《每週評論》、《新潮》和《努力週報》四個刊物。《每週評論》1918 年 12 月創刊，1919 年 8 月停刊，其作者群與《新青年》重合，故可填補《新青年》第一次中斷時的言論空缺。而《努力週報》的作者群亦主要是原《新青年》作者中分化出來的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它於 1922 年 5 月創刊，1923 年 10 月停刊，正好可以填補《新青年》遷往上海變為季刊時所造成的第二次間斷。

《新潮》的編輯人員和作者主要是北京大學學生，它是一個在《新青年》直接影響下創辦的刊物。而《少年中國》是少年中國學會創辦的刊物，該學會在五四諸社團中會員最多、分佈最廣。這樣，《新潮》和《少年中國》這兩個刊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新青年》所創發的新思潮在廣大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中的回響。以上五種刊物，基本上代表了知識群體的思想。

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另一個重要方向，是新型意識形態的出現。新型意識形態雖最早在知識份子群體中產生，但產生後立即成為列寧主義和準列寧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即便是同一觀念，一旦成為政黨的指導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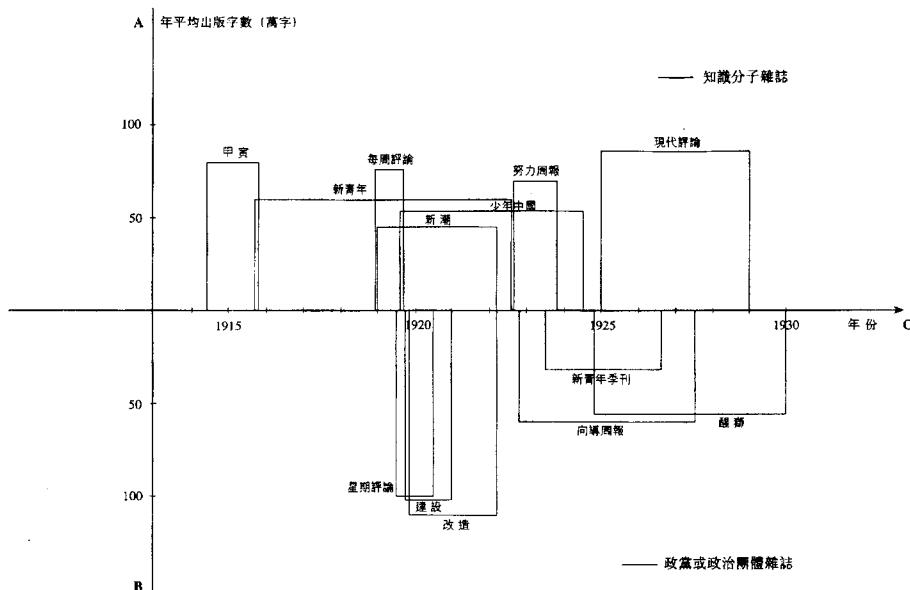
想和社會動員的政治口號後，其含義已和知識份子闡述的觀念有顯著不同。為了反映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於是我們選擇了由政黨主辦的《嚮導》、《星期評論》、《建設》、《醒獅週報》和《改造》(後更名為《解放與改造》)五種刊物。《嚮導》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機關報，1922年9月創刊後，在全國各大城市有三十多個分銷點。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學成立25週年紀念日舉辦的民意測驗中，還獲得各界讀者愛讀票220票，名列第一，可見《嚮導》較能代表當時知識份子所認同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是中華革命黨主辦的理論刊物；《星期評論》也是在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指導與支持下出版的。《建設》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成熟起過關鍵性作用，《星期評論》則以介紹社會主義、闡述改造中國的方略享有盛名，因此要了解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國民黨人對新文化運動的回應，這兩個刊物是必不可少的。《醒獅週報》是中國青年黨的喉舌，主要宣傳國家主義理論。《改造》則為研究系在新文化運動中創辦的刊物。梁啟超領導下的研究系雖然算不上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政黨，但它作為活躍於民初政壇和思想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議政論事不乏代表性。因此，選擇《醒獅週報》和《改造》，可以有助於了解國共兩個列寧主義政黨之外的重要政治團體的觀念變化。

除了上述十種刊物，我們還選擇了《甲寅》和《現代評論》。《甲寅》創辦於1914年5月，《新青年》作者中不少曾在該刊發表文章，大致代表著新文化運動起源時的觀念。⁹《現代評論》創辦於1924年，代表著新文化運動後與意識形態化知識份子所不同的思想走向。這兩種雜誌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新文化運動前後知識份子的觀念。

總起來說，我們選擇了上述12個雜誌作為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分析文本。這12個雜誌，總計字數約在三千萬。其時間分佈、雜誌類別以及大致字數，如圖一所示。在圖一中，縱座標OA對應的是知識份子群體言論的幾種刊物，與OB對應的則是有代表性的黨派刊物；橫座標OC是年代，可見上述12種刊物斷續相接，較為完整地涵蓋了新文化運動整個

⁹ 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

時段。¹⁰因此，可以說這 12 種刊物在時間分佈及言論代表性上，為研究中國現代政治觀念的形成，提供了相對完善、可靠的基礎。



圖一 十二種雜誌的時間覆蓋、類別及估算字數

三、規範性意義分析

一旦確定統計樣本，下一步就是如何對這 12 種雜誌的每一篇文章進行規範性意義分析。由於統計數量達到數千萬字，文章的意義分析不可能由一個或幾個研究者完成，本課題就有十幾個研究者參與。¹¹所謂規範性意義

¹⁰ 需要說明的是，《新青年》與《新青年》(季刊)，我們沒有作為兩個雜誌處理，但在圖表中，我們將《新青年》(季刊)列入政黨或政治團體雜誌，因其已成為傾向共產主義的理論刊物。

¹¹ 本課題在醞釀期間，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和上海復旦大學文學院院長姜義華教授的積極支持，以後又有十幾位研究者從事具體的分析研究：《新青年》的統計分析由香港的戚立煌先生、吳嘉儀小姐、周成海先生擔任，其餘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擔任，具體分工如下：《建設》(歷史系教師章紅)，

分析，其要求是，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者閱讀分析同一篇文章，最後達到的意義分析結果應該是相對客觀的。那麼，一篇非文藝類的文章中包涵了哪些可提取的具有客觀意義的信息呢？又怎樣做到儘可能多方地提取那些有助於思想史研究的客觀化信息呢？經過反覆探索，我們設計出一張規範性意義分析表格，即對每一篇文章，分析員必須提取 24 項和意義有關的內容。它們是：(1)系統編號，(2)文章篇名，(3)寫作日期，(4)作者名，(5)發表時署名，(6)字數，(7)文章體例，(8)文中所涉及事件，(9)文中所涉及國家，(10)文中所涉及歷史朝代，(11)文中所涉及黨派、組織、社團，(12)文中所涉及思潮、學說、主義，(13)文中所涉及學科，(14)文中所徵引的中國人物，(15)文中所徵引的外國人物，(16)文中所徵引的中國學者的論著、論點，(17)文中所徵引的外國學者的論著、論點，(18)文中所徵引的中國報刊，(19)文中所徵引的外國報刊，(20)文章主題類別，(21)文章結構和要點，(22)文中所引用的政治文化術語，(23)關鍵詞頻度和類型，(24)其他。

這 24 項內容中前 20 項並沒有涉及文章的意義分析，它們都是相當客觀的，每個閱讀者都可以做到同樣結果，似乎電腦檢索也可以做到。其實，電腦將遇到兩個無法脫離人工處理的問題。第一，即便是建立逐字索引的檢索系統，也並不能完全提取每一篇文章的意義結構。原始文本本身沒有也不可能提供規範性用語。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可能有「世界大戰」、「歐戰」等不同的提法；涉及到人物，特別是外國人物，則更有諸多不同的譯法，如「羅素」，單是《新潮》雜誌，就有「羅素」、「魯色爾」、「B. Russell」、「Russell」、「Bertrand Russell」及「羅氏」等不同的表述方式。第二，我們不可能在逐字檢索前預知某篇文章提到事件、人物、社團、學說等，也就是上述規範意義分析的第(8)至第(19)項，而這些內容，又是思想史分析所必須了解的。這樣要提取某一篇文章的完整信息，也必須通過對該文的細致閱讀，作出規範性定義，才可能進行完整的檢索。當然，我們設計這一規範性意義分析表格時，與一般文獻處理更大的區別還

《少年中國》(歷史系教師金燕)，《嚮導》(歷史系博士生汪乾明)，《甲寅》(歷史系博士生張謙)，《星期評論》(歷史系博士生黎建軍)，《改造》(歷史系碩士生楚永全)，《醒獅》(歷史系碩士生苑學武)，《新潮》與《現代評論》(歷史系碩士生孫青)，《努力》(復旦大學教師趙文彬)，《每週評論》(歷史系碩士生唐雲松)。

在於，我們要求分析員在閱讀文本時，不僅要計算出文章涉及的事件、國家、人物等出現的次數，並且還要求用「+」(肯定)、「-」(否定)、「o」(中性)三種記號來標出文章作者在涉及這些統計對象時所具有的價值取向。這就使得價值判斷和意義分析成為可以統計分析和檢索的了。

最後四項第(21)至第(24)，是規範性意義分析較為複雜的部分。其中第(20)項，相當於以往類似研究中對文章的意義分類。第(21)項要求分析員用原文十分之一的字數，簡述原文的主要觀點和論述結構。為保持文章的原貌，要求儘可能用作者的原話。思想史研究者通常需要閱讀大量原始文獻來鑒別他腦海中不成熟的思想，或提出某種新想法。這個原文十分之一的摘要，可以使研究者的資料閱讀量一下子減少十倍，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類似於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研究古代史的輔助作用。當然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去分析全文，但相信這類摘要，對研究者來說，有時候更容易形成對這些資料的總體印象。關鍵詞研究，已成為思想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在我們的研究中，第(23)項關鍵詞同樣是觀念計量的基本單位。與一般全文檢索關鍵詞不同，我們還徵引了重要觀念的例句。這一項在不同的分析員那裏，可能選擇各不同，為了做到在可能情況下的客觀性，我們還需要輔以全文光碟的關鍵詞檢索。在本課題中，我們共選擇了一百多個關鍵詞作為搜索對象，同時，為避免先入為主之見，我們要求分析員凡文本中重點討論到的關鍵詞，也需要列出來。¹²有了這一項，我們可以對影響中國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觀念進行分析。譬如「權利」這個詞，我們

¹² 我們所列出的參考關鍵詞，約有一百多個，包括：民主、民權、民治、民權主義、人權、平民主義、民本、權利、權力、權威、君主立憲、共和、憲法、憲政、地方自治、地方主義、聯省自治、獨立、聯邦、邦聯、工團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封建主義、勞工、勞工階級、智識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主義、泛勞動主義、世界主義、國際主義、民生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民族、軍紳、軍閥、唯物論、唯物主義、唯心論、唯心主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馬列主義、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革命、科學、常識、進化、進化論、演進、競爭、階級競爭、鬥爭、階級鬥爭、論理學、論理、王道、霸道、國家、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行會、自由、自由主義、自主、個人、個人主義、個性、個性主義、平等、博愛、人格、仁、仁愛、禮、禮儀、綱常、國粹、義、公德、公、私、正義、義務、文明、東方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倫理、孝、家族、宗法、家族主義、解放、愛情、世界觀、人生觀等。

可以列出在中國古代使用這一字的意義，它是權力和利益的總稱。19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份子用「權利」翻譯英文 Right，而 Right 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有純法律含義(如在法律或某種前提下特許做的或認為是正當之事)，也有自主性(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意義，甚至有道德含義。這樣根據對「權利」的意義分析，區別其使用中的各種類型，分析員在閱讀任何一篇文章時，原則上可以根據上下文，判斷文章作者在使用這個詞時用的是哪一種類型意義。一旦這些與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密切相關的術語的意義建立起數據庫，我們就可以用數量統計來揭示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某些趨向。例如只要統計「權利」這一詞使用時有關「自主性」這一類型意義出現的頻度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就代表著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理念，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逐步被中國人接受的，不同政治傾向的刊物其立場又如何。

至於最後一項第(24)項，我們用它來容納分析員在閱讀文本時，所發現的我們設計的規範性意義分析表格中遺漏了但又較重要，或有趣的信息。主要反映文章中的附錄部分，如附錄的表格、插圖，或文章中的前後題記。這最後一項，在不同時段不同類型的雜誌可能不同，我們保留此一項的目的，是儘可能不遺漏任何一項可以客觀化的意義信息。

表一為有關規範性意義分析的案例。從中可見，被分析的文章只有1900字，但我們所做的分析字數卻可能超過它。十二種期刊，數以萬計的文章全部都用這樣統一的表格做出規範性意義分析。而其中所涉及到的「人名」、「地名」以及其他用語的規範化，是下一步的工作。只有經過規範化的處理，整個檢索系統也才能更好地使用。

表一：規範性意義分析一個例子

(1)編號：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15.9.15/第三篇
(2)篇名：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
(3)寫作日期：無
(4)作者名：陳獨秀
(5)發表時署名：陳獨秀

(6)文章字數：約 1900 字	
(7)文章體例：半文半白	
(8)文中所涉及的事件：法蘭西革命 (+2)	
(9)文中所涉及的國家：	<p>法蘭西(+18)／英國(o2)／俄國(o1)／德意志(o5;-3)／印度(-1)／亞美利加(+1)</p>
(10)文中所涉及的中國歷史朝代：無	
(11)文中所涉及的黨派、組織、社團等：(德國) 社會黨 (o1)	
(12)文中所涉及的思潮、學說、主義：	<p>生物進化論／達爾文 (+2)；社會主義 (+3)；人權說 (+1)；軍國主義 (o1)；動物哲學／拉馬爾克 (+1)；財產共有制 (La communaute des biens)／巴布夫 (+1)</p>
(13)文中所涉及的學科：生物學 (+1)	
(14)文中所徵引的中國人物：無	
(15)文中所徵引的外國人物：	<p>拉飛耶特 (Lafayette)／法蘭西 (+1)／薛紐伯／法蘭西／教授 (+2)；達爾文／英國／生物學家(+3)；尼采／德意志／哲學家(+1)；拉馬爾克 (Lamarck)／法蘭西／生物學家 (+3)；巴布夫 (Babeuf)／法蘭西 (+1)；聖西孟 (Saint-Simon)／法蘭西 (+1)；傅里耶 (Fonrier)／法蘭西 (+1)；拉薩爾 (Lassalle)／德意志 (+1)；馬克思 (Karl Marx)／德意志 (+1)</p>
(16)文中所徵引的中國學者的論點及論著：無	
(17)文中所徵引的外國學者的論點及論著：	<p>薛紐伯：<i>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i>：「古之法律，貴族的法律也，</p>

區別人類以不平等之階級，使人各守其分位；然近時之社會民主的社，人人於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雖非全然消滅，所存者關於財產之私不平等而已。」(+)

拉飛耶特：《美國獨立宣言書》、《人權宣言》：人權可貴。(大意) (+)

達爾文：人類非由神造，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大意) (+)

拉馬爾克：《動物哲學》：順應與遺傳，為生物進化之二大作用。(大意) (+)

巴布夫：主張廢棄所有權，行財產共有制。(大意) (+)

聖西孟、傅里耶：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人各從其才能以事事，各稱其力以獲報酬，排斥違背人道之私有權。(大意) (+)

尼采：「吾德人勿勝而驕，彼法蘭西人歷世創造之天才，實現汝因襲之文明而戰勝也。」(+)

(18)文中所徵引的中國報刊：無

(19)文中所徵引的外國報刊：無

(20)文章主題：文明／近代文明／法蘭西

(21)文章結構和要點：

古代文明特點是「宗教止殘殺」、「法禁以制黔首」、「文學以揚神武」，這一點中西皆同。近世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有三事：

一、人權說：法國革命後，人之於法律之前一切平等，所存者關於財產之私不平等而已。

二、生物進化論：達爾文「進化論」來自法人拉馬爾克的「動物哲學」。

三、社會主義：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廣用，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

而上述三種事物，皆得力於法蘭西人的開創。

(22)文中引用的政治文化術語：

文明(o26)／人權(+4)／進化論(+2)／進化(o6)／社會主義(+3)／君主(-4)／獨立(+2)／自由(+7)／權利(+1)／法律(+3)／民主(+1)／平等(+12)／人格(+1)／公平(+1)／綱常(-1)／名教(-1)／社會革命(+2)／人道(+1)／軍國主義(o1)／科學(+2)／博愛(+4)

(23)關鍵詞例句：

文明：「文明云者，異於蒙昧未開化者之稱也。La Civilisation，漢譯為文明、開化、教化諸義。世界各國，無東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國，即不得謂之無文明。」

近世文明：「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近世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

社會主義：「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之制度，破壞無餘。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此制雖傳之自古，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

(24)其他：無

四、數據庫和思想史研究的新問題

80年代，法國學者白吉爾等曾探索做一項名為生平學的研究，即把幾類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跡集中起來進行綜合分析。在獲得種種傳記數據時，白氏感到了採用統計方法最突出的意義，是可以看到那些在描述、個案研

究中不能顯示出來的對數之間的關聯。¹³我們從事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統計研究，也深有同感。目前這 12 種雜誌的規範性意義分析已近於完成，還需要做大量核查、互校及標準化工作。我們從這一尚未最後完成的數據庫中，已大致可以發掘出以往思想史研究中注意不夠的新問題。例如，利用全文檢索，很容易逐年算出現代廣泛使用的政治術語的頻度。而這些政治術語，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相應的觀念在當時的社會上被重視與普及的程度。表二為「科學」、「民主」、「自由」、「權利」、「社會主義」等 15 個政治術語在《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每週評論》和《嚮導》五個雜誌中出現的次數，前一個數據是在多少篇文章中出現(此數字可以避免單純使用頻度統計中的問題，因為類似於專門討論「科學」、「民主」或「社會主義」的文章中，這些術語出現的次數並不能說明太多問題)，後一個結果是出現的頻度。¹⁴從這五個表來看，某些結果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它同思想史研究者以往產生的對新文化運動的總體印象，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表二 某些重要政治術語在幾種刊物中出現的頻度

A 《新青年》雜誌關鍵詞頻度統計(篇/次)

卷數	年份	篇數	自由	科學	民主	平等	權利	人權	常識	階級	傳統	個人	社會主義	階級競爭	階級鬥爭	帝國主義	軍國主義
一卷	1915.9/	173	44/	25/	7/	16/	27/	10/	5/	19/	0/	29/	6/	0/	0/	1/	10/

¹³ 所謂生平學研究，即把幾類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跡集中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因為是書寫群體的歷史，統計的方式也不可缺少。為此作者將研究對象的地理出身和社會出身，所受的小學、中學及大學教育，他們的職業和他們在若干重要歷史時段的政治選擇，歸納為 23 個變數。這些變數的類型總共有 216 種。參見白吉爾、康諾藹、安克強、何佩然：〈民國時期上海傑出人物生平學研究初探〉，《經濟、社會、文化年鑑》第 4 期(1985 年 7-8 月)，頁 901-30。黃慶華譯，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14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¹⁴ 製表說明：由於我們關於這十二種雜誌規範性意義分析的數據庫尚未最後完成，目前還不能得到上述關鍵詞的頻度統計。上述表格是依據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之《新青年》、《新潮》、《嚮導》、《少年中國》、《每週評論》全文光碟資料提供的檢索系統製作而成。由於光碟數據庫本身的製作不甚完好，個別文章有少量亂碼，因而會產生一定的誤差。本表雖不夠準確，但在此運用只是說明規範性運用分析數據庫建立後的用處。

	1916,2		254	73	14	43	126	24	6	33	0	72	9	0	0	1	19
二卷	1916,9/ 1917,2	161 79	41/ 146	39/ 6	2/ 48	16/ 72	30/ 7	3/ 9	5/ 26	17/ 0	0/ 108	33/ 6	5/ 0	0/ 0	0/ 0	3/ 5	6/ 50
三卷	1917,3/ 1917,8	155 155	34/ 117	42/ 30	15/ 67	24/ 47	24/ 3	3/ 2	1/ 25	12/ 0	0/ 109	33/ 7	5/ 0	0/ 0	0/ 0	2/ 2	6/ 7
四卷	1918,1/ 1918,6	118 55	34/ 98	1/ 58	6/ 7	9/ 26	2/ 4	9/ 17	7/ 10	0/ 0	48/ 221	1/ 1	0/ 0	0/ 0	0/ 0	1/ 3	0/ 0
五卷	1918,7/ 1918,12	163 93	26/ 152	38/ 11	2/ 35	20/ 46	15/ 4	4/ 8	6/ 45	11/ 0	0/ 226	68/ 11	3/ 0	0/ 0	0/ 0	0/ 0	5/ 16
六卷	1919,1/ 1919,11	167 144	31/ 287	39/ 32	9/ 50	20/ 76	21/ 21	7/ 10	6/ 236	26/ 1	1/ 359	65/ 124	19/ 32	2/ 0	0/ 3	3/ 6	4/ 6
七卷	1919,12/ 1920,5	151 324	41/ 324	44/ 23	10/ 103	27/ 216	46/ 15	9/ 14	12/ 263	40/ 0	0/ 591	83/ 97	21/ 4	2/ 0	0/ 10	6/ 9	8/ 9
八卷	1920,9/ 1921,4	180 357	48/ 216	47/ 97	15/ 110	36/ 186	40/ 7	6/ 10	73/ 713	2/ 3	66/ 330	64/ 532	0/ 0	0/ 9	2/ 18	15/ 4	4/ 4
九卷	1921,5/ 1922,7	133 182	34/ 159	38/ 47	15/ 201	25/ 157	33/ 6	5/ 15	11/ 1476	63/ 6	6/ 325	65/ 740	51/ 0	0/ 33	0/ 59	14/ 15	5/ 15
季一	1923,6/ 1924,12	69 148	27/ 276	28/ 113	24/ 49	15/ 59	23/ 2	2/ 4	55/ 2867	2/ 2	26/ 197	40/ 512	0/ 0	0/ 58	23/ 418	31/ 9	5/ 9
季二	1925,4/ 1926,7	59 132	18/ 65	13/ 99	20/ 37	13/ 37	15/ 5	4/ 3	35/ 2233	2/ 3	20/ 52	27/ 210	0/ 0	0/ 89	15/ 667	33/ 4	1/ 4
總計	1915,9/ 1926,7	1,529 1,923	359/ 1,913	387/ 530	120/ 750	218/ 1,048	283/ 98	55/ 98	64/ 98	358/ 7,927	13/ 15	536/ 2,590	242/ 2,249	4/ 36	46/ 189	109/ 1,186	54/ 139

B 《每週評論》關鍵詞頻度統計(篇/次)

年份	篇數	自由	科學	民主	平等	權利	人權	常識	階級	傳統	個人	社會主義	階級競爭	階級鬥爭	帝國主義	軍國主義
1918/ 1919	599 397	143/ 117	37/ 44	27/ 120	31/ 130	56/ 7	5/ 8	8/ 8	37/ 176	0/ 0	115/ 311	27/ 83	3/ 14	1/ 1	6/ 7	21/ 31

C 《新潮》雜誌關鍵詞頻度統計(篇/次)

卷數	年份	篇數	自由	科學	民主	平等	權利	人權	常識	階級	傳統	個人	社會主義	階級競爭	階級鬥爭	帝國主義	軍國主義
一卷	1919,1/1 919,5	146 70	13/ 570	47/ 124	11/ 54	19/ 11	5/ 4	3/ 22	12/ 55	20/ 0	0/ 286	66/ 46	9/ 0	0/ 0	0/ 0	1/ 1	6/ 13
二卷	1919,10/ 1920,6	133 76	8/ 502	44/ 96	17/ 90	21/ 46	21/ 6	2/ 36	7/ 142	30/ 1	1/ 629	96/ 36	0/ 0	0/ 0	0/ 0	3/ 11	2/ 5
三卷	1921,10/ 1922,3	42 29	5/ 173	18/ 28	7/ 9	5/ 7	0/ 5	0/ 21	5/ 0	0/ 159	26/ 15	6/ 15	0/ 0	0/ 0	0/ 4	1/ 0	0/ 0
總	1919	321	26/	109/	35/	45/	28/	5/	24/	57/	1/	168/	24/	0/	0/	5/	8/

計	/1922		175	1,245	248	153	64	10	63	218	1	1,074	97	0	0	16	18
---	-------	--	-----	-------	-----	-----	----	----	----	-----	---	-------	----	---	---	----	----

D 《少年中國》關鍵詞頻度統計(篇次)

卷數	年份	篇數	自由	科學	民主	平等	權利	人權	常識	階級	傳統	個人	社會主義	階級競爭	階級鬥爭	帝國主義	軍國主義
一卷	1919,7/ 1920,6	192	65/ 316	68/ 510	19/ 114	31/ 110	24/ 46	5/ 6	8/ 13	28/ 267	4/ 5	74/ 495	16/ 169	0/ 0	2/ 8	1/ 1	3/ 7
二卷	1920,7/ 1921,6	136	66/ 321	60/ 609	25/ 45	19/ 59	16/ 38	3/ 8	8/ 11	34/ 150	0/ 0	81/ 605	18/ 131	0/ 0	2/ 7	1/ 1	11/ 25
三卷	1921,8/ 1922,7	114	62/ 284	65/ 678	29/ 80	16/ 79	20/ 27	4/ 6	13/ 21	35/ 183	0/ 0	72/ 449	18/ 151	0/ 0	0/ 0	9/ 14	5/ 6
四卷	1923,3 1924,5	156	56/ 270	52/ 476	28/ 126	12/ 29	16/ 31	1/ 2	10/ 22	32/ 135	3/ 4	69/ 419	18/ 169	0/ 0	1/ 1	17/ 57	7/ 11
總計	1919,7/ 1924,5	598	249/ 1,191	245/ 2,273	101/ 365	78/ 277	76/ 142	19/ 22	39/ 67	129/ 735	7/ 9	296/ 1,968	70/ 620	0/ 0	5/ 16	28/ 73	26/ 49

E 《嚮導週刊》關鍵詞頻度統計(篇/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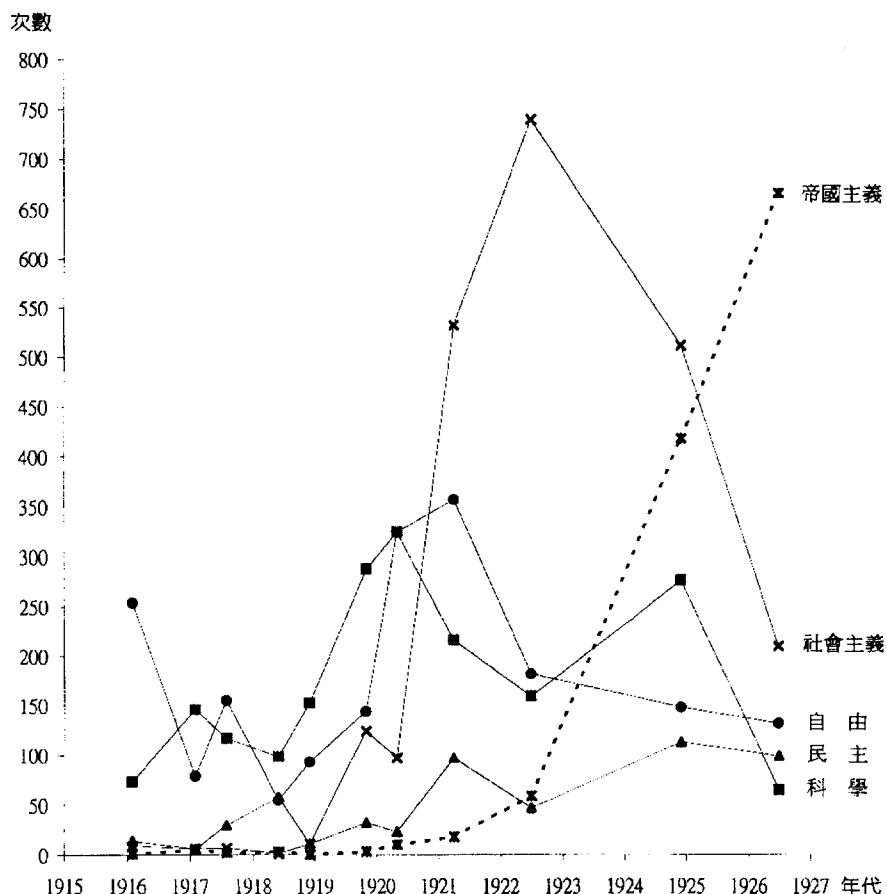
年度	篇數	自由	科學	民主	平等	權利	人權	常識	階級	傳統	個人	社會主義	階級競爭	階級鬥爭	帝國主義	軍國主義
1922	114	25/ 79	2/ 2	31/ 97	14/ 28	17/ 31	0/ 0	3/ 3	54/ 402	2/ 2	11/ 16	21/ 41	0/ 0	1/ 2	79/ 524	2/ 4
1923	351	49/ 96	9/ 16	54/ 184	10/ 10	34/ 46	7/ 9	11/ 12	111/ 580	4/ 8	47/ 77	11/ 17	0/ 0	7/ 8	168/ 670	1/ 1
1924	470	67/ 131	13/ 21	54/ 129	41/ 107	68/ 112	5/ 6	14/ 15	128/ 1,098	8/ 9	42/ 59	32/ 154	2/ 2	4/ 10	226/ 1,837	3/ 4
1925	304	82/ 297	7/ 8	51/ 179	71/ 201	52/ 107	3/ 5	3/ 3	174/ 1,902	6/ 8	39/ 56	23/ 47	1/ 1	25/ 69	217/ 2,409	3/ 4
1926	393	90/ 261	13/ 29	52/ 151	82/ 293	63/ 132	12/ 19	12/ 12	157/ 1,725	6/ 6	52/ 88	15/ 30	2/ 2	23/ 90	226/ 2,626	1/ 6
1927	226	42/ 98	6/ 23	61/ 207	28/ 99	36/ 56	6/ 7	1/ 1	98/ 1,600	2/ 3	35/ 73	18/ 54	1/ 1	12/ 33	125/ 1,515	0/ 0
1922-1927	1,858	355/ 962	50/ 99	303/ /	246/ /	270/ 46	33/ 46	44/ 46	722/ 7,307	28/ 36	226/ /	120/ 369	6/ 343	23/ 9,581	226/ 1,047	10/ 19

例如學術界歷史教科書普遍公認，科學與民主是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它們對新意識形態的成長起過極大作用，而自由卻是新文化運動的闕失面。但是我們只要看這五種雜誌中科學、民主、自由這些關鍵詞的總次數，即會發現上述印象是很成問題的。這五種刊物中，《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每週評論》四種刊物「科學」一詞比「民主」一詞出現次數要多得多(科學是民主的 2.6-6.2 倍)；而《新青年》中同「科學」(1,913 次)出現頻度相差不多的居然是「自由」(達 1,918 次)。《新青年》中，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權利」也比「民主」(530 次)高，出現 1,047 次。「自由」、「權利」共出現 3,000 次左右。「民主」在其他四種刊物中出現的頻度也不高。也就是說，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辦的刊物中較少提到民主，相比之下，作為經常提到的價值，自由並非五四思潮的闕失面。特別是 1920 年以前，這種情況更明顯。這是不是表明，雖然科學與民主同為新文化運動中反傳統與建構新文化的重要依據，但實際上，科學在建構新意識形態中的功能遠遠大於民主這一價值呢？當然僅僅依靠上述統計，並不能簡單地推翻原來我們熟悉的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高舉科學和民主這兩面旗幟的總印象，但是它起碼可以啟發研究者進一步將這一圖畫細化和複雜化。從這些統計可以表明，更能代表新文化運動中自由主義思想的應該是「自由」和「權利」這兩種觀念，而對此所做的觀念分析，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是做得很不夠的。

如果逐年分析這些關鍵詞出現的頻度，觀念變遷就呈現出十分清晰的過程。在《新青年》雜誌最初幾年，「社會主義」一詞出現的頻度極低，到 1919 年「社會主義」和「階級」這兩個詞的使用次數突然增加，並大大超過了「權利」使用的次數。到 1920 年 9 月後「社會主義」的出現次數終於超過了「自由」的使用次數。它極為形象地刻畫出知識份子主流思想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向。如圖二所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1923 年 6 月後，「帝國主義」一詞出現的次數突然增加，在此之前，其使用頻度極低；1924 年後，其出現的次數甚至超過「社會主義」，成為僅次於「階級」一詞、出現次數最高的術語。學術界將新文化運動的下限定為 1924 年，這恰恰是帝國主義和階級這兩個政治術語突然膨脹的年代。這兩者是否存在著甚麼聯繫呢？將《新青年》雜誌關鍵詞頻度變化同其他四種

雜誌進行比較，則可以看到更細致更耐人尋味的宏觀圖景。《少年中國》關鍵詞變化趨勢與《新青年》大致相同，奇怪的是它很少提及「帝國主義」。《新潮》不僅很少提到「帝國主義」，甚至連「社會主義」也很少出現。更令人意外的是，作為共產黨機關報的《嚮導》，除了頻頻出現「帝國主義」一詞外，它居然很少提到社會主義。相反，研究系辦的刊物《改造》，提到「社會主義」卻有 1,700 多次。

如果進一步把價值取向引入關鍵詞統計，並將它同人物、事件的引用聯繫起來，數據庫所顯示的宏觀統計更是閱讀這些原始文獻所不可能看到的。例如《改造》雜誌提及「社會主義」時，其中正面引用約 1,300 次，中性引用約 400 次，負面引用約 60 次；而提到「馬克思主義」時，約 50 次全屬中性引用。而《新潮》提及「社會主義」，正面引用僅 20 次，「馬克思主義」一次也沒有提到。這種差異同樣在對人物的引用上表現出來。新文化運動後期，杜威和羅素都來過中國，並對當時中國思想界發生過極大影響。但統計分析表明，不同知識份子群體對這兩位西方哲學家思想接受的程度極為不同。例如《新潮》雜誌對羅素和杜威的徵引，無論是正面的引用，還是中性的引用，在頻度上相差並不很大，但在《改造》雜誌那裏，提到杜威 15 次，其中 11 次為正面引用，4 次為中性引用；提到羅素 156 次，其中 62 次為正面引用，中性引用 94 次。很顯然，如果說《新潮》對羅素與杜威在思想上表示出相近的親和性，那麼《改造》對這兩位西方哲人的反映和評價相差如此之大，不能不說與其思想立場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將統計分析中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評價考慮進去，上述圖景變得更有趣。例如《改造》文章裏提到的國家中，對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徵引，無論在正面引用、中性引用和負面引用上，相差並不很大。總計引用在 1,100 次至 1,500 次之間，其中正面與中性的引用佔到絕大多數，而負面引用往往不及十分之一。但提到日本與俄羅斯時，情形有些例外，提到日本約 600 次中，其中負面引用差不多佔到一半；同時提到俄羅斯則很少，只有幾十次，其中正面引用也不多。《改造》雜誌算是民族主義色彩不甚強的雜誌，提到日本有那麼多負面引用，這無疑表明日本的國家形象在中國現代化效法目標上，已如明日黃花。而該雜誌推崇社會主義和羅素，同時對西方國家均衡引用，卻對俄羅斯相當冷漠，這一切又意味著，



圖二 《新青年》雜誌五個重要政治觀念出現頻度

在新文化運動後期，研究系力圖尋找一種既不同於俄國馬列主義又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它很像我們今天所講的第三條道路。而這一點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是不被重視的。

五、勾畫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圖畫

任何時候，統計數據所顯示的都只是現象，僅僅根據統計數據，當然是無法說明中國現代政治觀念是如何形成的。為了揭示某些政治觀念形成的機制，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深入分析意義層面。因此如何利用這些統計數據，就成為思想史研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我們認為，將某些重要觀念的意義分析與相應的統計聯繫起來，也許是今後值得重視的研究方向。根據我們所做的研究，或許可以大致說明其中的一些情況。

1998 年當計量統計顯示出《新青年》雜誌在使用「科學」與「民主」這兩個關鍵詞存在巨大差異時，我們隨即開始了對這兩種觀念的意義分析。《新青年》中「科學」一詞的使用，大多傾向於用科學來建構新文化，或者以科學與迷信對立，而並沒有如原來所認為的那樣是用來反對儒家倫理的。那麼，當時知識份子用於批判孔孟之道和官僚政客的重要觀念又是甚麼呢？我們發現，其依據往往的是「常識」，即新知識份子認為傳統的綱常名教不符合常識，那些守舊的官僚政客缺乏現代常識。據此我們進一步追溯常識在中國傳統道德系統中的地位，了解到傳統儒家的道德化宇宙體系，是建立在那個時代人們普遍認同的常識之上的。根據這些線索，我們提出一個假設，以勾劃新文化運動另外一個圖景。我們認為，1905 年前後，伴隨著科舉考試制度的廢止，新一代讀書人接受新式教育，他們成長的知識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使得在新文化運動中擔當主角的新知識份子所認同的常識，已是一種經現代科學“解釋”過的現代常識，同傳統士大夫迥異其趣。這樣，現代常識不僅成為那一代知識份子普遍的知識來源，相應的也成為批判傳統文化並用以建構新文化的基礎。我們將其稱為中國文化常識理性的變遷，這是新文化運動中觀念變化的更深層的動力。¹⁵

我們展開意義分析的第二條線索是對自由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命運的考察。既然民主這一觀念不能典型地反映中國知識份子對自由主義的認識，而當時知識份子更為關注「權利」，於是我們選擇了考察「權利」這一關鍵詞。首先，我們從義理上確定「權利」這一觀念的意義類型，接著分析在 1895 年前、1895 至 1915 年間和新文化運動這三個時期裏，中國知

¹⁵

金觀濤、劉青峰：〈新文化運動與常識理性的變遷〉，《二十一世紀》總第 52 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 年 4 月）。

識份子使用「權利」時，最普遍使用的是哪一種意義類型。我們發現，在1895年前，權利一詞極少例外地是用於指國家和群體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戊戌變法前後，士大夫用這個詞來指涉國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自主性，這也使得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用「權利」這個詞來翻譯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 right，而並沒有採用嚴復的「民直」一詞。在1900-1915年間，權利最通常的意義為自主性，但其主體是個人而非國家，這同1890年代已呈現微妙的差別。這說明中國人已開始意識到國家獨立自主的前提是確立個人獨立自主。當時的人用權利一詞時，常與競爭相聯繫，認為個人爭權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助於奮發競爭，順應物競天擇之規律，個人強才能使國家強。當時，權利為正當的含義中道德成份相對較少。權利與競爭相聯繫，促使人積極爭取自由，也使其同西方意義下的消極自由仍有距離。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儒家倫理被否定，中國知識份子迫切需要用新價值來填補道德真空，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權利這個詞的意義發生變化。人們很少再從競爭的需要來論證權利的合理性，權利不僅被當作積極自由，而且是一種和綱常名教對立的新道德，具有反傳統的積極意義。到新文化運動後期，由於個人權利被看作是一種新道德，道德的可欲性被賦予權利，因而人們下意識的要求權利規定的內容是人人可以做到的。而當人們發現在巨大的貧富差別下，窮人無法享有與富人同等的權利時，就會認為權利是虛妄的。1920年後，人們開始對權利持批評否定態度，認為它是階級的、不平等的，於是知識份子普遍傾向於放棄自由主義而認同馬克思主義。¹⁶權利這個詞的意義分析，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知識份子從自由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思想因素，這種因素，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很少被注意。

以上不過是通過建立數據庫而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政治觀念變遷的例證。顯而易見，因為在文獻中提取出各種意義信息，並且這些意義信息又可以借助於快捷的方式進行處理，因此以往思想史研究中一些感悟性的問題，在此或許可以進行一些具體的討論。譬如關於近代中國取法的「國家形象」，我們可以通過上述表格中的對「國家的徵引」，引述的人物、事

¹⁶ 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變化——一個比較思想史的研究〉，未刊。

件，以及對國外學者論著的引述，來進行相關的討論；又譬如關於那一代知識份子的知識構成、知識來源，以及對各種學說的立場，通過表格中對人物的評價，以及徵引的論著等項，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進行思考。

當然，在中國政治思想形成的研究中，規範性意義分析所建立的數據庫並不能直接顯示普遍觀念形成的機制，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歷史的、哲學的、語義的分析方法，以及從典型人物思想中提取那個時代思想的理念型等方法，依然是研究者的主要方法。而規範性意義分析數據庫，則為以上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輔助工具，用統計資料來驗證、細化上述研究，並且可以從整體印象中發現新問題。1920 年代胡適在講到中國思想學術研究如何運用現代方法時曾講過一句有名的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規範性意義分析所建立的數據庫，自然不會損害研究者在探討人類普遍思想變遷時那種大無畏的哲學思考空間，但卻為小心求證提供了某種更有用的工具。



檔案研究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歷史檔案簡介

史梅定*

上海自 1843 年開埠，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從一個縣城發展成世界聞名的中國第一大都市。在都市化的進程中，近代中國風雲變幻的大動盪，給具有獨特地理位置、經濟地位、文化傳統的上海打下了深深的印記，留下了卷帙浩繁、內容豐富的歷史檔案。這些歷史檔案現在比較集中地保管在上海市檔案館裏。

上海市檔案館總建築面積 29,000 平方米，其中檔案庫房面積 20,000 餘平方米。至 1998 年底，上海市檔案館收藏有 1,400 多個檔案全宗，計 180 萬卷檔案，其中近代歷史檔案 105 萬卷以上。這些近代歷史檔案主要是上海開埠以後整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形成的，記錄了一百多年時間裏上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城市建設各方面的發展變化，是研究上海近代歷史寶貴的原始資料。有些近代歷史檔案，或因出自名人之手，或因產生年代較早，或因記錄了重大歷史事件的始末，足以稱得上珍貴的歷史文物。

上海市檔案館從 1987 年 12 月 31 日開始向社會開放館藏檔案，至今已經開放了 12 批，總數為 742,657 卷。今後，上海市檔案館還將根據《檔案法》的規定，分期分批開放形成時間已滿 30 年的檔案。已經向社會開放的檔案，中國公民持合法證件就能查閱；香港、澳門、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可以通過上海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或僑務辦公室的介紹，外國人（包括外籍華人）可以經過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或有關主管機關的介紹到本館查閱，另外也可以提前直接向本館申請，經本館同意後，前來查閱、複製、摘錄或以函、電等方式查詢利用。以下分政府機構檔案、社會團體檔案、企業檔案、文化機構檔案、租界檔案、革命歷史文獻六個方面，對已經開放的歷

* 上海市檔案館副館長

史檔案作一簡單介紹。

一、政府機構檔案

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這類檔案，以立檔單位不同，大致可以劃分幾個部分：1、北洋時期市政機構、地方自治機構、審判機構的檔案；2、國民黨地方政府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檔案；3、國民黨政權中央駐滬機構的檔案。還有日偽機構的檔案。

北洋時期的檔案數量極少，且很不完整。存留至今的主要是有關華界市政工程和地方自治的一些材料。

租界設立後，實行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市政管理水平遠遠超出華界地區。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華界急起直追，取得明顯進步。館藏寶山塘工局、塘工善後局、淞滬商埠督辦公署工務處、上海市公所、上寶兩縣閘北市公所等機構的檔案。它們記錄了北洋時期華界修築馬路、下水道、駁岸、堤壩，以及疏浚河道等的情況，涉及有關工程的設計施工、工程款項的籌措及管理方面的一些材料。

上述機構中，上海市公所、閘北市公所等都是上海地方自治機構。清末，上海紳商要求實行地方自治，1900年有閘北工程總局之設，承辦市政工程，而1905年由李平書等人發起的上海城內外總工程局，更是將地方自治的範圍擴展到辦理警政等事項。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結束地方自治，這些機構的檔案也沒有保存下來。軍閥混戰時期，上海地方人士要求自治的呼聲逐漸高漲，至1923年，有上海市議事會、上海市董事會之設，上述兩個市公所隨後設立。就其主管事務而言，仍以市政工程的規劃建設為主，但也涉及教育、丈量土地、處理市民地界糾紛、頒發市民建房執照等。這些機構只有少量檔案存留下來，但是對於瞭解後期的上海地方自治運動情況，仍不失為重要的原始資料。

館藏檔案中，屬於北洋時期的重要檔案還有會審公廨檔案。會審公廨是1869年清政府按照《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在上海公共租界內設立的司法機構，辛亥革命時，被外國駐滬領事竊奪。中國政府多次要求收回未果。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中國人民收回公廨的要求更加強烈，經過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十餘次談判，終於達成收回的協定。館藏的會審公廨檔案，就有收回公廨過程的紀錄，包括談判記錄、江蘇省政府接收公廨的暫行辦法、收回公廨

暫行章程、各方面要求收回公廨的意見書、交涉收回過程中形成的各種來往文書等。這部分材料數量僅 10 卷，但對於研究這樁要案，卻是無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

1927 年南京國民黨政權建立以後，上海被闢為特別市，市政府和立法、行政、司法機構形成了大量檔案。可是，第一，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受戰爭影響，部分檔案被銷毀，部分檔案在西遷途中遭受損失，存留上海的檔案有相當部分遭破壞，第二，國民黨政府在遷台時帶走了部分重要檔案。故而館藏上海市政府機構的檔案絕大部分是抗戰勝利後形成的。

上海特別市政府的檔案是它們的核心部分，共約 12,000 餘卷。其中，有各項法規條例和辦事細則等法規性文件，市政府的人事、機構、財政等方面的材料，對於瞭解上海市政府的運作情況，是很有幫助的。而其主幹部分，當屬市政府的會議記錄、工作報告。它們內容覆蓋面廣泛。抗戰時期損失的調查材料、監視調查中共人員活動、有關工運和學運的材料都很受人重視。而作為一個行政管理機構，它形成的工商登記、社團登記、勞資糾紛、戶口管理、文化教育衛生機構的管理、市政工程的管理、公用事業的管理等等的材料，對於研究上海歷史，都很有利用價值。

上海特別市政府所屬各局和專門委員會的檔案，尤以社會局的檔案最多，達 23,000 餘卷。上海市社會局成立於 1927 年，館藏檔案形成於 1945 年至 1949 年。它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它的工作概況，同時也使人得以間接瞭解當時上海社會上的許多情況。各種社團機構的材料，比如工商企業、同業公會、同鄉會、工會、同學會、體育會、藝社、旅行團、研究會、俱樂部、劇場戲院、刊物等等的登記文件，更使人能對有關的情況有比較廣泛的瞭解。社會局還負責對市場的管理和調解勞資糾紛，在這些方面形成的材料，也是研究這一階段上海市場情況、勞資糾紛情況的一個重要資訊源。教育局的檔案除了反映該局和社會教育機構的組織和工作概況之外，還保存了各類大中小學、各文化學術團體的材料，對於研究 1927 至 1937 年，1945 至 1949 年期間的上海教育文化方面的情況，顯然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如衛生局、公用局、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都市計劃委員會、越江工程委員會、民食調配委員會等的檔案，都對研究它們各自主管的業務，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警察系統的檔案是這批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和區兩級的警察局形成的檔案的總數達五、六萬卷之多。除了各警察局的組織機構和人事方面的檔

案外，還有相當部分執行警察業務而形成的檔案，包括綜合性的和專題性的工作報告、戶口材料、管理劇場、旅館等公共場所的材料、辦理偷盜、綁票、煙毒等案件材料等，有助於研究當時社會情況。

法院監獄的檔案數量頗多，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江蘇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上海地方法院、上海監獄等司法機構遺留下來的檔案總數超過 20 萬卷。這些檔案除了一些法院和監獄的行政管理的材料外，主要是各種民刑案件的判決書。通過這些判決書，可以加深對當時司法制度的印象，同時對瞭解當時各種刑事犯罪，以及家庭、婚姻等社會情況也不無俾益。

上海市參議會存在時間不長，從 1946 年起到 1949 年止，僅三年左右，但是形成的檔案數量卻不少，有 2,000 餘卷。它們中有會議記錄、與市政府的來往文書、各種提案和意見書等，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上海市參議會的活動。

1927 年國民黨建立南京政府以後，許多中央機構在上海設立辦事機構，辦理有關事務，上海市檔案館保存了其中一些機構檔案。財政部上海鹽務辦事處的檔案有 3,000 餘卷，其中以民國初年設立的松江鹽運使署，以及以後設立在上海的各個鹽務機構的檔案，比較完整，對於瞭解上海及周邊地區的鹽務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抗戰勝利後，淪陷區的接收不但在當時是一個重大問題，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還引起了少學者的興趣，1946 年成立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存在雖則為時僅僅半年，檔案也只有 400 餘卷，而對上海日偽房產的接收分配等等，記錄比較詳細，可資研究者參考。審計部上海市審計處 1935 年成立，1937 年就因國民政府西撤而結束，它的 3,500 餘卷檔案中卻保存了當時在滬的中央和地方機構的工作計劃、報告、以及有關經費審計材料。

在這裏附帶介紹一下日偽機構形成的檔案。上海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先後扶植過 3 個傀儡政權：上海市大道政府、督辦上海市政公署、和上海特別市政府。這幾個傀儡政權，連同它們下設的各個局、一些區級機構、還有司法機構等，有總數近七萬五千卷檔案保存至今，單是日偽上海特別市政府的檔案就有 13,000 餘卷，為研究人員瞭解上海淪陷時期漢奸的活動和上海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這部分檔案，在《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日偽上海政權檔案概況及其初步評價開發》裏將作比較具體的說明。

二、社會團體檔案

上海市檔案館收藏了不少社會團體的檔案。按這些團體的性質，可以分為工商團體、同鄉團體、福利慈善團體等。

上海工商業發達，工商團體多，留下了為數頗多的檔案。國內其他綜合性檔案館中罕有能與之相比的，這些工商團體檔案成了本館的一大特色。綜合性的工商團體，如上海市商會、上海市工業會、上海商業聯合會（1927年3月—11月）由於其地位的重要，它們檔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數多達400餘個同業公會的檔案，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講，都頗可觀。具體情況可見《上海工商團體檔案介紹》。

上海同鄉團體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初。開埠以前，各路商幫紛至沓來，上海素來號稱五方雜處之地，其時山東、紹興、徽州、福建、潮州、寧波、江西等地商幫在上海相當活躍，需要有組織來維護他們的共同利益。開埠之後，上海更成了移民城市，從開埠之初的全縣50萬人，至清末上海華界租界合計達到近130萬人，本地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初時，來自廣東一帶的移民聲勢最大，隨後鄰近的江浙兩省居民得地利之便紛紛進入，超越了廣東人。辛亥革命以後，特別是20年代以後，舊式的會館公所組織形式逐漸發生變化，舊式的會董被選舉產生的理事、委員等取代，出現了影響較大的廣東同鄉會、寧波同鄉會、浦東同鄉會、湖社等同鄉團體。同時同鄉會的主要活動也逐漸由早年的辦理喪葬，運送棺柩回鄉等，轉為更多地注意為居留在上海的同鄉興辦教育、扶貧濟困、支援家鄉建設、甚至舉辦聯誼活動以維繫鄉誼。可惜的是，早期同鄉會的檔案幾乎蕩然無存，現存的檔案主要是本世紀形成的。可能與同鄉團體組織比較鬆散有關，除了一些比較大的同鄉團體檔案數量比較多之外，其餘的只留下了一些零星文件，從中只能大概看出這些團體的組織以及活動的概貌。個別團體，如湖社的檔案還比較完整，總數達500餘卷，除了社內各種會議記錄，各種規章之外，還因湖州為絲綢之鄉，保存了不少與湖絲的生產銷售有關的材料。

上海福利慈善團體的歷史比較悠久。上海1843年開埠，當年就有賒棺棧之設，為無法入葬的貧民賒棺，還開展施藥等慈善活動。1855年正式使用同仁輔元堂的名義，成為當時最負盛名的慈善團體。總計開埠以後的一百多年間，出現在上海的各種慈善團體，總數不下數十個。遺憾的是，許多團體的檔案沒有能夠保存下來，現存於上海市檔案館的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慈善團

體的檔案，數量也少。其中有 1912 年成立的中國救濟婦孺總會、1919 年成立的上海殘廢院、1923 年成立的世界紅十字會上海分會、1927 年上海及附近地區三十多個慈善團體聯合組成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等的檔案，從這些材料當中可以約略瞭解當時慈善事業的基本情況。

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的檔案可能會引起學者的注意。抗敵後援會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上海各界組織的一個民眾救亡團體，由杜月笙等十人組成的主席團主持，下設籌募、救護、運輸、慰勞、物資、宣傳、組織、設計等多個專門委員會，在八一三抗戰時為動員和組織上海市民投入救亡運動做了許多工作。上海淪陷後，該會救護委員會甚至在 1938 年上半年還繼續其救治傷員的工作。現存檔案有該會主席團會議記錄，各專門委員會負責人撰寫的各自從事救亡工作情況文稿等。雖則由於戰爭，該會如何成立，以及成立初期活動情況的檔案所存無幾，還是能反映出上海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動人情景。

三、企業檔案

上海開埠以後逐步確立了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萬商雲集，各式各類近代工商金融企業不勝其多，它們存留的檔案，應該是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近代企業檔案可以為相關研究提供必要的資料。

銀行的檔案是這些檔案中最受人關注的。上海金融業素稱發達，自 1897 年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設立之後，在半個世紀時間裏，上海內國銀行的數量超過百家，居全國之冠。尤其是 1927 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上海南京近在咫尺，原先總行在北方的一些銀行南遷上海，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牢固。這些銀行大都有檔案存留在上海市檔案館。其中，四行二局一庫的檔案，雖則數量多寡不等，有些還很不完整，由於其地位的特殊，值得特別注意。數十家民營銀行，包括北四行（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南三行（上海、浙江實業、浙江興業）、中國通商銀行、新華銀行等的檔案也都保存在本館。北四行、南三行的檔案數還比較多。它們都是各家銀行原始的歷史記錄，不但有助於瞭解它們的產生發展、它們的投資經營狀況，由於金融業處於經濟中樞地位，檔案中不少資料對於研究當時上海乃至全國的經濟狀況，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上海銀行的檔案裏保存了一些陳光甫的筆記、日記之類的

材料，還可以探尋陳光甫本人的活動和思想。

1917年發起，1920年正式創建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是中國最早一家綜合性交易所；1946年開業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則是當時中國唯一的證券交易市場；它們為數不多的檔案現存於上海市檔案館，對於研究中國證券市場的經營、發展的歷史狀況，應該說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證券物品交易所創建過程中，虞洽卿等人為交易所註冊一事的來往函電，記錄了當時活動的詳情。商人的鑽營、政府的腐敗，暴露無遺，實是難得一見的史料。

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萬商雲集，上海市檔案館收藏了一些工廠商店的檔案，其中以紡織企業的檔案數量最多。抗戰勝利後依靠政權的力量迅速膨脹起來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最大的民營紡織企業集團申新紡織總管理處，還有永安紡織總管理處，以及一批大小不等的紡織企業，如美亞綢廠、三友實業社等，多至上萬卷，少則幾十卷，本館都有它們的檔案。館藏化工企業的檔案比較多，中國最早的電解化工企業——天原化工廠——的檔案都在其中。機電製造業的檔案較少，而當時最大的民營機器廠——大隆機器廠——100餘卷檔案也在其中。資源委員會在上海的企業的檔案基本上都由上海市檔案館收藏。商店的檔案不多，但是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中的三個——永安、先施、新新的檔案也收藏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的立信、徐永祚、王海帆三個會計事務所的檔案也歸本館收藏。這些檔案記錄了各個企業本身的歷史，有些相當完整，企業發生發展的全部過程歷歷在目，有些則很零碎，只提供了點點滴滴的情況。不管怎樣，它們從不同的側面，具體地反映出上海經濟發展的狀況。對於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來說，這是很可重視的、有待開發一批原始資料。還應該注意到，這些企業檔案不光是企業經營、企業發生發展的記錄，同時也記錄了一些企業家的活動、企業家的理念。天原化工廠的吳蘊初、永安公司的郭琳爽，都有反映其思想過程的材料可資利用。因此，這些檔案對於研究中國的資產階級，也是很重要的材料。

本館收藏有中國旅行社的檔案。眾所周知，這家由陳光甫提議創辦的旅行社是國內第一家，有它獨特的研究價值。它的檔案對於研究其本身歷史，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史料。而它們之中還保存著抗戰爆發後各地分支機構關於當地的報告，對瞭解日軍暴行、社會動態來說，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四、文化教育機構檔案

經濟發展，中西文化交匯，人文薈萃，使得歷史上沒有名氣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成長為全國的文化中心。可惜的是，上海市檔案館收藏這方面的檔案數量不是很多，但仍不失研究相關問題所必需。

中國的高等教育，上海理所當然是一個發源地，各種教會辦的、本國人辦的學校，數量當居全國第一。本館收藏有二十多所高等學校的檔案。教會辦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在當時中國的教育界甚有影響。中國人自辦的大同大學、暨南大學，以及上海法學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等，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它們所留下的檔案，必定有助於對這些學校，乃至對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

上海也是近代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重要基地，眾多的新聞出版機構佔據了近代中國的半壁江山。本館收藏的新聞出版機構的檔案中，《申報》館和《新聞報》館的檔案，可能是最為人所關心的。但是《申報》創辦於 1872 年，《新聞報》創辦於 1893 年，而保存下來的檔案，卻只有 1923 年以後的。儘管如此，除了報紙本身，近 300 卷檔案恐怕仍然是研究這兩份報紙歷史最可靠的原始資料。當然，它們同樣是研究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歷史的重要材料。

科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家們的活動卻很少為人所知。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建設事業勵進社等社團的檔案，或許可以稍稍彌補這種缺憾。建設事業勵進社，創建於 1935 年，是交通大學幾位原電機系學生組織的，又稱一社。他們除了舉辦一些實業外，還設立出版公司，編輯出版《科學大眾》、《眾大醫學》等科技雜誌。這份檔案，連同中國業餘無線電協會等科技團體的檔案，在幫助人們瞭解近代上海科技活動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精武體育會的檔案。它的前身是是武術大師霍元甲 1909 年創辦的精武體操學校。雖然早期的檔案已經無存，但是 1937 年以後的還有百餘卷，可以看到它後期發展的情況。而檔案中有一冊十周年紀念刊《精武本紀》，不但回顧了它的歷史，還刊有孫中山先生精武會的題詞“尚武精神”和一篇序文，彌足珍貴。

五、租界檔案

眾所周知，近代上海的歷史是同租界分不開的，而要研究租界，則租界檔案是不可缺少的。上海租界檔案主要是指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檔案。

館藏工部局的檔案近 38,000 卷，最早的形式於 1849 年，終於 1943 年。檔案中董事會記錄、工部局公報和年報都十分完整，連同它的核心機構總辦處非常豐富的檔案，包括工部局各專門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等，無疑是研究公共租界制度和其發展歷史最重要的原始資料。警務處的大量檔案很受人重視，其中不但有許多規章制度、人事組織等方面的材料，可以研究它是如何運作的；警務日報中還保存了各樣社會、政治方面的情況，經常被研究者所利用。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孫中山先生到上海活動，警務處檔案裏都有詳細的記錄。而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如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一二八和八一三抗戰，就需要把警務處的檔案和總辦處，甚至董事會記錄等結合起來使用。工務處、衛生處等部門的檔案也非常豐富。前者有關路橋碼頭之類市政工程修建維護的記錄，後者有關公共衛生、疾病防治等方面的規定和所形成的材料，都是研究有關問題的學者應該注意的材料。工部局工業社會處的檔案裏有關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生活指數的統計材料，保存了當時社會生活狀況的很有價值的材料。

公董局的檔案有一部分保存於法國。儘管如此，上海市檔案館還是收藏了 1864 年至 1943 年期間公董局形成的約 15,000 卷檔案。雖然它的完整程度不及工部局檔案，仍然應該受到重視，它們也是研究法租界歷史情況，乃至研究上海歷史的重要材料。

六、革命歷史文獻

革命歷史文獻是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各種工人、青年、婦女等團體在地下活動期間形成的檔案和書報資料。上海市檔案館共收藏了 1920 年至 1949 年之間形成的革命歷史文獻共二萬餘件（冊）。由於地下活動的特殊環境，許多黨的文件是通過報刊的形式傳達到黨內各基層組織的，地下黨的報刊實際上也具有檔案的性質。

保存下來的革命歷史文獻中，有早期中共黨員的名單，記錄了他們的分佈情況，還有上海區委和各部委、各獨立支部負責人名單以及他們的分工情況，從中可以瞭解到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發展變動的軌跡。由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中共上海區委還領導了江浙兩省部分地區的黨組織，所以有關文獻中不但有上海黨組織活動的情況，還有上海周邊地區黨的活動情況的記錄。這些材料對於研究中共的早期活動，無疑有著重要價值。1925 年的五卅

運動，震動全國。館藏的革命歷史文獻，就有不少五卅運動中形成的材料，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是怎樣組織 5 月 30 日的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怎樣組織群眾實行罷工、罷課、罷市，與帝國主義開展鬥爭，怎樣組織實行有條件復工。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中共領導上海人民三次舉行武裝起義，反抗北洋軍閥，並在第三次起義成功以後建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有關材料，特別是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機關特委會全部 32 次會議記錄，提供了特別詳盡的記載，是研究這一段歷史必然要查閱的材料。1927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三次左傾錯誤，儘管廣大黨員英勇奮鬥，地下黨組織仍然遭受了重大損失，這些情況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都有反映。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制訂了「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鬥爭方針，上海地下黨執行這個方針的情況，在有關的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此外上海市檔案館裏還有不少反映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共地下黨在上海活動的珍貴檔案。

通過上面的簡單介紹，可以瞭解到上海市檔案館的館藏相當可觀。事實上，它的館藏檔案數量，在省市級檔案館中首屈一指。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如同學無止境一樣，豐富館藏和改善檔案結構，是檔案館工作永恒的目標。要想反映上海多彩的歷史，這些檔案固然不可少，同時也是遠遠不夠的。上海市檔案館全體工作人員對此十分清醒，一向努力於檔案的收集整理，不敢稍有懈怠。上海市檔案館能有今天的館藏，歷史的積澱是先決條件，而工作人員的努力也是值得稱道的。今後，我們還將孜孜以求更好地為國內外的學術界和社會服務。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日偽政權檔案概況及初步評價、開發

陳正卿*

上海市檔案館建立於 1959 年 12 月 31 日，截至目前為止，它是國內省市級檔案館中館藏量最大的館之一。尤其是它的歷史檔案館藏，向以藏品豐富、史料價值較高受到海內外史學者同仁的青睞。而在歷史檔案中，原上海日偽政權檔案又以機構全宗齊全，各時期保存完整，成為研究汪偽政權史和日本侵華史等課題的重要參考資料。下面我擬就館藏的日偽政權檔案、其價值初步評價及目前開發開放程度，做一介紹，有不當遺漏之處尚望予以賜教。

一、館藏日偽政權檔案概況

首先，我擬對館藏偽政權檔案前為何加諸“日”字做一說明。這主要是由於本館所藏的政權檔案基本全是偽上海地方政權活動形成的檔案。而其中若干重要的時間跨度最長的全宗，如偽上海特別市政府、偽上海市警察局、偽上海市教育局等，都包含有偽大道市政府、偽維新政府市政督辦公署、偽國民政府上海市府三個不同政權的公文檔案。這些偽政權雖然在宗旨旗號和人員班底上各有區別，但最根本的性質卻同出一轍，都是日本扶植之下的傀儡政權。同時，這些先後承繼的偽政權已將它們的檔案按歷史順序存檔案編目。故而，為了不割斷全宗的原有面貌和連續性，不再將之重新切斷為偽大道、偽維新、汪偽三個全宗，就從它們共同的性質出發，定名為日偽上海市政權檔案全宗群。

本館現在所藏的日偽上海市政權檔案據統計共有 459 個全宗，總卷數達到 65,000 餘卷。排架長度就日偽上海特別市政府一個全宗來說，即達 193.4 米。而該全宗卷數只為日偽政權檔案總卷數的四分之一，照此推算日偽政權機構檔案的總排架長度約達 800 米，這就為相關課題的開發研究奠定了深厚

* 上海市檔案館副研究館員

的材料基礎。館藏日偽上海市政權全宗檔案起訖時間為 1937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按原產生機構的性質、職能、背景、活動區域等劃分共為四類：

1、行政類機構檔案。這類機構一般都是日偽實施統治，推行政綱的政府機關。它在偽政權活動中起著中樞作用，這從全宗檔案內部的編目上都能明確下來。如偽上海特別市政府全宗共有 20 個目錄，其中除 1、2、3 號目錄分別為大道市政府時期、督辦市政公署時期、傅（宗耀）任市長時期三個目錄是按執政機構或執政人名稱確定的。其餘 17 個目錄即為偽市府文書立卷人員按不同的政務內容，以“綱”的名目分別歸檔的。內設警察、財政、教育、地政、公用、工務、衛生、糧食、經濟、各區、社會、總務、人事、統計等 17 個綱。歸入各綱的案卷即為偽市府對各類政務的命令、辦法、通告、呈文等，以及下屬有關局、委辦職責內政務致市府的呈文、報告、請示等文件。由於這一類行政機構檔案在偽政權活動中的突出地位，因此這一類檔案也是本館所藏偽政權檔案中起訖最長，研究參考價值最高的。即以上舉偽市府全宗為例，它自 1937 年 12 月偽大道市政府成立開始建檔，一直到 1945 年 8 月偽市府宣告自行解散為止，它幾乎涵蓋了日本佔領上海的全過程。和它具有上述相同特點的還有偽上海市警察局、財政局、社會局、教育局等全宗。它們也都分別反映日偽上海市政權在某一重要方面活動的基本概況。這類機構檔案占本館館藏日偽上海市政權檔案總卷數比例約 35%。它們的保管狀況也比較完好，目錄編制已基本達到了案卷級程度。

2、司法類檔案。這類機構檔案包括汪偽上海江蘇地方法院、汪偽江蘇上海第一特區法院、汪偽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汪偽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汪偽上海高等法院、汪偽上海高等檢查院署、汪偽上海監獄等 10 餘個全宗。對於這類偽司法機關，我先從歷史背景上做一說明。1937 年 11 月日軍佔領上海，隨即便扶植偽大道市政府，繼而擴組偽維新政府上海市政權，但因這些傀儡政權本無什麼民意基礎可言，故也未有問津司法機構之野心，國民政府所屬上海地區法院等均繼續堅守在租界“孤島”之內。1940 年 3 月，汪偽以國民政府“還都”為標幟，聲稱承繼國民政府法統，方有竊奪租界內中國司法機關的鬥爭。是年 11 月 8 日，國民政府江蘇上海第二、三特區地方法院被汪偽篡奪。繼而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淪陷，原租界內的國民政府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等也被汪偽劫奪，汪偽遂用以上司法機關以行其奸。1943 年 3 月，日本實行包括“發還租界”在內的所謂“對華新政策”，汪偽在“統一司法”的口號下，將原兩租界全部法院改組為汪偽

上海高等法院、汪偽上海高等檢查署等四偽司法機構。因此本館所藏的汪偽上海司法機構檔案全宗，便出現兩個埋藏的“斷層”，一部分起訖為 1940 年或 1941 年至 1943 年；一部分起訖為 1943 年至 1945 年。這些偽上海司法機構全宗檔案一般分為司法行政和司法業務兩部分。司法行政部分包括機構設置、人事變更及辦案章程、細則等文件。司法業務部分又分民事、刑事兩大類。須說明的是汪偽司法機構將抗日行為也隸為刑事類案件，藉此對抗日軍民加以迫害。司法機構全宗檔案一般都卷數偏多，如偽江蘇上海地方法院、偽上海監獄等全宗卷數都達萬卷以上。這自然一方面因司法文書本身具有較為繁瑣特點；同時，也與日偽統治帶來的社會混亂形成各類案件激增有關。因此，這類司法機構檔案與本館所藏日偽檔案總卷數比例最高，將近 50% 以上。它的保管狀況也較為完好。整理編目也基本達到了案卷級程度。

3、日偽政機設立短期機構全宗檔案。這類機構一般都是為適應日本侵華和偽政權賣國活動階段性政策需要而設立的。如日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市分會。它是日軍已泥足困頓於中國戰場，企圖通過所謂“清鄉”以確立日占區“治安”，指使汪偽政府設立的。1942 年 8 月初設，為突出其重要地位，該委員會主任由偽省、市府最高首長兼任。但因預定的計劃無法如期實行，便於次年 6 月在偽市府下設直屬的清鄉事務局之後，該會便壽終正寢。因此，它的時間雖僅 10 個月，卻反映了日軍侵華政策的動向。其次如偽上海特別市公路委員會。汪偽市政府原設有工務局公路處，但因 1945 年盟軍對日軍的大規模反攻，日軍被迫策劃的“大上海防衛計劃”中很重要一項，就是搶修市內和郊區的幾條軍用道。於是，偽市府便按日軍上海連絡部指使，于 1945 年 1 月設立了這一機構，由偽市府秘書長兼任該會主任。由於日軍很快投降，它僅存在了 7 個月。再有汪偽政權為推行其奸偽活動設立的臨時機構，如偽市府新建孫中山先生銅像籌委會，起因為 1937 年日軍進攻上海時，曾將原矗立於市府廣場上的孫中山銅像搗毀。汪偽政權建立後，為標榜其為孫中山先生合法繼承人，便於 1941 年 2 月與日方合作在市中心區重建銅像，並成立專門委員會由偽市長兼任會長。但因經費未予落實，因而該會活動時斷時續。直至日本投降，重建銅像仍流於紙上談兵。又如偽上海特別市青年團指導部，成立於 1940 年 3 月，其前身為偽維新政府的中華青年團。汪偽建立後，偽市黨部以其前身所奉行宗旨與三民主義不合，下令停止活動，故該機構也僅存在了兩年。上述這類日偽上海政權下屬的短期機構全宗檔案，因時間較短自然卷數偏少，並有零散不夠完整的現象。所以這類機構檔案全宗數雖近 20

個，但卷數只占館藏日偽檔案總卷數的 10%左右，而整理編目也已達到了案卷級的程度。不過因它們反映了日本或偽政權某一階段政策的調整和變化，其參考價值亦不能忽視。

4、日偽上海市政權下屬的區級偽政權檔案。這類檔案按照正常檔案管理程序，一般應由現上海市的區、縣級檔案館保管。由於這些機構所治轄區域或在當時日偽統治時期即變化；或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新劃分了區域；這些被裁併後的區、縣政權檔案按規定即為上級機關接收，所以這些檔案就為上海市檔案館所收藏。館藏偽區級政權檔案計有：日偽上海滬西區公署、日偽上海市第一區公署、第七區公署、第八區公署等近 10 個全宗。其中除偽滬西區公署全宗檔案起訖年代為 1938 年至 1945 年，其餘均為 1943 年至 1945 年。由於上列偽區級政權管轄的範圍多數為原租界繁華地段，區公署署長甚至由汪偽政權第二、三位要人陳公博等兼任。因此區級政權的機構的設置亦相當完備。並因它直接面對下屬鄉、鎮、保等偽基層政權，所以檔案中各級偽政權的通告、辦法、訓令、表報等也較為完整集中，並有相當材料還直接反映了日偽統治下的民眾呼聲。這類檔案占館藏日偽政權檔案總卷數的比例為 5%左右，且整理編目也達到了案卷級程度。

從上述概況介紹中可以獲悉，本館所藏的日偽政權檔案具有相當的完整性、系統性，並已形成了一個案卷級的目錄檢索系統。當然，這是幾十年來幾代檔案工作者精心保護、辛勤勞動的結果。今後，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就如何一方面將案卷級目錄深化到文件級；一方面使這一檢索系統進入到現代化的電腦管理程式中。

二、館藏日偽政權檔案價值初步評價

歷史檔案的重要價值之一是修史編志。同樣，本館所藏的日偽上海市政權檔案對史學領域相關課題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因為歷史科學是一門實證科學，日偽政權檔案正是其產生機構留下的最原始憑證。根據我們多年來對這部分檔案的整理編目、開發研究，認為它對下列課題的研究當起著推進作用。

1、對日偽上海政權史研究。日本對華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既定方針之一，就是實行“以華治華”的政策。1937 年 11 月，日軍剛佔領上海，就著手物色和扶植偽政權。這就是於 12 月 5 日成立的以蘇錫文為市長的偽上海市

大道政府。偽大道政府在日本華中派遣軍特務部的指使下，宣稱“祛除國共兩黨，確立東亞和平”，“實行日、滿、中一體化精神”。它設有警察、財政、社會等四局二處一科，基本上具備了一個傀儡政權的雛型。1938年4月，日軍在梁鴻志等叛國之後，在華中日占區進一步扶植了傀儡政權偽維新政府。偽維新政府以行政院直隸的名義，在上海設立督辦市政公署。市政公署下設秘書和財政、警察、社會、教育、工務、土地等一處六局。同時，又將日軍上海佔領地區劃分為市中心、寶山、閘北、滬西、南市、浦東南、浦東北等12個區，設區政務署進行統治。是年10月，偽維新政府正式明定上海為特別市的地位，任命了傅宗耀為偽市長。上海特別市政府又增設了司法、公用、衛生、宣傳等一處二局一委，使下設機構達到二處八局一委，所轄區治也新將崇明由江蘇劃入上海增為13個區。汪偽政府登台後，它合併維新、臨時兩偽府，以中央政權的面目出現，上海特別市的地位不變。在傅遇刺後，汪偽就任命二號人物陳公博為上海特別市市長。陳上任後為了日軍侵華需要和加強自身統治，曾幾次調整和新設下屬處、局、委等機構，區治在日本“歸還租界”後也重新劃定了8個區，不再以舊地名為區治名，以第一、二、三等依次排列。原公共租界地區劃為第一區，原法租界地區劃為第八區，同時，偽市府還宣佈更改上兩區及越界築路地區路名逾230條，以中國的城市山河名取代原外國人名、機構等名。1944年11月，汪精衛死於日本，陳公博繼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軍委會委員長，周佛海又以二號人物地位接任偽上海市長。至1945年8月偽市府隨偽國民政府一同自行解散。這就是偽上海市政權近8年的沿革概況。

近年來，偽政權史研究在海峽兩岸都受到了相當的重視。作為抗戰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側面，對我們這個以民族大義為“忠奸”首要標準的泱泱大國來說，它所引起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同偽滿洲國史、偽華北政權史等偽地方政權史相比，上海偽政權有著明顯的幾個特點：1、上海的偽大道市政府是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最早建立的地方偽政權，它比1937年12月的北平華北臨時政府早10天，更早於次年的南京偽華中維新政府。這說明日軍對於在上海通過扶植偽儡以建立統治願望之迫切。2、偽政權一般都以失意政客、下野軍閥、幫會頭子等為基本班底，這反映了這些賣國丑類確實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腐朽一群。而上海偽政權中卻有相當成分為商人，如蘇錫文是日商洋行買辦；後繼的傅宗耀更是上海商界聞人。在汪偽政權中，商界人物亦不為少。這說明商人如果只昧於一己之私欲，同樣也會不顧民族大義。3、從它

的活動實踐來看，它較多地充當了日本“以戰養戰”經濟掠奪政策的工具。據檔案顯示，日軍在上海地區不論是發行軍票或偽幣，還是直接掠奪戰略物資和生產設備等，都居全國各城市之首。以上三點僅是筆者近年來從事這一工作的膚淺認識，如深入探究，當遠不止這些，可見偽上海政權史作為獨立課題研究的價值。

2、研究汪偽政權史。汪偽政權以中央政權自命，它真正的行使權力範圍僅為滬寧兩市和蘇浙皖部分省區。上海是汪偽政權登臺的醞釀地之一，汪偽政權成立後，偽上海市長一職除前期由傅宗耀擔任，此後均由汪偽二、三號人物擔任，汪本人也對上海偽政權的活動多次直接訓令指示。其次，汪偽政權的財政來源據檔案反映相當一部分均來自上海。因此，偽上海政權史研究成為汪偽政權史研究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同樣，在日偽上海政權檔案中留下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活動記載，又是研究汪精衛等人和汪偽政權活動的重要資料。

3、研究日本侵華史。上海偽政權作為日軍“以華治華”侵略政策的產物和工具，它參預了日軍侵略上海的許多重要罪行，這在檔案中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記錄。如日軍在佔領上海初期的燒殺暴行，因每次行動都有偽軍警配合，偽軍警又上報偽市警局，這就成了揭露日軍暴行的佐證。據偽市警局檔案記載，從1937年12月至1939年6月，日軍在上海市區南市、閘北及郊區川沙、南匯、青浦、寶山、崇明、閔行等地的燒殺暴行多達數十次，有一次屠殺軍民達數千人，燒毀房屋達上萬間。此外，在偽上海市衛生局全宗檔案內，也有日軍在上海設置“慰安所”的罪行紀錄，如日軍上海復興部指使日本特務小谷冠櫻，在虹口、閘北、楊浦日海軍警務區域統一組織慰安機構的公函、章則、通告等件，這些文件都有力地揭露和證明了日軍這一非人道的暴行。此外，日軍在上海販賣毒品、組織特務機關、強徵中國戰略物資、強佔中國土地房屋、指使暗殺逮捕抗日人員等等，在上海偽政權檔案中都有不容抵賴的記載。有相當部分還留有日軍機關的秘密指令，如當時汪偽76號特務槍殺的重慶金融機構駐上海地下人員稽鯤生一案，偽市警局檔案中就有日軍上海特務機關的密令，令偽警政部對稽作“適當方法之處置”。由此可見，日偽上海政權檔案對揭露和研究日本侵華史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4、研究日偽統治時期上海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於戰爭帶來的極度動蕩混亂，給上海社會生活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此後長時期產生著負面影響。在日軍佔領下，當時上海一面是陷於饑餓死亡邊緣的數十萬難民，一面是租

界內瘋狂的投機和畸形的繁榮。由於生活物質的極其匱乏，以及人性的極度摧殘，加之日偽有意識地在扶植各種犯罪活動，這就派生出許多特殊的社會現象，引發了各類案件驟升。這也是偽上海司法機構檔案偏多的根由之一。同時，上海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國際大都市，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英、美、法等國僑民，包括日本僑民在內，以及數萬猶太難民等，都各自經受了一段不平凡的歲月。因此，研究日偽統治時期的上海社會生活，對諸多社會人文科學領域都會有新的收穫。日偽上海政權檔案中保存的大量社會生活史料，應該說是一個極其豐富的礦藏。

上述館藏日偽上海政權檔案價值的初步評估，僅是據我們幾年來有限的開發研究工作所得出的，可以說僅是一窺之見，更多有價值的研究角度和材料，尚等待各方面學者共同去開發。

三、近年來館內外研究者對日偽上海政權檔案的開發

自 1979 年以來，上海市檔案館根據有關方面“開放歷史檔案”的指示，對館藏歷史檔案進行了開發。開發的形式除了一方面向社會開放提供給利用者外；一方面也由本館編研人員編纂公佈史料或進行專題研究發表。本館編研人員從這一工作剛起步，就將編纂開發日偽上海政權檔案作為重點項目之一。1986 年本館編纂的《日偽上海市政府》這本史料彙編，就是這一課題最早成果。全書材料基本選自日偽上海市政權檔案，共計 35,688 件，約 65 萬字。它主要從組織機構沿革，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四個方面反映了日偽上海的政權的活動梗概。該書所收檔案公佈後，對推動上海抗戰史和汪偽政權史研究起了一定影響。當時最為上海史學界稱道的是將偽上海市大道政府、偽維新政府市政督辦公署、汪偽上海特別市政府這三個政權之間的更替交接過程，作一基本釐清，避免了以往因統治時間短、統治區域小而以訛傳訛的錯誤說法。現在此書仍為研究抗戰時期的上海必備史料之一。這一方面檔案開發的另一成果是 1995 年編纂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罪行史料彙編》。這本史料分為上、下兩卷，共 104 萬字。書中所收材料除去其他方面史料外，由偽上海政權檔案中共收錄文件 400 餘篇，近 30 萬字。這些偽方檔案主要是圍繞日軍在上海所犯各類罪行進行選編的，其中關於日軍如何操縱控制偽政權、偽組織；偽市府關於日軍在閘北縱火、在本市及華中地區販毒、實行軍事“清鄉”；偽市警局關於日軍在市內及郊區燒殺製造恐怖事

件、實行市內封鎖；偽市衛生局關於日軍設立慰安機構；偽市社會局關於日軍強募、騙募勞工；偽市社會經濟局關於日軍實行物資徵收、經濟封鎖；偽市教育局關於日軍毀壞學校、逮捕師生、查禁愛國圖書等方面罪行，都從檔案史料角度在本書中有了新的開掘，並取得了一定突破。由偽方檔案來證明日方罪行，這無疑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可信性、準確性。其次，在本館主辦的“抗日戰爭與上海”的大型圖片、文物展中，也從日偽檔案中挑選了若干檔案原件，作為日偽罪行的證物。

同時，在館刊《檔案與史學》及前身《檔案與歷史》上，歷年來也陸續公佈了偽上海政權檔案中選錄的史料 10 餘組。其中《汪精衛致周佛海等函》、《偽大民會史料》、《侵滬日軍搜掠婦女充當慰安婦史料》、《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協議》及附錄中文副本、《日本駐汪偽政權軍事顧問錄》等等，都受到了史學界的注意，有些已被一些權威著作引用。

館內編研人員在開發編纂史料的基礎上，數年來也陸續撰寫了一批論文發表在有關學術雜誌上。如陳正卿的《日本華中“毒化”和汪偽政權》；莊志齡的《抗戰時期日偽對上海教育事業的破壞》；邢建榕的《海上三老之一聞蘭亭》；黎霞的《抗戰期間日軍在華推行軍票史》等。近年來本館人員還參加承擔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關係研究課題之一《抗戰時期日偽對華中淪陷區的經濟統制》；上海市“九五”重大社科專案《上海抗戰史》第六卷《日偽上海統治和暴行》等專案。館內也確定了《日本侵略上海史》這一專題科研專案。這表明本館在前幾年初步開發研究的基礎上，還要投入更大力量進行這部分檔案的開發與研究。同樣，也希望海內外同仁就此與我們展開廣泛的交流和合作。

作為這部分日偽政權檔案開發的另一主體渠道，是向社會公眾開放，提供給國內外學者查閱使用。日偽上海政權全宗檔案經過多年整理編目，現已基本全部對社會開放。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南京南京大學；長春吉林社會科學院日本所；以及臺灣和香港地區的一些高等學府和研究機關都曾有學者來館閱卷。他們利用檔案撰寫的有關日偽政權和日偽統治時期社會生活研究的論著，都獲得在國內權威雜誌上發表，如黃美真教授的《論淪陷時期的上海工運》、張濟順教授的《淪陷時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劉志英講師的《汪偽政府糧政述評》等等。這些文章都引用不少檔案史料，使文章立論的材料基礎更趨紮實，體現了研究者新

的視野和深度。

來自國外查閱日偽政權檔案的學者也日漸增多。據筆者所知，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魏斐德教授，他查閱汪偽政權檔案的目的，是為研究淪陷時期的滬西社會生活狀況。另一位美國學者是密蘇里大學的謝文蓀教授，他的《“孤島”時期經濟研究》已提交給了在臺灣召開的「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最近，美國密西根大學的中島知惠子博士，為撰寫《1926年至1945年上海公共衛生行政與觀念的變遷》論文，到館查閱了1938年至1945年偽上海市衛生局的檔案。這一時期的機構設置與評估，當然是這篇文章中不能缺少的。

來自法國的學者有里昂大學第二分校東亞學院院長安克強教授，他所從事的《日偽上海社會、經濟研究》課題，是帶有宏觀考察色彩的，因此瀏覽的檔案數量也比較多。與他相映成趣的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馬丁，他的課題僅限於《日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但從這樣一個短期機構卻分析了同時期的日偽關係。日本來的學者有愛知大學教授森久男、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西村成雄、新潟大學教授古廄忠夫、和光大學教授山村睦夫等。古廄忠夫教授就使用了汪偽市政府孫中山銅像籌委會的檔案，他所撰寫的論文即為《日偽對孫中山的態度》。

這些外國學者前來查檔，不僅解決了他們的研究材料，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資訊和新的研究思路，客觀上也促進了本館的進步。

海峽兩岸檔案利用比較

張 力*

今年(1999)四月十三日國史館宣佈，該館已自「四月九日起，館藏檔案之複印，每頁（單面）酌收工本費一元。」而在北京出版的《百年潮》今年第四期中，刊出楊奎松的〈在台北看檔案——台北印象之四〉一文，對該館提供檔案借閱的迅速便利，服務人員的態度親切，以及複印檔案收費低廉，贊不絕口。回想三年前我因批評國史館的調閱及複印檔案規定，開始關切台北幾個檔案機構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今得知國史館更加便利讀者，且受到外界好評，心中也頗為國史館高興。

1995年年底我獲邀在國史館主辦的「中華民國史第三屆討論會」中宣讀論文。次年三、四月間為了修改論文，首度向國史館提出申請查閱檔案，頗感意外地找到幾種直接有關的重要資料。在閱讀檔案時，卻發現當時的一些規定頗值商榷。首先是每頁文件未滿 250 字者不得複印，而複印一張收費高達五元。複印完畢後需經其主管審核，方可取走。此外，該館同仁午休時間，讀者不得入館閱讀。

我以為國史館並無可能逐頁計算字數；收費過昂，會令研究者不敢多印，甚至裹足不前；主管審核更是沒有必要，否則就不必准許複印了；讀者來館是希望爭取時間閱讀資料，館方應儘量配合才是。我向承辦人員說明這些想法，並舉出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及陽明書屋已上軌道的合理規定，作為參考，希望其能向上級反映，然而承辦人員歉難照辦。

到了 6 月 21 日，我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版上讀到同事黃克武先生的〈我們正被迫失憶〉一文，針對台灣省文獻會保存的兩冊「台灣總督府檔案」流落舊書攤之事，提出批評，進而檢討國內檔案機構的管理制度。克武兄主要興趣在思想史，此較不需要運用檔案，卻關心檔案之開放與利用。我的研究需要參閱大量檔案，應主動爭取檔案的合理開放。既然報紙對此議題有興趣，打鐵必須趁熱，就在 7 月 8 日投書《聯合報》，刊出〈別讓歷史留白，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檔案管理該加油），藉著呼應克武兄之文，表達我對國史館複印規定的前述意見，順便也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簡稱史編局)機密檔案之認定提出質疑。由於一時之間國史館尚無具體回應，我又在 8 月 16 日趁報載「大溪檔案」準備對研究者開放之時，再度投書《聯合報》，希望國史館修改複印規定及降低收費。

我的建議果然獲得國史館的重視。不久之後，國史館調降了複印收費，取消字數限制和審核的規定。中午也不再閉館。此外，國史館還主動擴充閱覽室空間，改善照明設備。潘振球館長和朱重聖副館長近年來的大幅度改善檔案借閱服務，表現了勇於任事的態度。如今中外學者不時到館閱讀檔案，給予佳評，國史館當之無愧。而此一轉變，必然帶動該館同仁研究風氣，提高論文質量，國內外史學工作者也受益匪淺。

閱讀史編局的檔案，又是另一番曲折故事。其實早在 1995 年年初，我為了修改一篇海軍史的論文，曾向史編局申請閱讀一批檔案；然而經過該局審核後，部份檔案未獲同意借閱，其中包括一卷 1930 年代初期的長江禦敵計畫文件。後來我雖然完成論文修改，卻以未能蒐集足夠的資料為憾。

史編局為軍事單位，我能體諒其謹慎作風。然而謹慎過度，就不免與研究者的需求產生衝突。該局同意借閱的檔案，倒是可以利用映讀機閱讀縮微膠片，還算方便。但若遇上需要大量抄錄的文件，就十分耗時了。我曾建議該局提供可直接複印的映讀機，然而承辦人員表示，映讀機原可複印，卻因損壞，若要修復，得耗費鉅資，當時又無添購新機器的預算。後來採取變通辦法，即先閱讀縮微膠片，若有需要時，再由檔庫調回原件複印，但多此一道手續，彼此並不方便。

兩年以前，史編局對機密檔案的認定，仍是不易解決的問題。當我接觸史編局檔案後，發現我所關心的民國海軍檔案，確實多不勝數，因此若要從事海軍史研究，這批檔案應能發揮極大的幫助。但是人為的限制，使得閱讀檔案總是有些缺失，不免時感扼腕。1997 年 1 月底我趁湖北中山艦撈出水面，媒體注意此事之時，借題發揮，指出海軍總部編印之史料集錯誤百出，愧對前輩。更以大陸接連出版海軍史專書，提醒軍方「認識國軍恐怕得透過解放軍」，因為我們拿不出海軍史的學術著作，只好參閱大陸的出版品。但是此一呼籲，也只獲得少數海軍退役將領的表示同感，並未有具體解決方法。

其時我正在進行另一個海軍史課題研究，而所申請參閱的軍事委員會檔案全部不准借閱，當時的認定是凡冠有「軍事委員會」名稱的檔案，全屬機

密。然而國民政府時期的軍事活動，哪一項不和軍事委員會有關呢？無法閱讀這些檔案，研究必然有所缺陷。我曾為此致函國防部蔣仲苓部長，請求協助，卻一直未接獲回音。是年七月，史編局舉辦七七抗戰六十週年特展，幾位退役將領參觀展覽之餘，頗為軍史之不受重視而嘆惋。於是我又借題發揮，指出檔案借閱不便，打擊了研究者的士氣，我所調閱軍事委員會檔案不獲批准就是一例。傅應川局長閱報後十分重視此事，經瞭解後，該局實已批准，我則因未接獲電話留言，也未有信函通知，以致造成誤解。

自此之後，據我所知，史編局的機密檔案認定已較前開放，原則上 1950 年以前的檔案大都可以借閱。而該局似已編列預算，購置新型映讀機，方便讀者複印。希望這也能在最短期間內實現。

據我所知，史編局在五年以前即開始將檔案製成光碟收存，目前完成若干，我並不清楚。據聞該局又有續製光碟的計畫，我個人肯定此一做法，更希望將來多製作幾份，存於全台各地的軍種總部和學校之中，方便對軍事史有興趣的軍方和民間人士閱讀，至少同屬學術機構的三軍官校要留存一份。如此軍方和民間的學術交流將會產生更具體的成果。

針對外交部提出批評，倒是自己原先也想不到的事。1995 年 7 月，我從《世界日報》得知外交部行將開放三十年以上之檔案，供研究者借閱，為之雀躍不已，心想自己停頓多時的國際聯盟與中國關係的研究，終於有了轉機。返台之後，即於向外交部提出申請，獲外交部核准調閱 28 種共 39 冊檔案。

當時在外交部閱讀檔案，其實十分方便，只是有兩項措施造成困擾。一是研究者提出研究題目，卻不能先行檢索目錄，全憑外交部自行挑選，再經原歸檔單位審查，才能閱讀。二是複印之檔案也需先由承辦人員審查。經過溝通之後，外交部終於同意研究者查閱目錄，再行調閱審查；複印則採納了張淑雅小姐的建議，在每份文件上附加解密文號標籤。

我很順利查閱了外交部調出的檔案，並完成論文初稿。經過一年自行修改，在準備出版時，一位審查人指出外交部仍有若干檔案需要閱讀。經向外交部查詢，必須重新提出申請，我只得遵辦。依照審查人的提示，我一共需要閱讀 9 種共 12 冊檔案。依照 1995 年的經驗，審核 39 冊檔案不超過兩個月，如今我只調閱 12 冊，其中數冊且曾在 1995 年調閱過，審查時間應該更短。不料申請一個月後承辦人員來電詢問：為何要重閱幾種過去已看過的檔案？又為何要閱讀新檔案？承辦人員雖是奉命詢問，我卻感覺十分荒謬，立即傳真說明調閱理由。又隔一月，外交部仍無回音，此時忍無可忍，只好藉報端

發抒不滿情緒。我認為外交部之延宕主要在於原歸檔單位需要審查，而我相信該單位人員公務繁忙，且不熟悉六十年前的老案子，如何判定其可否准予閱讀？另外也怕負責，種種因素影響之下，必定會視申請案為不急之務。外交部對我的投書隨即在報上作了答復，並表示正在檢討。最後外交部完成作業，前後時間超過七十天，而我僅以一天時間讀完這12冊檔案（並未複印）。

閱完這批檔案之後，我要求再閱目錄，以免有所遺漏，承辦人員勉強同意（原本是要再備函申請）。我果然找出四種應該閱讀的檔案，不過仍得重新申請調閱，於是又開始公文往來。我另以電子郵件去函胡志強部長，表達我的急迫。此次申請又耗時四十天，我則以四個小時完成檔案之閱讀複印。

雖然我藉著兩次新調閱的檔案，補充了書稿之不足，也對審查人有了交待，但總覺這幾個月像是做了一場噩夢，令我想到研究中國外交史可能遭到的挫折，就不寒而慄。不過胡部長給我的復函，透露了改進作業流程的訊息。在稍後國史館召開「中華民國史外交志第一次編纂委員會會議」時，承與會的謝棟樑大使告知，他已「在外交部提議由資深大使負責審閱機密檔案，儘速決定解密與否，此案正積極進行。」這確是一大福音，相信此舉可以減輕原歸檔單位行政與責任負擔，也免除研究者和檔資處官員之間的無謂爭執。

在大陸的檔案館閱讀檔案，我的經驗並不多。1990年夏天我曾嘗試利用西安的陝西省檔案館進行研究，不料該館人員頗具戒心，想要知道我的「背景、動機」，後來終於同意我查閱館藏目錄，卻不准調閱。

民國史的研究仍需仰賴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稱二史館）的館藏。過去幾年此間學者前往蒐集資料頗不乏人，從他們的經驗得知，有一段時間二史館的服務態度十分良好，複印規定和收費也很合理。但是好景不常，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影響就是檔案的價值越來越商品化，不僅複印檔案收費昂貴，調閱目錄、檔案，甚至自行抄錄，均要收取費用。此間學者喫了不少苦頭，據我所知，大陸同行更是迭有怨言。該館負責人亦知外界的負面反應，但自有一套說詞，令人莫可奈何。

我就在不敢抱有太大期望的情況下，於去年夏天兩度赴二史館查閱資料。情形果然與現有的一般印象相去不遠，該館人員事先向我詳述有關規定，並希望我盡量不要複印，我因需要的資料十分明確，故而採抄錄方式。前後兩次閱讀檔案，花費約1,000元人民幣，帶回了約80張自行抄錄的資料。同時也瞭解該館的民國檔案整理工作，不如想像中那麼有條有理。

花了錢能把事情辦好，倒也無可厚非。不過在南京期間，因為二史館複

印檔案的多所限制，抄錄檔案的時間必然增加。而在二史館查閱檔案，每週工作時間僅約 25 個小時（因為週休二日，星期三開放半天，每天中午又有二個多小時的休息），比起台北一般檔案機構開放時間約 40 小時，可利用的時間更少。研究者停留時間長，所支付的住宿費用也就更為可觀。二史館收費名目繁多，令我嘆為觀止。而最不可思議的是，我曾因時間有限，於臨走前抄錄部份目錄，以備下次調閱之用，不料抄錄條目帶回台灣，也要收費，每一條目收費五角人民幣。該館人員好心解釋，抄錄之條目若存於館內，則不必付費，我當場哭笑不得。

我在台灣會對檔案機構不合理的措施提出質疑，但在大陸卻無意於此，因為我不是當地的納稅人，沒有資格要求改進。大陸的同行如果認為需要改進，應該主動提出。近年來大陸的生活水平日漸提高，終有趕上台灣的一日，然在其它方面的差距是否維持不變，甚或加大，例如檔案館的服務方式，頗值得我們注意。

近幾年來台北的檔案機構服務方式有所改進，幾位同行和自己的投書可能帶來一些刺激作用，各機構的善意回應，令我們頗感欣慰。而我個人尚有以下幾點感想：

(一) 由於「國家檔案法」尚在審議之中，每一檔案機構大可以沒有「國家檔案法」為依據，拒絕對外開放。如今部份機構願意提供學者利用檔案進行研究，值得肯定。學者的批評除了希望各機構能以更開闊的胸襟參與歷史研究工作，也有籲請各界重視此一問題的作用，間接為「檔案法」催生。

(二) 各機構應有主動發掘問題、面對問題的勇氣和具體方法，如設意見箱，或隨時詢問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留意使用者的反映。學者的要求有時也不盡合理，然而各機構仍需有所說明，以減少彼此間的誤會。

(三) 目前移轉至國史館之政府機關檔案，整理完成者，應已全數開放。至於現存史編局、外交部之檔案，部份軍事、外交文件因事涉敏感，更可能有妨國家利益，而不便借閱，對此情形，宜有機密認定之明確標準，並提出合理的說明。在此尚需提醒各機構人員，有些國內認為的機密，坊間或國外早已不當一回事，各機構如能主動瞭解，當可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四) 在此期間，輿論發揮的功效，是推動改革的主要動力。根據個人經驗，幾乎每次傳真投書至報社，當晚就有編輯來電，就敘述不明之處提出商榷，態度至為認真。甚至報社主管會在若干時日之後，來電詢問受到批評的機構有無具體的改進措施。這就是台灣近年來言論蓬勃所收到的正面效果。

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朝(1736-1795)

司法類

賴惠敏*

近年來本所圖書館新採購的清代檔案，有以下幾種：

- 1.〈清代琉球檔案史料(1742-1898 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1991），共 662 件檔案，微捲 3 捲。
- 2.〈刑部貽穀案(1908-1911 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1991），共 58 件檔案，微捲 3 捲。
- 3.〈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朝(1736-1795)司法類〉（四川：四川省檔案館發行，1993），微捲 21 捲。
- 4.〈清代中琉關係檔案史料（1654-1890）〉（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1994），共 315 件檔案，微捲 5 捲。
- 5.〈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戶科貨幣類(1732-1898 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1997），共 2,000 件檔案，微捲 21 捲。
- 6.〈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刑科婚姻類(1732-1762 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1999），微捲 25 捲。

四川巴縣、直隸順天府、台灣淡新檔案是現存清代數量最多的地方檔案。清代巴縣檔案將近 113,000 卷，自乾隆十七年(1752)至宣統三年(1911)，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史料，內容相當豐富。巴縣位於四川盆地東南，為重慶府屬轄內，因交通便利、地形險要，工商業發達，故文書檔案所涉及的範圍也較為廣泛。巴縣縣署設有吏、戶、禮、兵、刑、工、鹽、倉、承發九房，各房各有專司。根據《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檔案概述》記載，司法類的檔案數量最多，約佔全部檔案的十分之九。有司法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例、章程，還有命案、兇毆等案件的訴訟狀紙、簽票、堂訊記錄、判詞與結狀。

四川檔案館發行之巴縣檔案司法類，案卷號自 260-4060 號，在第一捲微捲有目錄，卻自 31 頁開始，闕漏部分可能是律例、章程兩項。其餘內容包括以下的分類：

- 1.命案(414 件)：有因鬥毆身死、自殺、無名屍體、落水淹死、罪犯病故身亡等情案件。
- 2.地權(293 件)：有關土地界址、霸佔田地、砍伐樹木、捐贖田土、買賣糾紛、水利灌溉等的糾紛案件。
- 3.房屋(68 件)：即侵佔房屋、失火、欠房租之案件。
- 4.借貸(79 件)：主要是借錢不還的案件。
- 5.欺詐(458 件)：誣告、詐騙銀兩、行使假銀等案情。
- 6.家庭(74 件)：父母控訴子孫不孝、不聽管訓、在外遊蕩、不務正業、吵著分家等問題。
- 7.婦女(222 件)：有拐逃、賣良為娼、奸情、逼婚、騙婚、離婚等案件。
- 8.商貿(79 件)：買賣欠債、賒騙、訛詐錢銀、合夥帳目不清等案件。
- 9.兇毆(360 件)：即鬥毆，毆傷不致死者的案件。
- 10.盜竊(624 件)：偷竊案件，尤其以偷竊牛隻情形最多。
- 11.租佃(37 件)：係指增租奪佃、退佃騙押銀、佃戶欠租、霸田不搬遷等案件。
- 12.賭博(54 件)：拿獲聚賭等案件。
- 13.煙土(3 件)：騙煙及盜賣煙葉、里甲煙冊、戶籍門牌冊。
- 14.水運(9 件)：覆舟、打撈沈船、腳夫運貨工資糾紛。
- 15.宗教(5 件)：天主教傳教、邪教誘民、寺院債務等。
- 16.契約(8 件)：買賣合同、買賣房地契等。
- 17.移解人犯(434 件)：巴縣與其他州縣的移解人犯檔案。
- 18.其他(607 件)：通緝逃犯、繳報結狀案、囚糧清冊、鬥毆兇傷、里甲排解糾紛結案、鄉鄰具結狀、流犯名冊、在監犯人名冊、秋審人犯名冊、押解人犯發給解票等等。

以上只就檔案標題做簡短說明，因為每一件檔案都包涵許多繁瑣的行

政公文。譬如，乾隆二十四年向添瑞戳傷小功堂弟向琦身死案，事因向添瑞與堂弟討取田價，兩相爭角，向添瑞用刀格戮向琦受傷身亡。此案由巴縣衙門一審，勘驗屍傷現場。縣官將初審做出建議性的處理意見，再往上報府、省，由省級專門處理司法案件的按察使受理後，直到督撫，由督撫向皇帝具題。各省督撫具題的案件，經內閣票擬，進呈皇帝。各省督撫上呈題本的副本揭帖咨送刑部，刑部草擬三法司核擬的題本，擬定係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祀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批准，死刑的判決才正式生效。向添瑞依照清律被判絞監候，因緩決四次，奉旨減刑為杖一百流三千里，發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等，並追繳埋葬銀二十兩。向添瑞繳銀十兩後，無力再繳其餘銀兩，他供稱已經將田業賣盡，無產業可賣。巴縣縣令傳喚保長、族鄰等公同具結證明向添瑞「並無產業可變，實係無力全繳」。其次，巴縣縣令造冊移會江西省永豐縣有關向添瑞年貌箕斗籍貫冊各七本清單「年四十八歲，身長面紫，有鬚，右面上大小黑痣五點。左手大、三、四、五指俱斗，二指箕。左手大、四指俱斗，二、三只俱箕五指不成箕斗。」三十三年向添瑞逃走，兵役嚴緝在案，見有人行走慌忙，經盤查比對年貌箕斗相符，帶回縣衙。此事永豐縣亦具文移會巴縣，巴縣亦將向添瑞年貌箕斗籍貫冊送給附近州縣，以協助緝拿。此外，又令向添瑞的里鄰李文選等三人出具甘結，以示向添瑞並未逃回。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清宮叢藏的檔案都字跡工整，而巴縣檔案中除了正式的公文之外，還包括草擬過程的公文書，可見刑房衙役撰寫公文之慎重。再者，向添瑞依照清律被判絞監候，奉旨減刑為杖流及流放江西，這種資料在朝廷的中央檔案如〈內閣漢文題本：刑科類〉是看不到的。還有像巴縣造罪犯的年貌箕斗籍貫冊，如此辦案細節的描述也只在地方檔案才看得到。我閱讀〈內閣漢文題本：刑科類〉的檔案時，發現衙役和鄉保捉拿逃犯的本領頗為驚人，還不知道原來他們有一套科學的手紋辨識法。不過，就黃宗智教授的研究，地方衙門常處理百姓的細故糾紛，如喝茶不給錢、買豬肉賒帳不給，地方官員也不勝其煩，故許多民事訴訟案件都發回鄉鄰、中證、親朋調解。黃教授在《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一書中有詳盡討論。我聽說黃教授的夫人 Bernhardt Kathryn 教授最近出版 *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Standford :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的論著可能也參考巴縣檔案。

近年來許多研究生，親自前往大陸查閱檔案，其精神令人十分敬佩。不過，現在大陸的都市物價相當高，尤其住宿方面每天至少人民幣上百元，加上車資、飯錢等等所費不貲。在檔案館雖然提調檔案比台北故宮便利、件數多，但往往抄不勝抄，而複印費又特別貴，每張收費自人民幣三元到十元不等。一般檔案館規定，檔案已拍成微捲，就不能提原件，若千里迢迢到那裡看微捲，尤其最後發現是已發行的微捲，那真令人氣結。所以建議學者去大陸蒐集資料前，先參考台北故宮、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或近史所圖書館之相關檔案，蒐集了一定數量的檔案後，再去大陸找補充的材料，這樣才省時省力。若是不熟悉檔案狀況而貿然前往大陸，只是徒然浪費時間和金錢。

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3)

張 力著 351 頁 精裝 300 元 平裝 250 元

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的國際組織，以促進國際交流、排解國際紛爭、維持世界和平為主要目標。中國不僅是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也於其存在期間，積極參與多項活動。本書運用大量原始檔案，從國際合作角度出發，對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四〇年代中國與國際聯盟進行政治議題之外的互動，作一深入考察。全書分就文化合作、醫療衛生合作、技術合作、禁毒問題、勞工問題等五個方面，探討國際聯盟給予中國的援助，以及中國對國際聯盟政策的回應。此種互動關係對中國之追求現代化與提升國際地位，均有深遠的影響，也是國際史上值得重視的一頁。

王世杰個人檔案整理概述

巫金燕*

一、王世杰先生簡介

王世杰，號雪艇，湖北省崇陽縣人，生於民國前二十一年（1891）三月十日，卒於民國七十年四月廿一日，享年九十一歲。王雪艇先生一生忠勤為國，民國十六年曾任法制局局長，草擬及修訂各種公私法規，民國十八年又奉命擴大武昌大學為武漢大學，民國二十五年任教育部長，民國二十六年行政院改組，辭去教育部長改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抗戰八年期間，除始終負責參政會及參事室兩重要任務外，並曾兩度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前後四年，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書記長達七年，兼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一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受任為外交部長，奉命赴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憲法頒行，憲政政府成立後，辭去外交部長之職。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後，三十九年任總統府秘書長，五十一年四月，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兼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簡稱長科會）主任委員，五十七年辭去兼職，專任研究院院長，迄五十九年四月辭院長職，並受聘為總統府資政。王雪艇先生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重要措施有：(1)增設物理及經濟兩研究所。(2)聘請旅外學人利用暑期回國講學，予國內教員及研究員以進修機會，對提升中、大學校師資極有助益。(3)與各公立大學合作成立數學、物理、化學、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向國內外籌措經費，充實設備，並聘請國外學人輪流回國講學，或派優秀人才出國進修再回國服務，成效卓著。(4)組成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及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聯席會，期間舉辦多次針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大型會議，並設立美國研究中心、促成臺大經濟學研究所博士班之成立，促進中美文化學術交流，對國內科技學術之提升、人才之培育及中美之交誼，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

貢獻良多。

此外，王雪艇先生在抗戰前即已出任故宮博物院理事，且又兼為中央博物院理事長，來臺後，先後出任兩院共同理事會常務理事及兩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他有鑑於故宮古物僅以妥善貯存為要務，不足以表達古藝術文物之精美內涵，爰有精印古畫之議，遂組成「特別出版小組」，並任常務委員，籌印故宮書畫錄、故宮名畫三百種、藝苑遺珍、故宮法書等多種出版品，其後又籌劃古物赴美展覽，對國內藝術水準之提高及增進友邦人士對我國藝術之了解，收效宏大。王雪艇先生又慷慨捐贈私人珍藏之名畫墨寶，對私人捐贈之風氣，具倡導之影響。

雪艇先生平身之論著，計有比較憲法、中國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中國奴婢制度諸書，及其他散見於各刊物之文章。

二、檔案移交過程

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王世杰院長二女公子秋華教授來院拜會錢思亮院長，本所陶英惠先生受命送王秋華教授回台北，途中勸王女士將王世杰院長檔案送交近史所整理、保管，王女士欣然同意，囑逕與乃弟紀五先生聯絡，並謂國史館對王院長之日記深感興趣，曾多次接洽，未允。陶英惠先生即請呂實強所長與王紀五先生聯絡，並請總務主任趙保軒先生從旁協助促成。趙主任為武漢大學畢業，原為台大教官，王院長請他來當總務主任，所以趙主任與王家上下都頗熟悉。而在趙主任之熱心幫忙下，民國七十二年送來第一批檔案，民國七十四年又送來第二批，先後均編成目錄。趙主任除幫忙促成外，亦將其所保存之王世杰院長檔案陸續整理送來。王世杰院長百年誕辰前，張玉法所長告訴陶英惠先生希望出版王世杰日記，並徵得王秋華女士、王紀五先生之同意，在近史所張力先生幫忙下，短時間影印原日記出版了王世杰日記，趕上百年誕辰紀念。王世杰日記一套十本，始自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止於民國六十八年九月，歷時四十七年。由於王世杰日記出版後，王家頗為滿意，因此之後王秋華教授一找到與本院有關之資料，便會請陶英惠先生送交近史所。在王家移交之檔案中，亦包含日記，但因日記已出版，故不包含在此次整理範圍內。

三、檔案整理過程

由於王世杰個人檔案是分批送來，且每批檔案皆有目錄，先前近史所院史室又已稍加整理，並將目錄印製成冊，因此在接手整理這批檔案之前，已有目錄可供參考。原目錄是依送來順序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含日記、聘書、函稿、收發文簿、信札、照片、實物、著作、演講、雜著、雜檔等。第二部分則包含日記、聘書、信函、著作、雜著、演講、談話、剪報、照片、雜檔、雜件等。第三部分則有信函、祭文、他人文章、資料等，第四部分則只有信函。原檔案也根據原目錄之順序、分類存放於函套中。

為了便於整理檔案及了解檔案起見，首先做的工作是清查，清查之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原目錄之正確性及檔案之性質，並補上缺漏的目錄，註明缺漏的檔案，並核對內容、時間之正確與否。完成清查工作之後，接著就是做破損檔案的修補工作，並將每一份檔案以迴紋針固定，以利分類整理。

在經過初步整理後，發現原檔案之分類頗為雜亂，且各部分檔案性質多有重覆，因此有加以整合之必要。在王世杰檔案中最大宗（約佔三分之二）的是函件，又分為九冊的回函稿件與其他零散的函件，由於前一部分是成冊且依時間順序依次排列，因此這一部分只須鍵入目錄而無須再整理，後一部分因為零亂且分散為四個部分，於是決定將四部分打散，依時間順序重新排列，時間大約起自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迄於民國七十年，連同成冊之回函稿件，共 26 函計 2,225 件。

處理完信函後，剩餘三分之一的檔案，根據檔案之性質，決定將檔案中有關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2函，236 件）、故宮博物院（1函，28 件）、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函，27 件）、中研院院務（1函，44 件）等較具專題性之檔案分別集結成冊。其他則依檔案性質並參考原分類整理如下：王世杰個人著作（1函，29 件）、王世杰演講及談話（1函，34 件）、聘書（2函，67 件）、祝壽文、祭文及紀念文（1函，81 件）、他人著作（3函，62 件）、剪報（1函，59 件）及雜項（2函，87 件）等，連同信函總計共 42 函 2983 件。

四、檔案之內容介紹

由上述介紹可知，王世杰個人檔案以函件為最大宗，而函件之內容也最為複雜，除各式各樣之邀請函、致謝函、求職求助函、贈書贈物函等酬應函件外，其他尚有任職總統府秘書長時期之部分函件，以及各界人士對

中研院之各項建議函、故宮出版物、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中美合作交流……等等本應屬於專卷性質之函件，但因形式上屬信函性質，且不盡專談某事，故仍將之併入函件中。由於函件之內容較為零散，因此目錄盡量製作詳細，使檔案之利用更為方便。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專卷共 2 函，對於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之成立經過與運作、中美科技之合作、暑期研討會之舉辦、美國研究中心之設立等皆有豐富之資料；此外關於台灣經濟發展會議、台灣人力資源委員會議等大型會議之籌備資料、會議資料，及王世杰赴美參加中美科學合作聯席會等資料，亦頗豐富，可做為學者研究之參考。至於故宮專卷，有故宮博物院各項條例、會議紀錄、特別出版小組等資料以及出版合約等，資料並不多。長科會方面則有王世杰發表對長科會之談話、演講，與長科會之各項工作報告、計畫、組織條例、會議紀錄及剪報等，另尚有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之資料，這些資料雖不多，但頗具參考價值。至於院務方面資料多為會議紀錄、院士、評議員之選舉以及各項經費收支等，較為瑣碎零散。

其他如王世杰個人著作、演講、談話及他人著作、祝壽文、祭文與紀念文、剪報、雜項等，則內容包羅萬象。王世杰個人著作卷是一些散見於各刊物之作品。演講與談話卷則是王世杰先生在受邀於各場合演講之稿件及接受採訪之稿件。祝壽文、祭文與紀念文卷則是王世杰先生九秩大壽、逝世及百年冥辰時各界所撰寫之文章，這些文章多刊登於「湖北文獻」及「珈珞」（為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編輯出版之刊物）兩期刊上。他人著作卷則是各界人士寄贈王世杰先生之書籍與稿件，王世杰先生對於這些寄贈物之處理，書籍多半是送各所圖書館，而未送圖書館之圖書則與一些自函件中抽出的稿件合放於他人著作卷中。剪報，則包含各項相關之剪報資料，雜項則是一些無法分類之資料。值得一提的是王世杰聘書卷，起於王世杰先生民國十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之聘書，止於民國六十七年故宮管理委員會第七屆委員聘書，完整保存了王世杰一生所歷任之各項公職及名譽理事職銜，對王世杰先生個人經歷之研究頗有助益。

五、結語

王世杰先生以學者身分出任政府多項要職，無論在法制、教育、黨政

各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尤其是民國五十一年接替朱家驥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期，致力加強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對於促進中華民國的科技發展居功厥偉。而近史所所藏之王世杰個人檔案在這一方面的資料亦最為豐富，可提供學者做研究之用。王世杰檔案在整理期間，即已開放供學者使用，現重新編目後，可透過電腦查詢目錄，將更方便學者利用。令人覺得可惜的是，王世杰先生個人檔案多集中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任期內之各項資料，其餘之檔案則或僅數件或付之闕如，若將來能與其他各時期之檔案加以合併，那麼對研究王世杰個人必有更大的幫助。

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 第一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2)

呂芳上等著 435 頁 平裝 400 元 1999 年 6 月出版

民國三十八年，戡亂戰局逆轉，政府撤退來台，基於安定政局考量實施戒嚴。戒嚴期間(1949-1987)，尤其是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初期，為全面肅清反對勢力，曾賦予情治機關更大權力，可逕行逮捕左翼反對者與相關人士。他們或遭拘押或被判刑，此即一般所謂國民黨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本書訪問當時主要發生於台灣北部之案件的一百餘位受刑人、二十幾位家屬及十二位見證人。全書計九十五篇訪問紀錄，共六十餘萬字，分為三輯。第一輯三十一篇，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的台北市等十四個工作委員會及支部案。第二輯三十二篇，是省工委會所屬的學委會等十二個案。第三輯三十二篇，是外圍組織、台獨、吳聲達、蘇藝林、國防醫學院、四六事件及其他不相統屬的十四個個案。書中除訪談紀錄、圖片、書信外，並佐以當時《中央日報》、《華報》、《新生報》等報導。同時根據判決書及相關資料簡介各案，俾官方說法與受訪者自白並互對照。此外，卷首附有各獄所位置圖，有助讀者了解當時的場景。



史料介紹

新發現的一篇陳熾重要遺稿

孔祥吉^{*}・潘光哲^{**}

在繁星璀璨的晚清思想家銀河裡，陳熾占有一席十分重要的地位。陳熾（1855～1900），字次亮，號瑤林館主，光緒八（1882）年中舉，光緒十二（1886）年考取軍機章京，後又任職戶部，閱歷豐富，思惟敏捷。尤其在中日甲午之役後，陳熾痛感國恥，「懷憤含羞，痛哭呼天」，寫了許多慷慨激昂的文字，提出許多至關重要的建議，因是，不論探究晚清的維新議論，亦或討論晚清的「議院論」，陳熾的意見，都是史家探討的對象¹。然以資料缺乏，大都只能利用陳熾的《庸書》²為論述之資。亦因如此，除

*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 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

1 如以下諸作，都涉及對陳熾「議院論」的討論：小野川秀美、林明德、黃福慶（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65-74；王爾敏，〈晚清士大夫對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收入：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新版〕），頁243；呂實強，〈甲午戰前西方民主政制的傳入與國人的反應〉，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8編《近代思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306-309；孫會文，〈晚清前期「變法」論者對西方議會制度的態度和「君主立憲」主張的形成〉，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2編《戊戌變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140-141；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183-187；薛化元、潘光哲，〈晚清的「議院論」——與傳統思維相關為中心的討論（1861-1900）〉，《國際學術雜志中國史學》第7卷（東京：1997），頁117-149。

2 陳熾，《庸書》（光緒戊戌〔廿四〕年順記書莊印，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1970），又收入：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146；據《陳熾集》編者考證，《庸書》當作於1893-1894年間，初刊於1896年（《陳熾集》，頁1）。

若干傳記資料³和研析晚清維新議論的通論作品外，關於陳繼的專題探討，並不多見⁴。目前，整理收錄陳繼著述頗稱完備的《陳繼集》⁵已告出版，相信必有助益對他的探討。

不過，觀乎現刊《陳繼集》所附的〈陳繼著述佚篇目錄〉⁶，可以想見，在浩瀚的史料叢海中，依然有著繼續挖掘陳繼著述的可能性。最近，孔祥吉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的〈章京陳繼為中倭苟且行成，後憂方大，敬陳管見呈〉（原件載《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光緒廿一年卷；以下簡稱〈敬陳管見呈〉），就是一個例證。這一篇〈敬陳管見呈〉，孔祥吉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搜尋未著⁷，於今得見其全貌，公諸學界，當能亦有助於對陳繼思想的探索。經過比對，〈敬陳管見呈〉的部分內容，早被易名為〈上善後事宜疏〉（字辭亦略有不同），收入陳忠倚編輯的《皇朝經世文三編》，《陳繼集》的編者據之輯錄⁸，使後人得以窺其一斑。然則，〈敬陳管見呈〉提出的改革意見，涉及廣泛，它的完整呈現，正提醒史學工作者應當「上窮碧落下黃泉」，多方親近、搜尋原始資料的重要性⁹。

³ 例如：趙柏巖，〈陳農部傳〉，《柏巖文存》（出版時地不詳，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3，頁24A-25A；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2版〕），頁155-164（但是，湯志鈞誤書陳繼的生卒年）。

⁴ 筆者目前獲悉的專題論作，僅有一篇：馮桑林，〈陳繼的維新思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未見。

⁵ 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繼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全書正文372頁，收錄陳繼的《庸書》及《續富國策》兩部專書，另收錄其譯著、文錄、條陳及書信等文獻，並有陳繼為他人代草的作品與相關傳記等附錄。

⁶ 《陳繼集》，頁399-400。

⁷ 孔祥吉，〈〈上清帝第三書〉進呈本的發現及意義〉，收入：氏著，《戊戌維新運動新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7。

⁸ 陳繼，〈上善後事宜疏〉，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光緒廿四〔1898〕年三月自序，台北：國風出版社〔景印〕，出版年缺），卷24，頁1A-2A（總頁487-489）；《陳繼集》，頁306-309。

⁹ 《陳繼集》編者考證〈上善後事宜疏〉撰述於1895年11月或12月，是以，趙樹貴〈陳繼年譜簡編〉云，1895年年底，陳繼「有〈上善後事宜疏〉，提出目前當急辦者四條，供當事者參考」（《陳繼集》，頁393），顯然即是錯誤的論斷；又，《陳繼集》編者在〈鑄銀條陳〉（《陳繼集》，頁341-345）一文的編註中云：「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隨手檔光卷目，內有“五月初六日章京陳繼城一件條陳”。就目前所知，陳繼除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

陳熾的〈敬陳管見呈〉是在光緒廿一年五月六日（1895年5月29日）遞上的。透過翁同龢的推薦，陳熾的代表作：《庸書》早有得到清德宗「御覽」的機會¹⁰；〈敬陳管見呈〉的寫作，或許也曾徵求過翁同龢的意見¹¹。然則，不考慮翁同龢是否可能對陳熾上遞〈敬陳管見呈〉有所影響，它卻充份顯示維新派成員面對中國處於中日甲午之役慘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後的危局裡，殷切期盼改革的心理。其中提出的意見，不但增添我們分析陳熾個人思想的依據素材；若干論點，從當時的歷史條件評量，更具有深刻的意義。

陳熾的〈敬陳管見呈〉上遞後，聯同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¹²和約略同一時段遞上的其他7件條陳摺片（如胡燏棻於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七日呈上的〈變法自強疏〉）¹³，都得到清德宗的青睞，激發他改革圖強的決心，終於在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廿七日（1895年7月19日）下諭表示要「蠲

二十九日上呈〈茶務條陳〉外，僅此一篇〈鑄銀條陳〉」，故認為〈鑄銀條陳〉一文「疑為1895年5月29日以前所撰」的考證（《陳熾集》，頁341），以及《陳熾年譜簡編》關於光緒廿一年五月六日的記事，也都需要修正。

¹⁰ 《翁同龢日記》，「光緒廿一年三月廿三日」：「以陳熾《庸書》、湯震《危言》進呈御覽。」（見：趙中孚〔主編〕，《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第4冊，頁1949）。

¹¹ 《翁同龢日記》，「光緒廿一年四月十八日」：「陳次亮以封事送看，八條皆善後當辦者，文亦雄。」（見：趙中孚〔主編〕，《翁同龢日記排印本》，第4冊，頁1954）；雖然，我們不能確定翁同龢所見此一「封事」是否就是〈敬陳管見呈〉，但揣度雙方交誼（《陳熾年譜簡編》屢見彼此往還記錄，不詳舉），似有此可能；又，〈陳熾著述佚篇目錄〉亦將翁同龢所見此一「封事」列入（《陳熾集》，頁400）。

¹² 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原名〈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富國教民，教士治兵，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摺〉，光緒廿一年五月六日（1895年5月29日）在督察院遞之，十一日（6月3日）督察院上呈（見：孔祥吉，〈〈上清帝第三書〉進呈本的發現及意義〉，頁42-43）。

¹³ 據孔祥吉考訂，這9件條陳摺片包括：陳熾的〈敬陳管見呈〉、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胡燏棻的〈變法自強疏〉（或名〈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摺〉，係鍾天緯代擬，上呈時間為光緒廿一年五月十七日）、張百熙的〈急圖自強，敬陳管見摺〉、信恪的〈請開辦礦務摺〉（上呈時間均為光緒廿一年閏五月七日）、准良的〈富強之策，鐵路為先，請飭廷臣會議舉辦摺〉（上呈時間為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其餘3件摺片則可能為徐桐所遞（上呈時間均為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九日），見：孔祥吉，〈〈上清帝第三書〉進呈本的發現及意義〉，頁46-47。

除痼習、力行實政」，並將這 9 件條陳摺片發給各省將軍督撫閱看，要求「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畫，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覆奏」¹⁴。雖然，清德宗的這道上諭，明顯的以胡燏棻〈變法自強疏〉為藍本¹⁵；惟則，陳繼這一篇〈敬陳管見呈〉的意見，不僅「上達天聽」，也得以廣佈於地方大員之耳目；亦且，這 9 件條陳摺片，更確曾得到中央和地方官員的各種迴響¹⁶。

整體言之，如果我們將陳繼的這一篇〈敬陳管見呈〉，或是就他個人的思想脈絡進行研討，或是將之和同一時段遞上並得到清德宗青睞的其他 8 件條陳摺片（特別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進行對比，必然可以得到一些新鮮的認識。希望它的刊佈，能夠對這些方面的研討，有所助益¹⁷。

¹⁴ 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廿七日上諭：「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隱患。朕宵旰優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痼習、力行實政為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批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皆應及時舉辦。至整頓釐金、嚴覈關稅、稽查荒田、汰除冗員各節，但能破除情面，實力講求，必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畫，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覆奏。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致畏難苟安，空言塞責。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轉引自：孔祥吉，〈〈上清帝第三書〉進呈本的發現及意義〉，頁45；又，此一上諭亦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369，頁23；《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廿一年閏五月丁卯〔廿七〕條；與孔祥吉所引「上諭檔」，各均有個別字辭差異，不詳覈校）。

¹⁵ 胡燏棻於光緒廿一年閏五月十七日呈上的〈變法自強疏〉（本文所引版本為：中國史學會〔主編〕，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料資料叢刊之8）》〔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第2冊，頁277-290）主張「開鐵路以利轉輸」、「籌〔鑄〕鈔幣銀幣以裕財源」、「開民廠以造機器」、「開礦產以資利用」、「折南漕以省經費」、「減兵額以歸實際」、「創郵政以刪驛遞」、「創練陸兵以資控馭」、「重整海軍以圖恢復」、「設立學堂以儲人材」，與清德宗的上諭內容對比，不單字辭大致相同，連各項主張的次序亦復一致；況且，康有為說，「群臣上書中，凡存九摺，以胡燏棻為第一」（見：《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樓字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8），因此，論斷清德宗的這道上諭所要求的內容，可能以胡燏棻的〈變法自強疏〉為藍本，應不為過。

¹⁶ 相關情況的論述，參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頁103-108。

¹⁷ 又，陳繼在這篇〈敬陳管見呈〉中說：「當法、越事定，曾上東三省練兵之議，雖仰蒙采

在整理方面，由於陳熾的這一篇〈敬陳管見呈〉原係謄錄件，並未分段，亦略有錯訛。所以我們進行了分段、標點的工作；原件的錯字，以〔 〕號標明，佚文增補以【 】號標明，原稿語意不清的地方則添加【？】符號，均加在正文內；原件的敬稱，原空一字或抬頭者，一律空一字；謙稱均採上標、小一號字；至於本文與《皇朝經世文三編》和《陳熾集》收入的〈上善後事宜疏〉，有所出入處，不再一一覈校。

章京陳熾爲中倭苟且行成，後憂方大，敬陳管見呈

軍機章京戶部員外郎陳熾謹 呈：

爲中倭苟且行成，後憂方大，請一意振作，變法自強，以鞏 皇圖而湔 國恥，敬陳管見，仰懇據情代 奏事。

竊自中倭構衄以來，內外臣工，倉皇電摺，始也欺敵而敗，繼乃聽客所爲，忽戰忽和，舉棋不定。募兵則驅羊飼虎；籌餉則剜肉補創。倚淮軍，而淮軍潰；倚湘軍，而湘軍又潰。遂至喪師失地，臺破船沈，威旅之天險既夷，渤海之堂奧盡失。財殫力屈，三次求和，終至賠費萬萬金，割地數千里，駐兵勒索，開埠通商。以倭奴蕞爾小邦，遂能力制中朝。受此瓦古未有之奇辱，使我中國之人，自上達下，稍有人心者，無不摧心失志，懷憤含羞，痛哭呼天，不能自己。今之論者，或集矢於北洋，或歸咎於政府，或責備於主兵任事諸臣，固也，而不盡然也。蓋此次之錯誤，在未戰之先；而此中之關係，在既和之後也。

道光、咸豐以前，無論已；自庚申以還，知泰西各邦之國富兵強，未易爲敵矣，於是開譯署、設洋關、籌海防、遣公使。言戰守者，以槍砲台船爲事；講應付者，以語言文字爲長。而於西人政教之本原，富強之實效，

納，而額數過少，不足以建威銷萌。然去歲亦賴有此軍，故遼瀋雖淪，而「陪京無恙」，其所謂「法、越事定」，未知係指1885年6月9日中法《越南條款》之簽訂，或1886年4月25日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之簽訂，甚或1887年6月26日中法《續議商務專條》之簽訂（參見：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1840-191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191-195），是以，暫難確定其所上「東三省練兵之議」的時間，此件亦未列諸〈陳熾著述佚篇目錄〉，顯均有待繼續考查尋訪。

慨乎其未之有及也。當事者，狃於西人之意在通商，而不思得地也，又時存一用夏變夷之見，而惟恐或變於夷也。以爲我苟如是，是亦足矣。其弊遂至於有器而無人，有名而無實。雖有利砲堅台，魚雷鐵甲，委而去之，反爲敵用。糜億兆金之巨款，擲數十載之光陰，而鑄此中外絕無僅有之大錯，掩飾詆欺之咎，不能爲李鴻章寬也。法越之役，法酋恥〔孤〕拔斃於閩海，繼之者，情形不熟，未及進攻，北洋遽以爲北洋海防大有可恃。十年之內，遷延遲重，因循苟且，不復留意人才，有縱言時事者，中外怫然，以爲大戒。積薪厝火，忽焉若忘，成此疲敝尪羸之世界。寢〔寢〕至良臣殂謝，宿將凋零，強敵生心，伏戎在莽，而環顧內外，竟無一深明大略，緩急可恃之人。一旦外患乘之，謀非素定，士非素習，驕兵貪將，相率逃亡；從而招募市人，羅掘商款，賞罪錯亂，操縱失宜，處處讓人，著著落後。以此言戰，能乎？不能。既不能戰，則惟有償金割地，以求和耳。蓋數十年國家之倚北洋也太重，北洋之忘戰負國也太深，一局殘棋，勢成孤注，此注既擲，雖欲背城借一，而有所不能。所謂錯誤在未戰之先者，此也。

近今五十載，西人講求武備，爭奇競巧，幾於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輪舟、鐵路、電報、火器四事，孰爲之？天爲之也。環地球九萬里，人力必有所窮，非此不足以混一萬邦，縱橫四海也。而通商五十年，翦我藩屏，尙不敢窺我堂奧者，蕩平粵、捻之聲威，有以隱戢其驕氣，以爲中國水師雖怯，而陸兵尙強，涉遠勞師，恐所得不償所失耳，而不意輕舉妄動，遠交近攻，窺我之隱微，而導彼之先路者，有一倭奴在也。今我所恃者淮軍，而淮軍如此；所恃者湘軍，而湘軍又如此。此後中國雖大，人民雖衆，水陸萬里，備多力分，何所恃而能有以自立？彼東、西兩洋，五、六強國，耽耽虎視，又何疑何畏，而不相率瓜分？言念及茲，寒心酸鼻。

聞此次倭奴亦有主戰、主和兩儔。主戰者，外部陸奧宗光爲之首；主和者，內閣伊藤〔藤〕博文爲之冠。李鴻章既抵馬關，陸奧仍持戰議，謂倭兵必須逕抵北京，乃可使中國君民心服口服，永無翻悔。伊藤〔藤〕且不然，此次倭兵所以處處得手者，由中國總軍旅諸大員，皆年老庸懦無能之輩耳。兵抵北京，則此輩非死即逃，否則撤換，另易一班力強年富、熟悉時務者爲政，轉恐狡猾難制，不能爲所欲爲，不如姑留此輩，將就成和，

則中國數十年間，斷無報復之望。

哀哉！堂堂中國，受制小夷，輕侮欺凌，至於此極。此後如尚不發憤爲雄，求賢自輔，將永在倭奴掌握中耳。誰非人子，誰非人臣，稍有天良，能無切齒？所謂關係在既和之後者，此也。

雖然，天下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盛之極者，衰之機也；剝之復者，終之始也。謹惟我 聖祖 列宗，二百餘年深仁厚澤，人心未泯，天眷方隆。當日之能平內亂者以此，今日之不畏外患者亦以此。經此一番折辱，則數十載固執迂拘之論，既一掃而空，即三十年敷衍粉飾之非，亦不攻自破。此後我 皇上奮於上，眾庶怒於下，群僚百執事，洗心滌慮，堅忍憤發於中。欲振作，必須自強；欲自強，必須變法。以籌國用、羅人才爲始事，以練民兵、開議院爲成功。運以精心，持以定力，期以二十年，而不報倭奴今日之仇，出泰西各國之上，臣不信也。

蓋中國之所難者，在民氣太弱，積弊太深，改弦更張太晚。而中國之所易者，在地大物博，事權歸一，則舉而措之裕如耳。徵臣侍直樞垣，十年以來，傷心蒿目，常慨盈廷聚訟。主守舊者，鄙夷西法；主維新者，厭薄中朝。欲折衷二說之間，求一救時之要策。當法、越事定，曾上東三省練兵之議，雖仰蒙 采納，而額數過少，不足以建威銷萌。然去歲亦賴有此軍，故遼瀋雖淪，而 陪京無恙。使果有三萬精兵，領以宿將，則建瓴之勢，足以救援高麗而有餘。善奕者有閒〔間〕閒布子，入一著而全局皆靈者，此之謂也。刻下和議已成，無容返〔反〕悔。我 皇上天錫勇智，值此時艱，中國廢興存亡之機，決於今日，惟望 乾綱獨攬，力排眾議，一意自強，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鞏 皇圖，而湔國恥。詘於此者申於彼，否於始者泰於終，知幾其神，殷憂啓聖，我 列祖 列宗在天下之靈，實式憑之矣。不揣冒昧，謹條上今日之所急者，次其先後，厘爲七條。中有未盡者，復分細目。涓流土壤，得補 高深，惟不敢以巧言虛辭，熒惑視聽。管蠡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采擇施行，天下幸甚。

（一）下詔求言

夷狄之患，自古恆有。然木必先腐而後蟲生，罕有堂堂中國，匕鬯無驚，而受制於蕞爾小邦如今日者。中國之屈辱，可謂深矣。夫親上死長之心，亦斯民之天性也。唐之德宗，猜忌之主也。及朱泚之亂，播遷奉天，

用陸贊之言，貶己自責。山東各軍，聞者漚涕，不旋踵而亂賊遂平。況我皇上仁聖聰明，天下臣民，咸思效死，苟略仿其意，以鼓舞斯民，決計變法自強，與天下更始，則民心愈固，民氣愈強。視聽既專，趨向自一，雖有強敵，其奈我何？此宜先固民心者一也。

天地生才，本足敷國家之用。所患者，堂廉隔之，科目拘之。才思效用，而上故抑之；上思用才，而下又去之。及至有事之時，需才孔亟，而非相知有素，則浮薄干進者，得售其欺。即其人果係真才，而來自田間，素無威望，事故驟屬，其不至僨事者幾希。故人才者，必留意於平時，而後可濟用於臨事者也。至於求才之法，仍不外虞廷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二者而已。粵、撫之亂，楚才輩出，用之不窮，豈當日之人才多，而今日之人才少哉？因駱震〔秉〕章、胡林翼，在湖北、湖南，分立儲才館，獻策之人，來者不拒，其切實可採者，款留館中，何處缺人，即行派往。既已著立功效，即量其才之大小，授以任之輕重。故一時人才，風發飄舉，督撫提鎮，功業爛然，皆當日館中之食客也。彼僅守一隅，而猶能如是，而況天下之大，萬民之眾？世亦患無伯樂耳，豈患無千里之馬乎？惟都中各署，拘守成規，可以安常，不能應變。去年中倭事起，設立督辦軍務處，以一事權，應請旨擴充規模，選立參佐，仿儲才館之例，於京師擇地建屋，以處賢才。明諭中外官民，如有所見，均准取具同鄉官印結，至署呈遞。言無可采，批示遣歸；如果切實，可見施行，傳見考驗，即留署中，優給薪水。何路需才，奏准發往，著立功績，再予保升。此宜先求人才者二也。

西人之言曰：天下萬國，最貪者，中國之官；最壞者，日本之民；而各官廉俸，亦無如中國之少者，陽斬之而陰縱之，豈國家設官為民之本意哉？宜請旨飭下各部會議，將冗員裁汰，而實缺廉俸，按品增加。雖九品微員，每歲事畜之資，非五百金不能自給。層累而上，一品，必須萬金；外任需用較多，須加一倍。自此以後，將一切陋規雜費，概行裁革，還之民間。有違制收受者，殺無赦。國家所費，每歲祇多數百萬金，而上勵僚屬之廉隅，下培閭閻之元氣，外免鄰國之譏彈，一舉而三善皆備。此宜先清吏治者三也。

惟資格所拘，良難驟破，請於三年之內，大開言路，慎選真才，均儲

之督辦軍務處。一面請飭下部院督撫各大臣，先將候補人員，認真考察，庸惡陋劣者去之，其無所短長者，均資令回籍候選。然後考察實任各員，必須夙著廉能，留心教養，上補國是，下益民生，方准保升留任。老邁貪劣者去之，其庸庸竊位者，亦令以原品致仕。內外須去三分之一，而後維新之政治乃成。至司道以上各官，表率群僚，關係〔係〕尤重。惟望我皇上認真考察，操此意以進退之，期以三年，氣象當幡然一變矣。此宜先破資格者四也。

至一切變法自強之道，中國因循日久，耳目未經，驟而變之，恐聚訟紛紜，易生疑沮。雖臨之以諭旨，而事無專責，遷延推妄，仍屬空言。應請飭下出使大臣，督率繙譯隨員，將泰西政治之不同於中國者，別類分門，詳加繙譯，然後審擇其可行者，交廷臣會議，參酌舊制，事在必行，準古宜今，增立官職，建立衙署，以為經久之規，則措正施行，更無扞格矣。此宜先專成者五也。

(一) 阜財裕國

天下事法積生弊，弊積法立，故莊周有芻狗已陳之喻。而強弩之末，不能復穿魯縞者，勢使然也。今之言籌餉者，曰期期於捐納、厘金兩事。曩在戶部，核計內外捐款，歲止百餘萬金，而國與民，陰受其害。厘金收數，歲歲短絀，每歲不足千二百萬金，而商民怨嗟，道路側目，此亦芻狗已陳而強弩之末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迂論也，實至言也。今賠款至二萬萬金之多，自應先清此款，民情方得定，國計方得紓。此次倭奴勒索，中朝滇緬【？】，仿普法之事：普勒法款五千兆佛郎，合中國銀數十五萬萬兩。本定三年歸楚，法民發憤，按丁抽派，每人出二十佛郎，未及一年，即已清款。近今二十載，法國儼然富強，皆幸此款早清，不致受其盤剝。應請仿法國之法，合中國四萬萬人，每人各派一元，貧者由富者承管，承管至十萬人者，賞給頭品頂戴；萬人以上，均奏明請旨，賜以特恩；其不足萬人者，則照捐款虛銜，定其差等；至十萬人以外，賞以異數殊榮，予虛銜不捐實職。明諭天下，咸使聞知，嗣後停捐減厘，與天下休息。此款既清，而後為開源節流、立自強之根本也。

中國舊法，以節流為主：裁額兵也，撤河防也，改漕折也，汰冗員也，

節浮費也，定服章也，禁靡費金、銀、銅三品也，皆可毅然行之，而決無流弊者也。新法以開源爲主：設商部也，行鈔法也，開礦政也，鑄銀錢也，墾荒田也，種樹木也，修鐵路也，廣輪舟也，徵菸酒稅也，立書信館也，收牌費房屋捐也。二者兼營，行之不倦，五年之後，百姓當歲增二十萬萬金之生計，國家當歲益二萬萬金之度支，既富且強，可以操券。日本，東瀛小國耳，其疆域不及中國江南一省。十年前出口之貨，三千萬元，僅及中國三分之一。自用西法，廣開利賴，去歲出口之貨，二萬餘萬元，已加中國之半。明效大驗，有如此者。而非我 皇上神明獨斷，仿效西法，得人而理不爲功，此泰西政教之根原，富強之本計，而獨惜中國之人，掩聰塞明，惛然不悟也。

（一）分途育才

今欲自強，必須變法，而欲變法，首在得人。天下事，蓋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中國王大臣中，自曾紀澤外，真知西法者，寥寥無人。張之洞知之，而凌雜棼亂之弊不免；其餘雖有知之者，然職居下位，學少專門。天下雖廣，遂有乏才之患，則在上者，無以養之而教之故也。日本資遣出洋學生，與中國年分相等，惟中國廢於半途，彼則鎮〔鍥〕而不舍，前後出洋者，至二千餘人之多。故行政用人，左宜右有，遂致堂堂中國，受制小夷，則一學一不學故也。

今宜請 旨飭下各省學政，揀選聰穎諸生，年在二十歲以內，通古今，識大體，身體壯實，自願出洋者，豐其資給，遣送來京，先在總署同文館中學習各國語言文字，隨出使大臣，分赴各國大學堂，分門學習，每歲以百人爲額，期以十載，學成而歸，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即不中者，必因材器使，任以事權，此一途也。中國通商各埠，一律提款建立書院，延聘中西宿儒，分門教習，每堂至少以三百人爲額，先須考驗華文，通達者，乃准入學。經費半給於官，半給於民，必優必豐，無遺無溢，學成之後，賞給秀才，一體鄉試。考驗之後，即試而不中，亦予文憑，俾得作爲正途，各謀生計，然後逐漸推廣，遍設於內地各城，此又一途也。至親王大臣子弟中，如有天性高明，自願出洋學習者，准其隨時呈報，派員考驗，華文通達，性行淑均，官給資斧，隨使出洋，分門學習；或不任勞苦，只能出洋游歷者，亦給以資。他時海外歸來，予以事權，一切均有把握矣。中外

大小各員，考覈才能，亦准援照辦理，此又一途也。惟是育才甚難，而中國此時需才甚急，遲之又久，又安能懸缺待人？宜於通商各埠，設立繙書局，專譯西國土、農、工、商、兵、刑、政治一切有用諸書，譯照華文，頒行天下學宮書院，使天下讀書明理之士，皆得通知海外之情形。而出使各館繙譯隨員，除日行公事外，亦專以繙譯西書，定其勞績之殿最。不及三載，而西文書籍，皆譯華文，天下之通習華文者，皆得熟悉西事矣，此又一途也。

如此分途教育，五年之後，應請旨明諭天下，專以時文帖括，考取秀才，自鄉、會試以上，均分政事、文學、天算、地輿、兵法、刑律、工藝、格致、水師、商務、農業、整理十二科，分門考核，科目名色，仍依舊制，勿庸更張，則民聽不疑，而人才輩出矣。

（一）改制防邊

自中國開戰以來，風鶴之警，達於畿輔。論者鑒於庚申之變，紛紛然，請遷都，議避寇，以至束手無策，苟且求和，咸歸咎於中國京城距海太近之故。今遼西已失，旅順不還，恐言事諸臣又將重議遷都之舉。而不知泰西諸國，除俄距海較遠外，英、法、德、美之都城，其距海均不過二、三百里，各國犬牙相錯，朝發夕至，在在可虞，而不聞衄端一開紛紛遷避者。國之能自立與否，在乎人之能自強不自強耳。我能往，寇亦能往。歷代遷都，苟且偷安，罕能自振者，則遷都之議斷不可行也。無已，則無事之日，於太原、西安、洛陽三處，速立行宮，暇豫游巡，問民疾苦，如黃帝之周游天下，以師兵爲營衛，則亦庶乎其可矣。

今遼左雖還，而朝鮮已失，神京腹背，徒〔陡〕覺單寒。應專設一大臣，常駐旅順，而金復海蓋，摩天嶺等處，均宿重兵，威海一隅，仍隸海軍提督，與旅順互相援應，以固渤海之防。此應改者一也。

熱河爲京師左輔，東三省後援，應選知兵重臣，以勁兵駐紮其地，務農講武，教練邊民。山海關、唐山、大沽、小沽，均駐兵興屯，增築堡壘，仍展築火輪車路，以捷往來。此應改者二也。

東三省孤懸在外，倭南俄北，窺伺堪虞，應揀大臣操練三萬勁兵，駐紮適中之地，屯田開礦，增闢利源，仍築鐵路，與旅順聯絡一氣，有事時，呼應始靈。此應改者三也。

山東登、萊各府，萬山重疊，然北之萊州，距京甚近，南之膠州，直抵運河，應添一提督，駐紮煙台，而膠、萊分設兩鎮，以顧海軍之後，而固山左之防。此應改者四也。

臺灣屬倭以東〔來〕，而海防亦為一變，似宜以福建兼隸粵督，東洋兼轄浙江，而海州、崇明、舟山、香山等處，均增設總鎮。此應設者五也。

然欲水陸合力，永保無虞，則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海軍終須添設。北洋之威海、旅順，中洋之吳淞、舟山，南洋之馬江、箱館，均可建船塢，築砲台，駐兵船。俄人西伯利亞鐵路既成，日本終須與我併力，英人顧念大局，亦須聯合中國以拒之。苟一意自強，期以十年，不患不作東方之盟主，雖賠費割地，無傷也。

(一) 教民習戰

自同治壬申、癸酉之間，普法一戰，而泰西之兵制大變，戰國之局勢遂成矣。初，普敗於法，法王擊破倫限制額兵不得逾萬，普王維廉及其相俾思麥，乃作內政，籍民為兵，自老、弱、殘、疾、瘋子優免外，無論何人，均入兵籍，置立隊長，就地教練，不領餉銀，事畢，繳械於官。十六歲至二十六歲，為戰兵；二十六歲至三十六歲，為守兵；過此以往，乃得自便。普法之戰，法兵九十餘萬，不為不多，而普人傾國興師，調至二百餘萬，法人一蹶不振，國破王擒，賠費割地，有甚於今日中倭之役。寡固不可以敵眾也，法人知其如此，乃亦教練民兵，有事時，可調至三百八十万；普人畏其報復，乃聯合南北德意志，大加教練，數至四百二、三十萬人；自餘奧斯馬加、意大利、日斯巴尼亞，相率效尤，各有民兵二、三百萬不等。此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本意，平日無養兵之費，臨時無教戰之勞，意美法良，莫過於此。然猶曰相距太遠，於中國風馬無關耳。惟俄羅斯國勢，首尾二萬餘里，亦效德國教練民兵，通國有民兵七百餘萬，他日鐵路成後，雄兵數百萬，囊括席卷，高屋建瓴，我中國東北、西北一帶，疆陲何以自立？十年前，日本亦師其意，民兵額數，不過二十萬人，及戰事既開，我則轉餉募兵，天下騷動，彼則左宜右有，措之裕如，終至上國天威，屈於尋常之小醜者，一則未雨綢繆，一則臨渴掘井故也。日本且如此，而況俄人？日本二十萬民兵，且無以應之，而況俄人七百萬之眾？水流濕，火就燥，歐州〔洲〕各國，勢均力敵，不得不改道而之東。中國地大物博，

而兵形寡弱如此，倘不汲汲然效西法，練民兵，購置軍裝，教以戰陣，不及十年，俄人鐵路既成，惟有坐以待發〔斃〕而已。

然中國數萬萬之眾，四百人之內得一人爲兵，其數已及千萬，只須於沿海、沿邊各省，合中國保甲團練之意，以仿行西法，教練民兵，兵已不可勝用。宜請 旨飭下出使大臣，密商德國政府，將其民兵規制，細加繙譯，必詳必明，即延聘德弁來華，會同沿邊督撫，編查教練，先行於東三省、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新疆、青海、西藏、四川、雲南各處，而後漸及於東南。萬里邊陲，同時並奉〔舉〕，優免之例，不免稍寬，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應請 明旨，先期曉諭，事在必行，仍宜興地利，築砲台，廣電音，開鐵路，庶刑〔形〕格勢禁，消息靈通，鄰敵雖強，不敢妄相窺伺矣。

（一）築路通商

人情習近而忘遠，非獨中國爲然也。西人鐵路初興，亦復眾謗群疑，交相沮格，及路成而後，百業俱興，礪確之區，變爲饒富，土貨日出，商路日通，上下四旁，交受其益，於是向之疑且謗者，渙然釋，默然慚，啞然自笑其無謂焉。今之中國，何以異是？

而言鐵路於今日，尤有不可不開，且不能不亟開者：環中國四面，皆我強敵，皆有輪船、鐵路，聲東擊西，朝發夕至，獨中國株守舊法，頑鈍不靈。譬如一城，攻城者，以健馬往來，忽南忽北，而守城者，徒步應之，勢常不及，必四面皆有名將勁兵而後可，一或疏虞，全城瓦解矣。今西北、東北，則俄之鐵路來矣；西南之西藏、雲南、廣西，則英、法之鐵路至矣。西人之言曰：俄人之鐵路，專主用兵；美國之鐵路，專主通商；惟英、法、德三國之鐵路，則通商與用兵俱便。俄人眈眈虎視，其意可知，西伯利亞鐵路一成，西北安有寧日？又，西人借款以修鐵路，各國皆踴躍應之，利息既廉，即可以鐵路作抵；而最不願借款用兵，使有用之金銀，變爲無用之彈丸、火藥。一有利而無害，一有害而無利故也。

中國此時，帑藏空竭，商務不通，應請 乾斷，毅然決然，創修鐵路。如慮巨款難籌，可將微息貸諸英、德，以造成之路爲抵，每年入息，逐漸歸債。以漢口至京爲幹路，而分一枝，以達汴梁，至清江浦；分一枝通陝、甘，以入四川；京城則東接東三省，而西抵山西，大致不過二千萬鎊。而

各路皆成以後，骨節靈通，毫無闕滯，無事則通商，有事則用兵，使萬里中原，期成殷富，四方外患，不敢憑陵，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去歲中倭構衄，彼〔運〕兵轉餉，困頓艱難，使當日鐵路早成，何至著著讓人，坐受其弊？彼妄相撓阻者，亦可以憬然悟矣。

(一) 變法宜民

精槍快砲、鐵船、魚雷，一切機器製造之外，西人之長技，而實西法之皮毛也，無其人以用之，則有器與無器等，今日中倭之事可見矣。西人之本原何在？曰在政教、農桑、樹藝〔藝〕、水利有經，所以養民者，如彼其備也；學塾、書樓、博物有院，所以教民者，如彼其詳也。野無遺賢，朝無幸位；上無過舉，下無冤民。跡其制度文化，往往闇合於三代聖王之古法。東海西海，心理皆同，其所以化行儕美，凌〔凌〕駕一時，國富兵強，縱橫四海者，皆確有其本焉，安可以海外小夷而棄之也？約而舉之，有數事焉，皆中國所必應變通取法者：

一曰學部。西人別類分門，舉國皆學，有不學者，罪其父母。廣建書樓，薈萃中外古今典籍，派員經理，許人入內縱觀，鈔寫無禁。並設博物院，集海外飛、潛、動、植諸物，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一切統於學部，中國可酌改國子監制度以兼之。

二曰礦政部。改革之政，必資財用，而財用不出於人，即出於地。中國五金、煤、鐵之礦，蕃庶甲於五洲，徒以封禁者多，無人經理，永棄地下，以資盜糧。宜請明旨，一律弛禁，聽其開採，辦有成效，再行徵稅設官，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經理。

三曰農桑部。各國土狹人稠，地無遺利，不得不藉力於工商。中國之地廣遠膏腴，開渠種樹，察土宜、興地利之法，亦浸〔寢〕久而自失其傳。即如蠶桑一端，九州僅存什一，凡木棉、加非、茶葉、菸葉、葡萄及一切材木百果之類，如教民廣種，皆可大收利權。愚民無知，而官不過問，一聽其自生自滅，徒使阿芙蓉流毒幾遍寰區，此何說也！宜專派戶部侍郎專管農桑，主之於內，而派同知、通判、主簿各閒官，勸之於外，擾民者重其罰，有成效者速其獎。

四曰商部。太古粟帛交易，老死不相往來，土狹人稀，而需用寡也。自漢以後，境土漸拓，民間百貨，非商不通，咸、同之間，藉厘金之款以平賊；通商伊始，資海關之稅以設防。財用半出於商，則商務之盛衰，即

國計之盈虛所係〔繫〕也。而官吏惟知抑商、制商，無一保商之政，商人無可控憇，乃轉倚洋人爲護符，叢雀淵魚，何堪設想。亟宜仿泰西設立商部，於省會、各大埠均立商政局，由各縣公舉公正董事以充之，而總其成於關道。所欲與聚，所惡弗施，有冤抑者，逕由商部上達天聽。譯行泰西商律，保護維持。

五曰衢路。泰西有街衢道路之官，即古者虞人之職也。《洪範》言：會極歸極，必推本於王道之正直蕩平者，何哉？譬之一身，土地猶肌膚也，財貨猶膏血也，而街市、溝渠、橋梁〔樑〕、道路之屬，猶脈絡之流行也。人身脈絡阻塞凝滯，則膏血不通，而瘻瘍不仁之疾起矣，安得以爲細故也而忽之？宜專派一工部侍郎主持其事，先以京城爲主，就地籌款，清理經營；各省、府、州、縣、鄉、村，均專派一閒員經理，按年課其功罪，毋等故事奉行。仍用巡捕，常川梭巡，追捕盜賊，一切均仿泰西辦理。

六曰工藝。西人常謂中國出洋，只有生貨，無熟貨，故隱受巨虧。生貨者，土產如絲、茶之類是也；熟貨者，製造工作之類是也。現在縷絲織布，漸有轉機；然【招】商局行輪二十年，仍用西人駕駛。宜派一工部侍郎專管，令各局提款，剏設學堂，仍仿泰西新章，有能製一新奇器物，有益民生，可以行銷外國者，准於所在呈報商政局，送京考驗，獎以金牌，許其專利。

七曰刑律。中國刑法太重，徒絕人爲善之階，笞杖一端，尤爲酷吏殺人之具。西人商於中國者，有罪審判，不服華官，實於國威有損。宜繙譯西律，派人學習，飭刑部大臣，參酌定制，務持輕重之平，庶中外商民永無冤濫。

八曰善堂。泰西新法，於寒貧、鰥寡、老弱、廢疾，不惟集款以養之，並設法之教之，意美法良，實與三古遺規相仿。宜譯仿規條，派大臣專管。中國貧民過多，並宜於種樹、作工、墾荒諸務，設法疏通，開闢利源，以資補救。

九曰火政。保險、煤、電燈、自來水各事，皆可保令物業便利闊闊，劫除疾疫。雖古時所未有，而實古聖王慮鮮懷餘之心，亦即通商以後，萬國大同，所必不可無之事。並宜分類譯出，頒之天下，次第舉行。

十曰議院。泰西議院之制，以英爲最優：有上議院，國家爵命之官也；

有下議院，民間公舉之紳也。每舉一事，下院議之，上院酌之，而君主行之。國用偶虧，祇須詢謀僉同，億萬金錢，一呼可集；政歸公論，人有定評；上下相准，永永不敝，所謂合億萬人爲一心也。惟茲事體大，須俟十年之後，學校大成，然後開院仿行，以立萬世無疆之業。

以上十者，略舉大凡，其細目宏綱，未易一時枚舉。此皆泰西政教之勝於中國者，無惑乎彼強而我弱，彼安而我危，彼攸往咸宜，我所如輒沮。泰西凌我，而無以報之；東洋仿泰西而侮我，又當之輒沮也。或者不悟，昧昧然歸咎于天意之適然，是猶父母有病，明明有藥可治，有醫可延，而束手坐視其不之救，忠臣孝子之居心，固如是乎？以上十則，皆救急之良方，自強之要策。我皇上苟能先幾燭照，得人而任，決意舉行，則不出三年，已有成效之可見，十年一小成，二十年一大成，然而國不富，兵不強，吏治不日清，民生不日厚，君威不日振，國勢不日張者，未之有也。以中國土地之膏腴，人民之靈智，物產之蕃昌，如日進無疆，鍥而不已，固不必務勤遠略，而他日萬方玉帛，咸拱中區，四海君民，來朝上國，同軌同文同倫之盛治，刻期操券，均在意中。其理速於置郵，其事易於反掌，而其本則在我皇上化裁通變，自強不息之一心。

說者必謂，費既償矣，地既割矣，此後財盡民窮，計日可待，安能再得億萬金之巨款，購此無數利砲精鎗，魚雷鐵艦，固此渤海之防務，成此北洋之海軍？而不知中國談洋務三十年，誤于得粗而遺精，舍本而逐末，故財殫力痺也，拱手而讓之他人。使當同治初年，早知培養人才，改革政事，以立富強之根本，時至今日，成效昭著，已當凌〔凌〕駕英、俄，何至俯首降心，受辱於區區之日本哉！雖然，中國爲數千年舊國，相沿太久，積習太深，改弦更張，原非易易。不經此一番挫折，正恐盈廷聚訟，眾口難調，雖有良謨，終成畫餅。故必盡奪其所恃，雖欲夸張自大而不能；必勢處於萬難，即欲苟且偷安而不可得。而復舉新革故，乃免違言，錯節盤根，乃別利器，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此皆我前皇恩澤，深入人心，上符天眷，故於俄人鐵路未成之際，務使一東瀛小國，警覺中朝，不欲使俄人師百萬，卷甲長驅，出我不意，而攻我不備。此中盈虛消且〔長〕之機，誠非昏庸固執之陋儒，所得窺其萬一者也。惟是變與不變之間，即爲中國興廢存亡之所係〔繫〕，若自此以往，依然苟安旦夕，敷衍因循，

則不及十年，必有四裂五分之禍。

奏臣備員樞直，奔走內廷，既已確有所知，誠不忍緘默不言，坐視傾覆危亡之慘。明知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國有常刑，然朝廷養士二百餘年，當此大利大害，間不容髮之際，若竟無一人能知之，能言之，亦古今之深恥也。既已披肝瀝膽，將積年所病，痛陳於君父之前，雖退就斧鑽，更無所恨。伏乞據情代奏，無任悚惶迫切之至。章京陳熾謹呈。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造化遊戲四十年：雷穎回憶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1)

雷 穎著 316頁 平裝250元

國雷穎先生（1920-），字少平，陝西省安康縣人，民國九年生於北平市。幼年時期在北平成長，並接受小學與中學教育。二十三年插班天津南開中學就讀，對日抗戰爆發後隨校遷至重慶。二十八年暑期畢業，考入軍政部兵工學校大學部第六期造兵學系，三十三年九月畢業。先後在重慶、昆明、越南海防、南京等地任職，三十八年一月隨兵工署遷移台北。其後歷任陸軍汽車基地勤務廠廠長，聯勤六十一兵工廠廠長、兵工生產署署長，及聯勤總部參謀長、副總司令等要職。六十年當選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六十一年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獎章」。六十六年奉令外職停役，就任台灣機械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作者以「造化遊戲」為題，縷述四十年來投身「國防科技」事業各階段任職情形，與國內外之進修考察心得，實可反映出我國兵工事業的成長與發展歷程。本書另附〈雷穎先生訪問紀錄〉，由作者補述青少年時期所見所聞，亦為珍貴之史料。

黨史會藏《中行廬經世資料》介紹

劉維開*

《中行廬經世資料》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藏「張群檔案」的原名。

張群，字岳軍，四川省華陽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四月十日（一八八二年五月九日），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十二月十四日病逝臺北，享年一百零二歲。

張群早歲獻身革命，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歷任上海特別市市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軍事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四川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西南軍政長官、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總統府秘書長等黨政要職，並與蔣中正先生交誼甚篤，深受倚重，所留存資料自有其重要性。筆者於國八十一年奉派編輯《張岳軍先生畫傳》（臺北：張繼正，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九日），曾多次檢閱該批檔案，擬對此作一介紹，並略論其在民國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中行廬經世資料》為張群就其所留存從政期間相關文件，包括文稿、函電、報告、書籍等分類整編而成。¹《中行廬》一詞，係張氏為紀念其部屬黎中行而命名。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福建發生兵變，攻擊黨政人員，是為「一六政變」，政府以北方局勢未定，江西共禍尙熾，兩廣仍不穩定，對福建不欲動用兵力，因張氏於福建省政府成立時，曾代表中央前往監督省府主席及委員宣誓就職，熟悉閩情，特派其赴閩宣撫。張氏抵福州時，叛軍林壽昌等派人在福州大橋攔車行刺，當時他不在車內，副官黎中行被刺身亡。事後張氏將其上海寓題名「中行廬」，以為紀念。至晚年，張氏將所存資料贈予黨史會時，仍以「中行廬」為名，實可見其對此事感念之深。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總幹事

¹ 據筆者了解，張群曾自整編而成資料中抽出數件蔣中正親筆批示，交總統府機要室併入大溪檔案，現應存在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

《中行廬經世資料》依其原始分類，分為四個部份，其內容大致如下：

中行廬經世資料（一）：主要為剪報資料，包括民國四十、四十一、四十六、五十二、六十歷年次日剪報資料、民國六十年有關中國問題剪報資料、祝壽剪報資料、及一九七九年魏德邁將軍來華前後函件、張群秘書長訪問日韓等相關書刊三十五種、三十八冊等，共五十四號。

中行廬經世資料（二）：主要為任公職期間，包括外交部長、行政院長、西南軍政長官、總統府秘書長及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等相關文書；所經歷事件，包括福建一六政變、昆明政變有關文件；及中日關係，包括三十七年、四十一年訪日、吉田書簡、吉田茂訪華卷等，共四十四號。

中行廬經世資料（三）：主要為與日、韓關係相關資料，包括五十三年訪問日韓卷、五十七年訪日資料、六十四年訪韓資料、日韓政情資料、與岸信介往來函件、中日斷交文件及有關資料、中日合作策進會資料、岸信介等訪華資料，及訪問歐亞各地剪報資料等，共三十八號。

中行廬經世資料（四）：主要為各時期的講詞、文稿、信函，及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七期生徒並第十期支那學生卒業紀念冊、三人會議商談經過概要、五十二年訪日相關資料、五十四年訪歐亞各國案卷、與佐藤榮作談話記錄、日本人士書札等，共七十二號。

此外，張群的長公子張繼正於民國八十一年應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之請，將張氏自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的日記，共二十五冊，交黨史會影印留存。八十二年四月，續移送張氏資料一批予黨史會，其內容包括：中日和約相關文件、戰前中日交涉談話記錄，及總統府秘書長任內訪日、韓資料等，共六十九號，均併入《中行廬經世資料》保存。

《中行廬經世資料》中，涵蓋了張群於民國四年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紀念冊，至民國七十六年百齡華誕各項祝壽活動剪報資料，七十餘年間擔任各項職務的相關資料，其中上海特別市市長、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職期間的資料，不在其中，十分可惜。

就筆者觀察，《中行廬經世資料》除了為研究張群一生事功提供重要的資料外，對於民國史的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一、澄清若干事實的真相：在《中行廬經世資料》中，保存了若干重要而不為外界所知的資料，對事實真相的澄清有相當助益，如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召開的國防聯席會議，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尚未公開會議記錄之

前，外界對於該次會議的實際情形並不了解。但是在《中行廬經世資料》中，不僅有一份會議程序表，還有一份張群用鉛筆記錄的與會者發言要點，研究者據此可以對會議情形有一個概略的了解，而該份筆記與日後所公布的記錄相對照，內容大同小異，亦可見張氏記錄之價值。²再如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表示所謂「戊文桂」電為偽造一事，稱：「孰知後來在蔣經國所著的《負重致遠》的小冊子上，曾一再提到我向許多人表示希望蔣先生『復位』的事，該書關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記載，曾偽造一通我致張群的所謂『戊文桂』電，其中說『請速電總裁促駕，不必候仁返渝』云云。這一連串的記載，不是蔣經國事後偽造，便是吳忠信、張群等人揣摩蔣先生意旨而矯詔行之，致蔣氏父子誤認為確實出自自我口。」³「戊文桂電」為「戊文桂電」之誤，在《中行廬經世資料》中保存了這份電報，曰：「限即刻到，重慶西南長官公署張長官岳軍兄。密。戊蒸親電誦悉。仁尤抵桂，擬續赴各地巡視，以激勵士氣民心，中樞軍政商洽，均須仰仗總裁親臨決定，請迅電促駕，不必候仁返渝也。特復，李宗仁。戊文桂印。」為十一月十三日七時十九分收譯。據此實可說明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之否認，甚至指為吳忠信、張群等偽造，並非事實。資料中同時存有張氏於同日十三時發出呈蔣中正的電稿：「限一小時到。台北草山總裁蔣。專密。連日電催德鄰返渝，頃接戊文桂電云：『仁尤抵桂，擬續赴各地巡視，以激勵士氣民心，中樞軍政商洽，均須仰使總裁親臨決定，請迅電促駕，不必候仁返渝也。』等語。昨日邱昌渭言，近日總裁復位空氣甚濃，時局艱危，應速有決定，否則此種空氣應速予澄清，不然李即無法再作。外傳反共大同盟之說，群雖未獲跡象，不知鈞處有無情報。寇鋒已攻入川黔，整個西南局勢動盪。現一般人士惶惑失望，不僅對於一方，鈞座對此支離破碎之區，如何決策，乞立予睿裁。張群。戊元親印。」對照蔣經國所著《負重致遠》中十一月十二日的記載，亦有相同記事，⁴由此則可

² 程序表及發言要點記錄，見《張岳軍先生畫傳》，頁 43。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將該項記錄發表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出刊的《民國檔案》，較《畫傳》所揭露，晚了四年。

³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年3月），頁 664。按：蔣經國著《負重致遠》一書，即《風雨中的寧靜》一書中的〈危急存亡之秋〉。

⁴ 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記謂：「昨日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先生及本黨黨籍立法委員七十人由重慶來電請求父親『赴渝坐鎮，挽救危局』。同時，張岳軍先生亦向父親電陳：『連日電催德鄰返渝，頃接戊文桂電：「擬赴各地巡視，以激勵士民心，請速電總裁促駕；不必候仁返渝」云云』，李宗仁前倨後恭，其心可知。」見蔣經國先生全集總輯委員會：《蔣

證明該書的史料價值。

二、為重要的歷史記錄補白：張群習慣將其認為重要的資料親筆錄存，這些筆錄的資料，或不見諸於正式的文件，但是在放在《中行廬經世資料》中，為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記錄。如其中一件〈蔣總統絜身引退及和談大計綱要草案〉原稿及修正稿，係黃紹竑於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提出之關於蔣中正下野及和談方案，原稿內容為：「一、蔣先生以俯察輿情，顧全國本，不失其歷史立場，主動下野。二、李先生依法繼承大任，宣布和平主張。三、和談以內閣為主，但由大總統賦以全權。四、和談事前準備：（甲）改組內閣，網羅全國和平民主人士充實和平陣容（陣容人選另案研究）；（乙）發動全國民意，一致擁護和平主張；（丙）運用外交使美蘇英法對中國和平取得諒解，並予以支持；（丁）主動爭取香港方面為首之反政府政治團體，勿使為和平障礙。五、和平宣布時，我方的表示：（甲）撤銷以前頒佈之戡亂命令，停止敵對行為；（乙）部隊主動撤離戰場（平津沽除外），彼此保持若干距離，以免衝突（軍事部署另案研究）；（丙）釋放政治犯及戰俘。六、和談時機宜主動迅速，務在平津失陷，蚌埠敵攻勢未發動之前。七、和談地點以上海為宜，並作如下之準備：（甲）宣布上海為和平都市；（乙）軍事指揮機關及部隊撤離市區，治安由警察維持；（丙）保證各黨各派的政治自由活動；（丁）以和平人士主持市政。八、和談條款方案研究。」經討論後於三十日修正後為：「一、蔣先生為便於政策之轉變，主動下野。二、李先生依法代行總統職權，宣布和平主張。三、和談由內閣主持。四、和談事前準備：（甲）組織舉國一致之內閣，其人選另行研究；（乙）運用外交特別加強對美蘇英之合作關係，以期對中國和平之實現獲得贊助；（丙）主動爭取過去不滿政府主張和平之政治團體及人士。五、為保證和平談判之順利，軍事應有嚴密之部署，尤須鞏固軍心，團結一致。」黃之原稿係代表部份桂系人士之意見，修正稿為蔣中正看過黃之原稿後，由張群、吳忠信、張治中等代表與李宗仁、黃紹竑討論的結果，從兩稿內容之差異，可以作為探討此一時期蔣桂關係的一個線索。

三、提供大量中日關係的資料：張群曾留日學習軍事，之後長期致力於改善中日邦交，與日本方面關係密切，曾著有《中日關係七十年》一書，歷述其對日工作之經驗與感受，為民國史上所謂「知日派」的代表人物。《中

行廬經世資料》中，保存了多件中日關係史重要事件的資料，包括張氏於戰前出任外交部長後與日方進行調整中日關係的歷次談話記錄、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所做外交報告的口頭補充報告、及戰後締結中日和約的經過、民國五十三年吉田茂訪華卷、吉田書簡有關資料、維尼龍廠售匪案、周鴻慶逃亡案、民國六十年中日斷交案等，以及與日本政界人士交往的記錄，包括四十一年、四十六年、五十二年三次訪日晉見日本天皇的談話記錄、歷次訪日與日方人士的談話記錄、剪報等、與吉田茂、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政界人士往來函件、談話記錄等，十分可觀。這些資料，雖然只是張群個人留存的資料，但以其在對日外交的地位而言，實為研究中日關係者，甚至民國外交史者所不可忽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張群於戰前出任外交部後，以日本駐華大使為交涉對象，從有吉明、有田八郎到川越茂，進行調整兩國關係的談判文件。張群與有吉明及川越茂的談判，官方有正式記錄，且已對外發表，與有田八郎的談判，則因無第三者參加，沒有任何正式記錄留存。⁵不過張群卻留下了一份在會後口述，由高宗武筆記的談話記錄，存放在《中行廬經世資料》中。雖然這份記錄為單方面的資料，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由此對張氏與有田八郎的談判情形有一個概略的了解。

四、保存政治上若干人與事的記錄：張群在民國政壇上，一向被視為「政學系」的領袖，對此，張繼正在〈我的父親〉一文中表示，他「所以會被誣為政學會的重要分子或領袖人物，實在是因為那些搞派系的人，為了要排擠他，祇好先誣賴他，指他也是一個搞派系的人物。」「他主持過許多機構，都是用人唯才，從沒有固定的班底，以致有些僚屬，難免不滿，認為他不肯提攜，即或提攜，也不肯盡力，由此，更可證明，指他是政學會領袖的說法，實在是無稽之談。」⁶而以蔣中正用人的作風觀察，尤其是張氏從民國四十三年至六十一年，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前後長達十八年一事來看，指稱其在政治上為一系領袖之說，確實有商榷的必要。《中行廬經世資料》中，保有一件「政學系報資料」的剪報，也許代表他對這個問題亦有相當興趣。在《中行廬經世資料》中，有若干資料，不僅為張氏個人資料，也與當時的政局發展有關，如行政院大事記、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與蔣總裁往來電文、張長官在西南主持軍政期間與總裁往來電文、昆明事變有關文件等。以昆明事變為例，

⁵ 張群與有吉明及川越茂的會談紀錄，見《民國檔案》1988年第2期。

⁶ 張繼正，〈我的父親〉，《張岳軍先生畫傳》，頁222。

不僅是張群一生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同時也是大陸淪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文件中包括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為軟禁張氏一事致張氏的鋼筆原函、張氏自雲南脫險抵臺後提送中常會的雲南局勢演變情形報告、及張氏脫險抵港之相關剪報等，對了解雲南陷共經過有相當助益。另《中行廬經世資料》中尚有張氏從政期間，主要是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期間，與各方人士，如陳誠、蔣廷黻、洪蘭友、王雲五、張君勸、蔣勻田、李璜、左舜生等的往來函件，保存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素材。

綜合而言，《中行廬經世資料》在數量上，也許不及其他政治人物的個人專檔可觀，但是以張群在民國政壇上所處的地位，在對日外交上的影響，以及與蔣中正的交誼，在在使得這個檔案不僅對研究張氏個人，對研究中日關係，而且在研究民國史上，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出版論文集兩種

1.財政與近代歷史（上、下冊） 近史所社會經濟史組主編

88年6月出版 精裝750元 平裝650元

本書共收論文15篇，另加專題演講及2則附錄。論文係針對1600年以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財政與歷史關係，就：1.政府財稅控制能力的變化；2.民間團體的財源；3.中國大陸與台灣間的對照等議題，提出若干新的觀察。

2.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 熊秉真、呂妙芬主編

88年6月出版 平裝250元

本書收論文6篇，問題與討論3篇，另加編者引言。探討明清以來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禮教與情慾看法之多樣面貌。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六種羅字特藏資料介紹

區志堅*、曾漢棠**

前言

馮平山圖書館（下文簡稱馮館）於 1931 年動工興建，翌年由港督貝璐爵士（Sir William Peel）主持開幕典禮。考當日馮平山（1860-1931）捐款建館的原因，其子馮秉華曾有如下引述：

先父捐建此館之目的有二：一以使香港大學成為南中國蒐藏與保存中國古籍之主要重心，一以鼓勵華人研究祖國語言及歷史風俗習慣。先父對香港大學成為南中國學術中心深具信念，且深信此中文圖書館必能填補本港教育制度之重要空隙，使東西文化制度能溝通研究。

馮館創立的目的，旨在「保存中國古籍，發揚中國學術文化」（馮秉芬語）。1961 年大學圖書館新廈落成，馮館遷入，舊址改為馮平山博物館。

羅字特藏簡介

據黎樹添描述，羅香林（1906-1978）哲嗣羅文等自羅氏在 1978 年 4 月去世後，即將羅教授的部份藏書、函件、日記、手札等贈予馮平山圖書館，設立「羅香林教授紀念藏書」，而這便是羅字特藏的由來。這個特藏包括羅教授的著作、手稿、廣東省資料檔案、廣州中山圖書館檔案、孫中山先生資料、族譜以及香港各社團、宗親會、同鄉會等出版物。毋庸置疑，羅字特藏確是馮館藏書的一大特色。初步估計，馮館所收羅氏特藏資料共 364 件，就內容分類，約有下列各項：（一）羅氏已發表的著作及文章，計有《一八四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 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客家話：附錄客家源流考》、〈白沙先生五百三十六年誕辰紀念大會致詞〉（《白沙學刊》，2期）；〈碧霞元君〉（《民俗》，69、70合期）；（二）已發表文章的稿本，如：《百越民族考》、《百越源流與文化》；（三）未發表的稿本，如《抱樸日記》、《中國歷史》（油印講稿）、《古文辭義法》、〈海鹽朱先生著作敘目〉；（四）輯錄、報告等作，如：《各地客屬史料》、《廣東黨政民意等機關重要人員名冊》、《廣東省・政務視導團・第五團・廣東省政府政務視導團第5團簡要報告書》；（五）剪報，計有：《各報摘要》、《華字報史料》、《羅香林教授所藏剪報》；（六）有關近人史蹟諸作，如：《近人對聯、墨跡》、《近人詩稿》、《近人文稿》；（七）羅氏本人筆記、行誼資料，如《羅香林教授所藏照片》、《羅香林墨蹟》、《羅香林聖誕卡及賀年片》、《乙堂存稿》、《乙堂函牘》、《乙堂遷港後所藏中國族譜目錄》、《乙堂史學講義》、《乙堂隨筆》、《乙堂序跋詩聯》、《乙堂演講稿》、《乙堂英文論文稿》、《乙堂札記》、《乙堂著述有關圖片》、《乙堂資料》等。

六種問學書信資料

在羅字檔案中，包括一些近賢致羅香林的書信文稿，時間自 1912 年至 1978 年羅氏去世之前。內容除載羅氏與親朋談近況，與港大、珠海門人論學及談論日常生活的書函外，還有羅氏就任港大中文系時期，與西方、日本學者問學、唱酬等信件。從中可見羅氏的人際網絡，及五六十年代，香港成為中外學者文化交流的學林景地。現羅列六種有關論學書信的內容篇目如下：

《歐美漢學家書柬》（圖書館編號：羅字 22278），見於《當代文藝》。

蘇睿穎、周永新譯：法蘭西學院戴密微教授與羅香林教授書；布裕民、馬泰來譯：牛津大學德效騫教授與羅香林教授書；李品初、葉秀常譯：哥倫比亞大學富路特教授與羅香林教授書；蘇睿穎譯：加利福尼亞大學賓板橋教授與羅香林教授書；馬泰來譯：前中法大學邵可侶教授與羅香林教授書。

《與歐美學者論學書柬》（羅字 21374-4）。

與葡萄牙史密夫主教 (Bishop Smith) 書；與港大地理系高蘭德博士 (Dr. C. T. Grant) 論珠江口 積關係書；致多倫多大學克蘭慕賓教授 (Professor J. L. Cranmer-Byng) 書；與香港皇家學會季刊編者赫伊斯博士 (Dr. James Hayes) 述宋學鵬與香港之關係書；再與赫伊斯博士 (Dr. James Hayes) 述宋

學鵬之短篇論文書；與港大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景復朗教授書；與法籍邵可侶教授（Prof. R. Reclus）論中國人口問題資料書；與于儒伯教授（Prof. R. Rulhmann）書；復與傅吾康教授（Professor W. Franke）書；與加省賓板橋教授（Prof. Woodbridge Bingham）述近書；與紐約富路特教授（Prof. L. C. Goodrich）論波羅毬之創始書；與夏威夷大學衛海樓教授書；與崇基學院副校長芮陶菴博士書；復高德利先生（Mr. Corte-Real）述利市封由來書；復懷特先生（Mr. B. R. Wright）論道德經三十三章譯文之優劣書。

《治史郵柬》（羅字 21368）。

與康橋洪焜蓮教授論臣瓊姓氏問題書；與紐約富路特教授（L. C. Goodrich）論波羅毬之創始書（按：本函已見於《與歐美學者論學書柬》）；與加省賓板橋教授（Prof. Woodbridge Bingham）述近況書；致京都吉川幸次郎教授述東亞學術研究書；與巴黎于儒伯教授述所遺二生書（按：本函已見於《與歐美學者論學書柬》）；與容啟東校長述中國關於五穀病害與飢饉之史料書；與港大地理系高蘭德博士（Dr. C. T. Grant）論珠江口 積關係書（按：本函已見於《與歐美學者論學書柬》）；與巴黎王聯曾先生論切韻等問題書；與巴黎張馥蕊先生論治宋史書；與門人李少峰司鐸論編算蒙高味諾總主教紀念錄書；與門人李少峰司鐸論耶路撒冷發現宋代等錢幣書；復門人路未士（W. G. Lewis）論大唐創業起居注等書；與撒母耳陳君論港大校徽書。

《史郵》（羅字 22252）。因原資料所示書函題目與館方之目錄有異，故筆者在括號內指出原資料之書函題目，以便讀者辨識。

與丘輯甫縣長論修興寧縣志（與丘輯甫縣長論修興寧縣志書）；與某先生論修廣東通志（與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海濱先生論修省志書）；與家則桓先生論哥崎郎官秀五等定稱（與家則先生論先民法名郎稱書）；與羅幹青先生論客家略說（與宗人幹青論客家界說問題書）；與某先生論設立中華學會（與鄒海濱先生論設立中華學會書）；與陸丹林先生論廣東文獻叢書；與丘荷公先生論牧原和尚事蹟（關於牧原和尚之事蹟與思想答丘荷公先生復）；與某公論國父家世源流（致孫院長苓鄧慕韓問於國父家世源流考正誤一文）；與李季谷教授論暹羅王鄭昭與鄭華關係；與葛豫夫先生論國父學術思想淵源與體系；與吳三立教授論廣東詩學源流（與吳辛旨教授論鄉先輩詩學）；與羅幹青教授論耕讀文化（與羅幹青教授論中國耕讀文化）；與魯默生教授論古文辭（與魯默生論文學）；與林半覺先生論古代碑刻與文化（按：本函僅有目無文）；與陳寒剖教授論情理雙溶（按：本函有目無文）；與桂祥姪論

讀書與作文（論修養與作文方法示桂祥）；與桂祥姪論讀書人之自處；與顧頡剛先生論桂林新發現唐代摩崖佛像（與顧頡剛先生論桂林唐代佛教造像）；與宗人某論鄉土史地；與某公論禮樂（按：本函有目無文）；與吳宗慈教授論國父先代與江西關係（按：本函有目無文）；與陳百年先生述史館論議大意（按：本函有目無文）；與鍾衍威君論滇武二水流域之種姓源流；與黃蔭普先生論有關廣東方言之書籍（關於廣東各方言之書籍答黃蔭普經理）。

下文所列乃未見於目錄者：與家博己司令論鄉村中學須注重鄉土史地等補充教材；與家博己兄論鄉村中學須注重鄉土史地等補充教材；與門人黃慶華潘新熹二君論研究中英關係史與南洋問題；研究明代倭寇史問題答鄧似堯君；論青年立志目的與自重自反寄桂祥姪。

《羅香林教授所藏函牘、他人手稿及賀片》（羅字 11060），共收件 99。

1. 董作賓先生函札；2-3. 張君勸先生函札；4. 張君勸先生事蹟及函札；5. 陳大齊博士函札；6. 賀光中先生、黃錫齡先生、劉百閔先生函札；7. 劉百閔先生函札；8. 黃希聲先生函札；9. 曾鏡涵先生、黃國芳先生函札；10-14. 李景康先生函札；15. 張禮千先生函札；16. 易君左先生函札；17. 朱謙之先生函札；18-19. 梅貽琦先生函札；20. 清華大學張星烺、錢稻孫、錢玄同、唐誠諸教授函札及題字；21. 清華大學陳達、吳文藻教授函札；22. 朱自清、朱湘先生函札；23. 萬福新牧師函札；24. 梁均默先生函札；25-26. 陳寅恪先生函札；27. 陳寅恪、胡適之先生書札；28. 羅家倫校長便條、楊振聲教授函札、馮友蘭教授便條；29-30. 羅志希先生函札；31. 徐賢修、鄒文海先生函札；32. 陸懋德先生函札附詩一首；33. 蔣復璁函札及詩、賀麟、吳達元先生函札；34. 張競生函札；35. 德效騫教授函札；36. 德效騫教授逝世悼詞及其夫人函札；37. 李若瑟教授函札；38-39. 富路特教授函札；40. 賓板橋教授函札；41. 艾伯華教授函札；42. 瑞典高本漢及諾貝爾文學獎金委員會來函；43. 邵可侶教授函札；44. 戴密微教授函札；45. 于儒伯教授函札；46. 巴黎大學中國學院白樂日教授函札；47. 傅吾康教授函札；48. 傅海波教授函札；49. 葡萄牙史密特主教函札；50. 謝和耐、葉理綏教授函札；51. 羅慈威先生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時函札；52. 羅慈威先生在贛及在渝時書札；53. 羅慈威先生在廣東省府時書札；54. 羅慈威先生函札；55-59. 羅慈威先生到臺後函札；60. 羅慈威先生到臺後對學術研究之主張；61. 羅慈威先生函件及聯語；62. 羅慈威先生逝世及喪事消息；63-66. 故抗日副師長羅策群先生函札；67. 數學家華羅庚函；68. 函雅（二）羅獻修、連橫、楊壽昌、冼玉清；69. 函雅（三）朱希祖、汪東、王寵惠、張繼；70. 函雅（四）倫

哲如、吳雨僧函札；71.函雅（五）金岳霖、胡先繡、裘籽原、廖景曾；72.函雅（七）靳志、胡毅生、徐紹繁、滕固；73.函雅（八）何藻翔函札；74.（九）時賢函札：俞叔文、鄧寄芳、黃季蔚；75.函雅（十）馮友蘭教授、袁同禮函札；76.胡適博士函札、傅斯年先生函札；77.許地山教授手稿、馬鑑教授函札；78.賴際熙太史手稿；79.賴際熙太史手稿；80-81.錢穆博士手稿；82-85.劉伯閔先生手稿；86.蕭蔚民先生詩稿；87-89.靳仲雲先生詩稿；90.饒固庵所撰詞稿；91.桂南屏太史讀希山叢著詩；92.桂南屏太史閱廣雅同舍錄詩；93.桂南屏太史由粵回杭詩；94.桂南屏宋王臺及過九龍城詩；95.桂南屏太史和溫丹銘詩；96-97.林仰山教授繪聖誕賀片；98.1968年賀聖誕及新年片詢問中國史學會者（美國哈佛大學白思達教授賀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馬大任主任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唐德剛主任片、臺北臺灣大學姚從吾教授片）；99.趙元任先生賀片。

《乙堂函牘》（羅 11001）

共 105 冊，每一冊均以精裝，可分中文函件、英文函件兩大類。每一冊函牘的第一頁，均有目錄。中文函件按致函者的姓氏為排刊次序，把相同的姓氏，放在一起，但函牘沒有明確指出是按作者姓氏的筆劃多少為部次；英文函件則按致函者英文姓氏的字首先後次序，為排列準則。中英文函件均以每一張信紙為一頁，換言之，每一冊以書信紙張之數目為單位，在書冊中，每一張信紙均以膠面蓋著，方便閱讀。在整個《乙堂函牘》的檔案中，以收錄朱希祖致羅香林的信函為最多，共 333 張，分 3 冊收藏。又整個檔案的書冊中，輯錄了羅氏與朋友、中外學者、門人的書信往來，及任中文系系主任時給校方的行政信件，又有羅氏參予校內、校外各大專院校學生組織、校外宗教團體、中學學生組織的函件、以及致崇正總會的信件。從這些函牘的內容，可以觀察香港高等院校教職員在六、七十年代的問學、求學情況；又可見五、六十年代，中外學者向羅香林問學的情形，而香港所扮演促進中外的學術交流的角色亦躍然紙上了。

結語

時至今日，馮平山圖書館藏書超過 52 萬冊，是香港學術文獻的重要參考資料地。本文僅介紹六種羅氏問學信函，有關羅氏其他未發表的日記、手稿及研究資料，則留待高明君子的相續努力了。



新書評介

外交史研究的新成就 ——讀王爾敏著《晚清商約外交》

張憲文*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教授王爾敏先生，長期致力於明清史、外交史研究，在這方面的卓著成就，早已蜚聲學林。我曾拜讀過他的《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明清社會文化生態》等專著，受益匪淺。近得他的新著《晚清商約外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深感這是一部中國近世外交史研究的力作。借用史學大家唐德剛教授語，該書顯示了「王爾敏式的基本功」。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德剛教授認為「若論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簡直沒一部可讀之書。乍聽起來，這種評價未免太過苛刻，但如爾敏教授這樣不染浮華，有紮實功力的外交史專著，也確實不多。

向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或專治中國外交史的學者，十分注重中外國家間政治條約的研究。舉凡戰爭結束常以政治條約形式，把戰勝國利益確認下來，其中割地賠款、邊疆劃界等給中國造成的巨大損失，自不待言。然而，伴隨著政治條約的簽訂，常在列強的威脅挾制下，另訂商約。這些商約，正如爾敏教授所言，其危害，「其喪權辱國，侵損中國國脈民命，至於深入脊髓，決不下於政治條約」。「中外所訂之商約，對於中國侵損，歷年推算，中國所損失遠甚於各大戰爭之賠款。即以1860年以後之中外商約而言，其每一年損失的海關洋稅，即足抵一次對英法聯軍的賠款總和而有餘。」而對於這一重大的歷史問題，學術界向來研究甚少。爾敏教授認為：「百餘年來，只注意到外交上所訂政治條約，而迄未於歷來商約作詳盡展示，

* 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

自來一概輕忽其重要性」。本書能在這方面加以精密研討，提出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填補了學界研究的空白，彌補了研究的缺陷，應該說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特色。

《晚清商約外交》一書的第二個重要特色，是運用了豐富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如參閱了大量清季歷朝外交原始史料、總理衙門檔案、籌辦夷務始末、清實錄等，參閱了李鴻章、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文稿，以及大量英國和日本的原始外交檔案。最可珍貴的是本書徵引了許多由英國國家檔案局保存的、他人尚未運用過的原始文件。如 1842 年 8 月中英簽訂江寧條約之後，雙方即開始議訂五口通商稅餉章程，大抵至次年 7 月間完成。參與談判的清政府欽差大臣耆英，於 7 月 22 日聯合兩廣總督祁頃、廣東巡撫程矞采在廣州公布告示，宣布中英通商新例。這個告示將有損中國權益的五口通商章程大加吹噓，說「從此干戈永息，樂利無窮，中外商民受益實非淺鮮」。中外商民「務須各安其業，共享昇平之樂。從此萬年和好……」。此一告示，均不見於中國官私文書，是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珍稀檔案。又譬如《天津條約》簽訂後，中英之間再議子口稅問題。中國官方典籍均不見此項子口稅章程，但卻保存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此章程極具參考價值，本書亦加以引用。中日甲午戰爭後，除簽訂《馬關條約》外，還延伸出一個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此條約的談判，頗費周折。對日方提出的條約草案，或拒絕，或修訂，中方全權大臣李鴻章在草案上均有批注，其中反映了中方談判的對策和立場。惜中國無此史料，本書亦取材於日本外務省檔案。正是由於本書運用了大量第一手且少見的史料，因此它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的，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和很高的學術價值。

《晚清商約外交》一書的第三個重要特色，是十分詳盡地敘述了許多商約的議訂過程。它較客觀、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官員談判中的艱苦及為挽回利權所作的努力；同時，也深刻地揭露了列強為獲取最大的利益而強取硬奪的野心。

如在英、美之後，俄國亦遣使來華，謀會商中俄通商問題，實際上掩藏著領土方面的更大野心。清政府咸豐皇帝一方面通令嚴加防範俄使來華；另一方面指示軍機大臣擬定因應政策。中俄雙方雖然最後仍簽訂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但對於談判的艱苦，本書引用恭親王給清廷的奏摺說：「往返商議不下數十次……臣等與之反復爭論，幾至舌敝唇焦。而該使於

一字一句之間，利己者益之，不利己者去之。是以稿經屢易，數月之久而不能定妥。誠以該國之願望太奢，臣等實有不敢過事遷就故也」。

再如，中英簽訂《煙台條約》後，英人藉機興風作浪，節外生枝，不僅要求增開口岸，還要求長江非通商口岸亦允許英船停泊。英方不達目的，動輒以戰爭相威脅。本書以大量史實介紹了李鴻章對英交涉爭辯一年的艱苦困境，引用李鴻章致沈葆楨的話說：已經「焦頭爛額」、「意緒頽喪」、「若使其（英國）如願，天下之惡皆歸焉。此所謂進退兩難者也」。

書中也介紹了在列強步步進逼的形勢下，中國官員挽回利權的努力。盛宣懷曾向清政府提議以練兵、籌餉、商務三方面，作為恢復國力的起點。此項極具眼光的提議雖受到清政府支持，並逐步付諸實施。然而，終因義和團之變，此議受挫。

《晚清商約外交》的第四個重要特色，是深刻地論證了商約對中國造成巨大危害和喪權辱國的損失。書中指出，英國等列強，最早通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通商章程附黏善後條款》等商約，取得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權、最惠國待遇以及英國領事官等對於入口貨物全面擔保與監督之權利。之後，又規定商約每十年修訂一次，各國由此而不斷擴大在華特權。特別是通過《天津條約》、《煙台條約》、《馬關條約》實施之後中外陸續簽訂的各個商約，中國不僅被迫開放更多的長江口岸，且在無形之中喪失了長江之內河航行權，列強輪船和貨物可以直達重慶以下的中國內河水域。蘇州、杭州本不屬長江口岸，但日本堅持要求其輪船到埠貿易，從而也迫使中國開放了長江以外水域之內河航行權。由於商約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因而鴉片毒品長驅直入中國，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害，更是不可估量。列強雖然主動要求商約每十年修訂一次，但是其目的重在擴張商權以獲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而從不觸及稅則問題。各種貨物值百抽五，甚至低於百分之五，這種極不合理的規定，自 1843 年至清朝末年從未修改過。中國由此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實難計算。本書以大量鐵一般的史實，對此作了充分的論證。

總之，本書如作者所言「自是全部獨力演繹，所據資料，亦無不引自直接資料本原」。《晚清商約外交》在外交史研究領域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來函照登

按：《通訊》27期唐澤靖彥先生大作《黃宗智》乙文，經翻譯後刊出。因時間匆促，譯文未及送請唐澤先生親校，致有若干錯誤，謹此致歉。唐澤先生來函提出勘誤表一份，照登如下：

勘誤表

1.21 頁，第 8 行「民事協調」應改為「民事調解」。

2.22 頁，第 10-13 行「而他的理論背景……各學問的理論。」應要改為：

「而他的理論背景，不僅包括 A. V. Chayanov 等人有關小農經濟行為的理論，還有 Clifford Geertz, Theodore Schultz, James Scott, Charles Tilly 等人有關個體經濟學、人類學、集體行動等各學問的理論。」

3.22 頁，第 17-20 行「本書是根據……成套的研究。」應改為：

「黃先生的《華北》《長江》兩部著作的理論架構來自 Clifford Geertz 的《農業過密：印尼的生態變化過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書。這部著作比較了兩個不同的生態環境，並且對照其特有的經濟、生態條件。由此可知，《長江》與《華北》應是成套的研究。」

4.22 頁，第 21 行-23 頁，第 1 行「人口壓力和商品化……轉變，」應更改為如下：

「人口壓力和商品化並未造成農業構造上的轉變，更無一般理論所說的導向資本主義經濟，」

5.23 頁，第 5 行「顯然沒有採用」應改為：「沒有僅囿於」。

6.23 頁，第 16-17 行「人口壓力……基本生活，」應改為：

「人口壓力在不導致傳統農業形態在質與系統上的變貌之下，反而以密集的勞力精耕維持勉強的基本生活，」

7.23 頁，第 30-31 行「以密集勞力為基礎的……擴大，」應改為：

「雖比以專業勞力為基礎的農業經營的單位面積總產價值擴大，」

8.25 頁，第 3-4 行「Rawski 認為……增加率低，」應改為：

「Rawski 主張的二十世紀初中國農村的總產量實質增加率，實際上比 1980 年代的增加率還低，」

9.26 頁，第 4 行「偏見」應改為「想法和態度」。

10.27 頁，第 8-10 行「黃先生在會上……等人針鋒相對。」應改為：

「黃先生和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在會上與主張這些概念適用於中國的羅威廉（William Rowe）和 Mary Rankin 針鋒相對。」

11.29 頁，第 4-7 行「究竟作為……行事要求。」應改為：

「作為人民『父母官』的地方官必須依據『情理』作審判；但所謂的『依據情理』，黃先生主張這僅是官方的道德性『表達』。地方官平時聽訟處理民事案件，維護了正當的民事要求，也依靠了衙門職員的胥吏行事。」

12.29 頁，第 11、16 行「法定」均改為「官方」。

13.29 頁，第 14-15 行「這就是向知縣……糾紛的處理。」應改為：

「這就是鄉保（他們知道知縣對訴狀下飭的批文內容）在既不完全正式也不完全非正式的領域內，進行民事糾紛的處理。」

14.29 頁，第 18-20 行「是考察清代司法制度……矛盾的現象？」應改為：

「是考察清代司法制度如何把韋伯（Max Weber）的兩種理念模式（即合理性形式主義的法與非合理性實體主義的糾紛解決方法）結成一體的矛盾結構。」

15.30 頁，第 3-5 行「民事糾紛原是……如何理解呢？」應改為：

「一方面存在著清朝政府以為地方官應該扮演父母官，民事糾紛原是不足的『細事』的這些『表達』；在另一方面地方官處理民事糾紛時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又該如何理解呢？」

16.30 頁，第 5-8 行「另外，在 1991 年關於……相互矛盾的現象。」應改為：

「在 1991 年關於「典範危機」的論文中，黃先生指出與過去的認知相互矛盾的現象還有：在十九世紀後半，未伴隨發展出對抗國家權力的市民勢力，也出現「公共領域」確實有擴張的矛盾現象；未伴隨發展出保護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也存在處理民事糾紛的規範主義法制的矛盾現象。」

17.30 頁，第 20 行「刊出後現代……研究成果。」應改為：

「刊出後現代主義理論對中國史研究挑戰的專集。」

18.31 頁，第 9 行「填補社會經濟史上主要論述的空檔」應改為：

「填補社會經濟史從前明顯忽略的論述分析這個空檔」。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9.3-1999.9)

劉農華* 輯

3.25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舉行「莫斯科、北京、廣州－蘇俄與中國早期外交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至 26 日)，共發表論文 11 篇。

3.27 台灣歷史學會主辦「認識中國史學術研討會」，假台灣大學法學院舉行，發表論文：鄭欽仁：〈當前中國史研究的反省〉；莊萬壽：〈「夷夏之防」解〉；李明仁：〈中國史上征服王朝的理論〉；呂春盛：〈中國史上的征服統治－以隋文帝滅陳之後對江南的征服統治為例〉；蔡篤堅：〈思辨中國與台灣場域：陳芳明與文崇一著作蘊涵之史學方法初探〉；蔡幸娟：〈北朝正史女主政治評價之考察研究－兼論中國史「女禍」與「女禍史觀」之形成與發展〉；溫振華：〈1949 年以來中國「西洋科學史」論著之翻譯〉；廖瑞銘：〈遠離中國史的迷思〉。

3.29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葉春榮主講：〈從私佛仔到廟宇－一個南台灣農村的例子〉。

3.31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明清研討會，由中國文化書院導師金春峰教授引言：〈我所了解的李澤厚：對「中體西用」、「告別革命」的回應〉。

4.12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禮俗宗教研究室舉行專題演講，由美商聯信航太台灣地區主任主講：〈歐美的「儒釋道」新潮〉。

4.13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中心學術演講，由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神學與宗教學系教授 Peter Clarke 主講：〈Japanese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4.13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訪問學人李毓中主講：〈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

關係初探〉。

4.17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與因應策略研討會」，假台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行。

4.21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瞿宛文主講：〈Industrial Growth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aiwan〉。

4.22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協辦「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整體的重建(1600 迄今)」學術研討活動，假陽明山天籟溫泉會館(至 23 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5.21、6.25)舉行。

4.2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至 25 日)。

4.27 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列車」學術座談，主題為：〈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並於 5 月 5、19、26 日分別舉行專題演講，由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邱炫煜主講：〈回首澗子瀝－清代中壢地區的開拓與民間信仰〉；國立僑大先修班教授何石松主講：〈客語之美〉；淡水學院台灣文學系教授李喬主講：〈從語言文化看台灣族群問題〉。

4.28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討論會，由 Georgetow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Carol Benedict 主講：〈State Medicine and sanitary policing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Eras〉。

4.2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訪問學人金觀濤教授報告：〈中國革命烏托邦的起源－論道德理想主義演變的邏輯〉。

5.03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專題演講，由哈佛燕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沈津主講：〈上海圖書館的古籍與文獻收藏〉。

5.0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學術演講，由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嚴昌洪、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朱英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虞和平主講：〈近代中國的商業習慣、組織及活動〉。

5.04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日本與東亞經濟關係的歷史性回顧」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論文如下：堀和生：〈日本帝國的擴大及其遺產－1930 年代與 1950 年代的比較〉；陳慈玉：〈日本殖民時代的基隆顏家與三井財閥〉；籠谷直人：〈1930 年代的棉業通商摩擦問題及日本的經濟外交〉；濱下武志：〈十九世紀下半葉朝鮮華僑的金融

網路〉；林滿紅：〈四百年來的台日經貿關係〉；西川博史：〈美國對日佔領政策和亞洲經濟的再編成〉；杉原薰：〈一九六〇年代以來亞太經濟的發展模式〉。

5.04 台灣生活空間技術史研究班台灣建築史論述之形成系列演講之一，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由文化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李乾朗主講：〈台灣傳統建築的屋頂〉。

5.05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研討會，由博士後研究學者王宏仁、張翰璧主講：〈越南新娘在台灣生活現況〉。

5.07 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主辦「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主旨：1.推廣台灣歷史文化之研究、鄉土史料之利用暨文化活動的參與；2.藉舉辦學術性之研討會，凝聚各專家學者意見，從各種角度歸納台灣歷史文化的发展、變遷、特色及現存問題，以提供相關單位決策之參考。

5.10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演講，由外蒙古科學院高級研究員札斯藍主講：〈蒙古獨立和中華民國，1911-1945〉。

5.1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訪問學人虞和平教授報告：〈近代中國市民社會之我見〉。

5.13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學術演講，由河北大學教授郭東旭主講：〈近年來中國法制史之研究與教學〉。

5.1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座談會，由英國女性研究訪問團主講：〈泛談英國的性別研究〉。

5.15 私立逢甲大學人文社會研教中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東海文教基金會主辦「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至 16 日），會議主題以學術觀點、持平立場、多元角度，探討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時代相關議題，期還人物與歷史之原貌。

5.17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年輕學者著作獎成果發表會），由助研究員胡曉真主講：〈「解」讀文本、「構」築女性——彈詞小說研究與清代婦女文學〉。

5.17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主題演講，由美國賓州大學科學史系教授席文(Nathan Sivin)主講：〈中國醫學史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5.20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李常井主講：〈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論述的內涵〉。

5.2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訪問學人朱宗震教授報告：〈1947年夏的戰鬥〉。

5.24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演講與討論，由美國芝加哥大學馬思中教授主講：〈中國邊疆的“生”番與“熟”番以及帝制中國晚期的統治權（主權）概念〉。

5.26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討論會，由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李尚仁主講：〈十九世紀英國帝國醫學在中國與派崔·萬生的早期醫學研究事業〉。

5.26 中華經濟研究院、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主辦「兩岸青年學者論壇－人文與科技學術研討會」，假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行（至 27 日），共發表論文 22 篇。

5.27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題演講，由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伍焜玉主講：〈生物醫研究之新發現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5.27 台灣省政府文化處主辦，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承辦「五十年來台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至 28 日）。

5.28 蒙藏委員會暨中邊政協會主辦「蒙古與週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與「西藏學術會議」，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至 29 日），各發表論文 22、24 篇。

5.29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專題演講（平埔研究工作會學術討論系列），由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講師胡家瑜主講：〈平埔藏品資源的數位化應用〉。

5.29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主辦「邁向二十一世紀海外華社之變遷與發展－市民社會之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立政大公企中心舉行，發表論文：廖建裕：〈現階段的印尼華社〉；朱泓源、詹道玉：〈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政治文化變遷（1937-1959）：論國家認同的轉向〉；陳來幸：〈世紀之交日本華社的演變與其展望〉；山下清海：〈日本唐人街之觀光地化的進展〉；何啓良：〈新者未立、悵然無歸－九十年代後期動盪中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龔宜君：〈菲律賓華人社會團體的形成與發展〉；楊聰榮：〈在「一個國家」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激盪中成長：論澳洲華人的參政空間〉；陳靜瑜：〈近半世紀來美國華人地位變化的因素、問題及其展望〉；李道緝：〈泰國華社的變遷與發展〉；傅豐玲：〈海外

華人資訊網路建製成功因素探討〉。

5.31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演講，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籠谷直人主講：〈亞洲國際通商秩序與日本〉；由神戶商科大學商經學部助教授陳來幸主講：〈華商會網絡〉。

6.01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東南亞考古研究室舉行座談會，由研究員陳仲玉主講：〈談東南亞史前史的研究與重要課題〉。

6.01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故翁同文教授追思演講會，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主講：〈翁同文教授的舊學新篇〉。

6.02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專題演講，由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所長趙和曼主講：〈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

6.03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院士曹永和主講：〈再論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

6.0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候選人李玉珍報告：〈寺院經濟與女性宗教實踐〉。

6.04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行爲研究組舉行「述說、記憶與歷史：以『情與文化』為核心的論述」學術研討會(至 5 日)，共發表 9 篇論文。

6.04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研討會，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高級講師何啓良主講：〈安華事件後的馬來西亞政治發展〉。

6.04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學術演講，由研究員蕭新煌主講：〈東亞與東南亞中產階級研究〉。

6.0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演講，由美國亞歷桑那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鮑家麟主講：〈移植美國西南的中國婦女〉；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Executive Director Ms. Lynn Murray Sien 主講：〈American Women in Taiwan〉。

6.05 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學會、中華民國博士協會主辦「一國良制」研討會，假台灣大學法學院會議廳舉行（至 6 日），共發表論文 18 篇。

6.05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由研究生陳昱伶主講：〈中國與華盛頓體系——以九國公約為中心〉；淡江大學戰研所研究生林志松主講：〈晚清的對外決策機制——1880-1885〉。

6.07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

教授李宗桂主講：〈大陸二十年來文化研究的反思〉。

6.08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研討會，由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所長趙和曼主講：〈越南經改與社會變遷〉。

6.08 台灣生活空間技術史研究班台灣建築史論述之形成系列演講之二，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由華梵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徐裕建主講：〈台灣傳統大木匠師「箇尺」設計技藝論述研究〉。

6.11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舉行「健與美的歷史」學術研討會，於該所舉行（至 12 日），為「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研究計畫專題研討會系列之四。

6.14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主辦「電子古籍中的文字問題研討會」，假史語所研究大樓舉行（至 16 日）。

6.14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彭小妍主講：〈五四文人在上海：另類的劉呐鶴〉。

6.14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助理研究員邱敏勇主講：〈豬的畜養或狩獵——芝山巖遺址個案研究〉。

6.15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古偉瀛主講：〈十九世紀台灣天主教傳教糾紛〉。

6.17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兼任研究員王世慶主講：〈十九世紀中後期台灣北中部銀錢比價變動續探（1839～1895）〉。

6.1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羅久蓉報告：〈龐德與中國（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

6.2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胡台麗主講：〈排灣族的文化表徵與詮釋〉。

6.21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舉辦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兩岸學術研討會（至 22 日），共發表 13 篇論文：李有成：〈後現代性與全球文化〉；胡顯章、劉開勇：〈中西文化的融、衝突和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沈清松：〈全球化歷程與普世倫理問題〉；陳義彥、游清鑫：〈選舉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朱雲漢：〈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余遜達：〈憲法文化與中國現代化〉；郭寶渝：〈「留學生」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陳毓鈞：〈兩岸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認知與對應－從冷戰到後冷戰〉；陶文釗：〈中美關係中的文化因素〉；曹俊漢：〈公共政策倫理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

挑戰〉；丘昌泰：〈重塑企業精神導向的行政文化－西方管理哲學對行政學術發展的影響與定位〉；周弘：〈歐洲文化與現代化：歷史的回顧－兼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衝突與文化趨同〉；楊樹標：〈論西方人文思潮與中國現代化〉。

6.24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東南亞研究計畫及文化研究學會合辦演講，由 Prof. A. B. Shamsul 主講：〈Social Science in Southeast Asia Observed: A Malaysian Experience and Viewpoint〉。

6.24 中華軍史學會「國共戰爭史學術研討會」，假台北市圖書館舉行，發表論文：劉鳳翰：〈論國共三段戰爭〉；周美華：〈從軍事解決到政治解決－戰前的一段國共關係〉；張玉法：〈國共戰爭在山東（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陳存恭：〈國共戰爭在山西（一九三六—一九四九）〉；張世瑛：〈國共內戰中的記憶與神話－以太原五百完人為中心的探討〉；趙洪慈：〈中共土地鬥爭與共軍的發展〉；陳孝惇：〈國共戰爭期間海軍整建之研究（一九四五—一九五〇）〉；鄭輝麟：〈從國共戰爭探討中共奪權之策略（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劉熙明：〈滿洲國武力在國共東北內戰中的角色〉；劉維開：〈國軍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晚〉。

6.25 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主辦「第二屆全國大專青年台灣史論文研討會」，假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行。

6.27 中國歷史學會第三十五屆會員大會，假阿里山救國團山莊舉行（至 29 日）。

6.28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專題演講，由 Editor of Arena Magazine, Paul James 主講：〈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ustralian Postmodern Republic (with reflections on possibilities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7.0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呂妙芬報告：〈儒釋交融的聖人觀：晚明儒家聖學理想之一例〉。

7.08 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朱德蘭主講：〈台灣慰安婦調查與歷史真相研究〉。

7.08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日本高知女子大學社會福利學部沈潔主講：〈滿洲國的醫療與防疫〉；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部飯島涉主講：〈瘧疾與台灣、琉球關係〉。

7.10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主辦「國定古蹟台北賓館（原台灣

總督官邸）保存修復學術研討會」，假國立台灣大學舉行，共發表論文 7 篇。

7.10 玉井鄉公所「1999 台南縣文化節玉井芒果節－台灣史的饗宴：通俗講座」（至 11 日），由旅荷學者江樹生主講：〈荷據時代的台灣史〉；成大歷史系教授林瑞明、中央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康豹主講：〈噍吧哖事件的探討〉。

7.15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游鑑明報告：〈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

7.16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系列之二——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假中研院活動中心舉行（至 17 日），共發表 16 篇論文：Patrick Hanan：〈Wu Jianren and the Narrator〉；Ellen Widmer：〈Foreign Travel Through a Woman's Eyes：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大木康：〈晚明俗文學興盛的士人心態〉；王宏志：〈「以中化西」及「以西化中」：晚清論者對中外文學的整合〉；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櫓杌閒評》、《櫓杌萃編》、《今櫓杌傳》〉；王瓊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中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李惠儀：〈明亡與清代文學之女英雄形象〉；金文京：〈湯賓尹與明末商業出版〉；胡曉真：〈凝滯中的精神分裂文本：由《夢影緣》再探晚清前期的性敘事〉；商偉：〈晚明的小說、日用類書與印刷文化〉；張淑香：〈山中傳奇－從傳統的改寫看《老殘遊記》〉；陳國球：〈拼湊的圖像－晚明唐詩選本初探〉；華瑋：〈世變中的「女」聲：傳奇《六月霜》與《軒亭冤》中之秋瑾形象及其意涵〉；黃錦珠：〈吳沃堯小說中的女性觀〉；賴芳伶：〈周作人的日本經驗〉；龔鵬程。

7.26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伊斯蘭研究演講，由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部教授鈴木賢主講：〈1949 年後中國伊斯蘭的發展〉。

7.28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研究室學術演講，由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端主講：〈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

7.29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濱下武志主講：〈清末朝貢貿易中台灣商人的角色〉。

8.06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成蹊高校教務主任及日本北海道大學語言文化部副教授主講：〈《楊達全集》的編纂〉。

8.06 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東海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協辦「口述歷史研習營」，分南(8.06-8.08)、中(8.13-8.15)、北(8.20-8.22)、東(8.25-8.27)四區舉行。

8.09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胡曉真主講：〈女性文學想像與晚明變局——論《天雨花》中的父女傳承〉。

8.11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專題演講，由 Mr. John Moffett 主講：〈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 at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8.16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演講，由京都大學經濟系教授堀和生教授主講：〈近代日本と領土紛爭－竹島（獨島）あをぐつて〉。

8.17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張素玢主講：〈日本農業移民研究之幾點心得〉。

8.20 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學術演講，由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王友仁主講：〈從美國戰略論冷戰後的東北亞危機〉。

8.26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余文堂主講：〈中德早期軍事關係(1600-1880)〉。

9.01 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一般史組學術座談會，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石源華主講：〈中國大陸汪兆銘政府史研究概述〉。

9.02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Assistant Professor, Joan Judge 主講：〈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 the Refiguring of Early Female Instruction Books in Late Qing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另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Professor, Joshua Fogel 主講：〈Changing Chinese View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from Ming to Qing〉。

9.08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台灣文獻先賢林獻堂思想學術座談會」，假台中縣私立明台家商舉行。

9.0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張啓雄主講：〈琉球棄明投清的認同與掙扎〉。

9.14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中山大學共同科教授葉振輝主講：〈談清末台灣海關資料的利用〉。

9.16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討論會，由近史所研究員賴惠敏主講：〈從檔案看清代的社會與生活〉。

9.17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訪問學人 Scott Simon 主講：〈台灣中小企業中的女性地位：頭家娘的角色〉。

9.20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助理邱澎生主講：〈十八世紀雲南銅材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

9.2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劉素芬報告：〈清代台灣的水利開發與地權結構－以岸裡文書為例〉。

9.30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台灣漁業史學研討會」，發表論文有：祝平一：〈台灣漁業史研究回顧〉；陳維鈞：〈考古材料中所見的台灣漁業〉；林玉茹：〈國家、資本與資源開發：日治末期東台灣的漁業經營〉；李文良：〈日據時代台灣的漁業組合〉；陳憲明：〈屏東琉球嶼之漁業發展史〉；王柏山：〈光復後台灣水產養殖之發展與區位變遷〉；陳肅容：〈七股潟湖區漁業變遷的發展過程：1920 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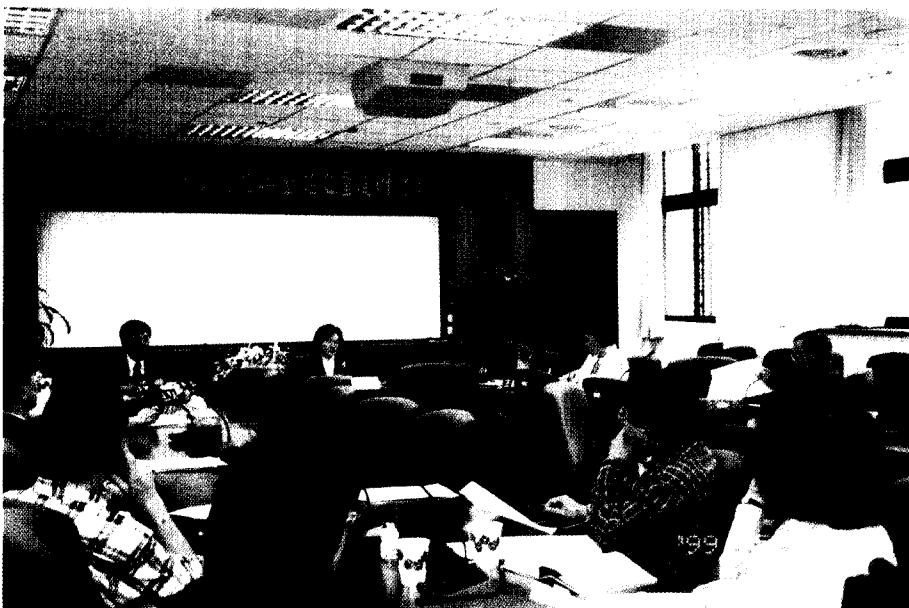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 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 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 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電腦打字稿並附磁片尤受歡迎。
- (4) 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 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 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7) 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中研院近史所主辦「檔案與近代史研究學術座談會」(1999年5月6日)

中研院近史所文化思想史組主辦「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整體之重建研討會」
(1999年5月21日)



本期要目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1600迄今）」系列活動報導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五四」如何面臨未來？－兩岸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參觀記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民國時期在二十世紀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反思與再考量)

國際會議報導

退休感言：研究院成全了我

學人簡介——蘇雲峰、Albert Feuerwerker

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畫研究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歷史檔案簡介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日偽政權檔案概況及初步評價、開發

海峽兩岸檔案利用比較

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朝（1736-1795）司法類

王世杰個人檔案整理概述

史料介紹三種

新書評介一本

